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 达 主编

爱情和其他魔鬼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朱景冬 李德明 蒋宗曹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爱情和其他魔鬼

爱情和其他魔鬼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长颈鹿丛书 - Giraffe Series 外国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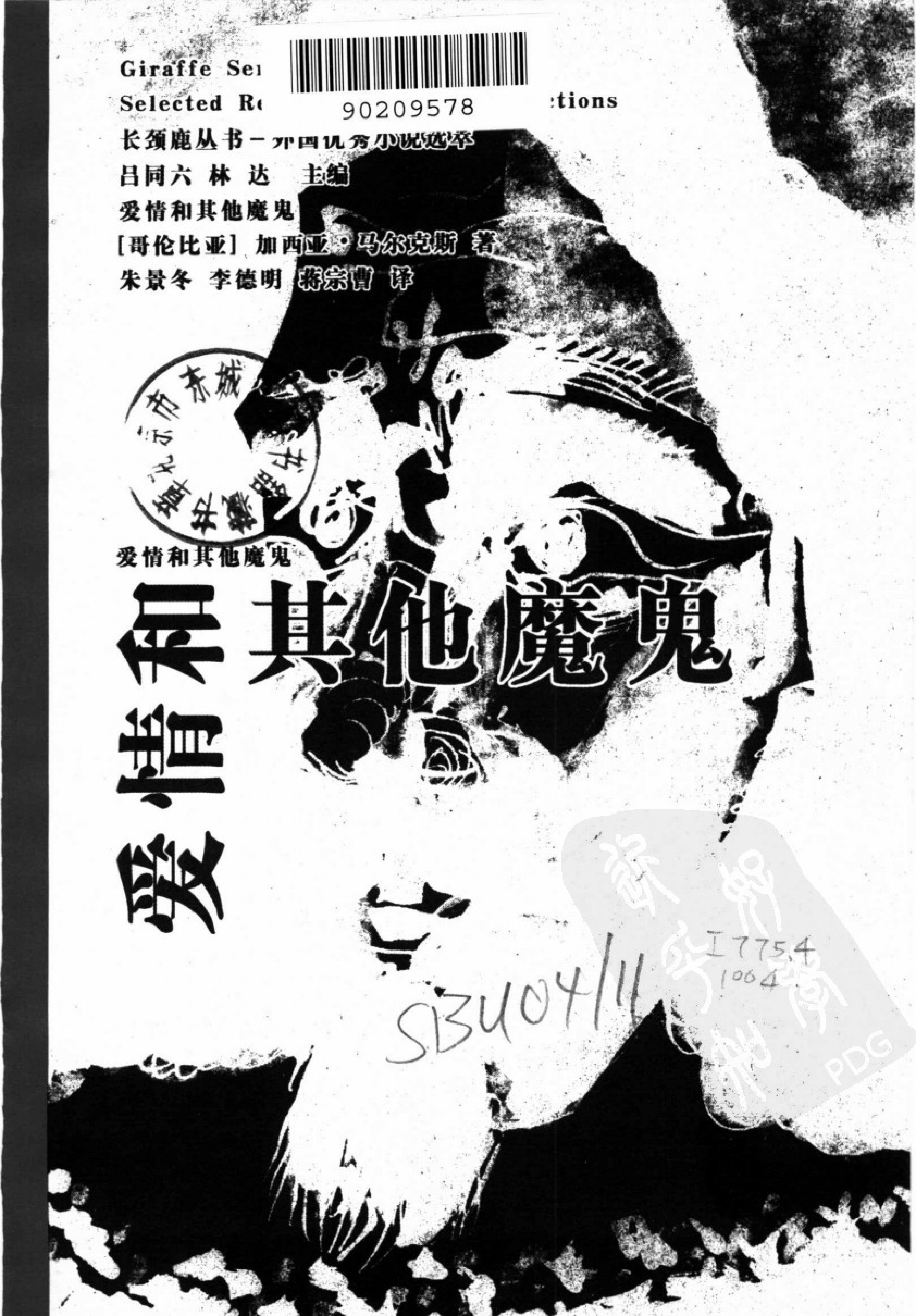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责任编辑：吴晓玲 封面设计：韩济平 陈莉文

ISBN 7-5329-1654-5

9 787532 916542 >

定价：15.70 元


Giraffe Se
Selected R 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 达 主编
爱情和其他魔鬼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朱景冬 李德明 蒋宗曹 译
爱情和其他魔鬼
爱情和其他魔鬼
90209578
I775.4
1004
SB404/11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　达主编
爱情和其他魔鬼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朱景冬　李德明　蒋宗曹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3插页 207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7—5329—1654—5
I·1431　　定价 15.70 元

总　　序

吕同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一江春水，奔腾向前，气象万千。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往，空前地活跃、密切。

文学领域亦然。回眸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不同中外文化交流，同吸取、借鉴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冯至、徐志摩、卞之琳等文学大家，堪称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身体力行，孜孜矻矻于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外文学的亲善，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谓功德无量。

在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无数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一番话的正确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上，我国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分明打烙着域外文学或深或浅的印记，法国古典主义对于曹禺剧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对于巴金的熏陶，欧美诗人对于郭沫若诗歌的作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今作家的启示，就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今天，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交

流、渗透、移植和融合。今天，文学已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与认识、沟通与交往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今天，外国文学作品，犹如水银泻地，渗入我国千百万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愿意把这套《长颈鹿丛书——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作为介绍和了解外国优秀文学的一套形象材料，作为认识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份精神食粮，奉献给诸位读者，为借鉴他山之玉，为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略尽绵薄之力。

《长颈鹿丛书》选收的作品，大抵上都是名家名作，都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人们记得，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就说过，“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而他又尤其看重艺术作品的娱乐作用。我们的思路同贺拉斯不谋而合。在编选过程中，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准则，我们力求做到，入选这套丛书的小说，乃是雅俗共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供人娱乐”，能够引发众多读者的兴味，拨动他们的情感之弦。

而取名“长颈鹿丛书”，则是寄托着我们这样的意愿：这些小说作品犹如长颈鹿一样雅致、大度、优美、脱俗，人人喜爱。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这套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头一次译成汉语。

一九九八年初春　北京霞光里

魔幻·神奇·真实

朱景冬

在多姿多彩的当代拉美文坛上，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一个报务员的家庭。自幼从外祖母口里知道许多印第安人的神话和传说故事，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就读于大学法律系，后来投身报界，并屡次去美洲、欧洲许多国家采访和旅游。一九四七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崭露头角；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带来了世界声誉。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情节荒诞离奇，题材多为表现历史事件或对往事的回忆，用幻想、虚构、魔幻般的手法予以表现，读来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乔伊斯、卡夫卡和福克纳等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从印第安民间神话传说和阿拉伯东方神话的传统中汲取了营养。

本书选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作品，出版于不同的时期，各具风姿，相互辉映。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是作者自己认为“写得

最好的小说”，共写了九遍，才付梓出版。作品描写哥伦比亚内战后幸存的退职军官的命运，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人世间的不平提出了悲愤的抗议，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品一般都具有磅礴的气势，但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却截然不同。它从头到尾始终写得从从容容，不急不迫，显得平和、沉静，朴实无华。作品大量运用白描手法，把每日的生活现象、衣食琐事、社会风习和世态人情，不加粉饰、不加渲染地描写出来，这里没有安排什么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却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水，在从容不迫的发展中不断掀起引人注目的漩涡细浪，以朴素的题材和通俗的笔触由浅入深地揭示出作品的主题。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写上层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压榨和摧残，但是从上校夫妇的辛酸的生活中，从他们遭遇的厄运中，却更具体、更深切地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以一九五一年发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偏僻的小镇上的凶杀案为题材，经过几十年的酝酿，作者才执笔写作。

小说采用记实体的手法，基本上摒弃了作者六十年代喜欢的魔幻，标志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风格的又一次变化。

作者着力于如实再现三十年前的那件命案，在叙写凶杀案的来龙去脉时，既像侦探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但又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不刻意渲染凶杀，而是借助这起凶杀案，讥刺权势，抨击仇杀行为和封建意识。对同凶杀案相关的人员的心态的刻画，对巧合、预感、预兆等的描写，强化了命案的神秘感和悲剧色彩，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评论家认为，这部悲剧的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堪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媲美。

《爱情和其他魔鬼》的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哥伦比亚海滨古城卡塔赫纳。主人公西埃尔瓦·玛丽亚是一位侯爵的女儿，十二岁生日那天因随女佣去市场买礼物而被疯狗咬伤，从此经受了一系列痛苦：药剂师、巫师、庸医用各种疗法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被关入修道院，像犯人一样被迫接受“驱邪”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生命终于夭折。小说对教会害人的左道邪说作了无情的抨击和嘲讽，同时对无辜的小女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西埃尔瓦·玛丽亚是不幸和痛苦的化身。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结出的苦果，从小像孤儿一样生活在黑奴们中间。她活泼可爱，能歌善舞，聪明伶俐。所谓的被疯狗咬伤，其实十分轻微，教会势力却小题大做，把她视为魔鬼缠身的怪物，百般加以折磨，不准任何人爱她。她虽然进行过反抗，但弱小的女孩终究抵挡不住洪水猛兽般的邪恶力量的进攻，成了黑暗、残暴的恶势力的牺牲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经作家微妙精细的刻画，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多处采用了魔幻描写，这种描写异乎寻常，亦真亦幻。但在作者看来，“拉丁美洲的生活就是这样，即使是最平常的生活也是光怪陆离的。这是一块放浪形骸而又极富想象的土地，由于孤独而耽于幻想和种种错觉的土地。”因此，这一切并非荒诞不经，而应视为拉美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现实。在那里，神奇充满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风物也呈现神奇的色彩，令人心驰神往，如梦如幻。

目　录



爱情和其他魔鬼

朱景冬译

前　　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那天，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我作为记者从事最初的写作工作的那家日报编辑部主任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老师只讲了两三条老生常谈的意见便结束了早晨的会议，没有向任何编辑分配具体任务。几分钟后他从电话里得知，古老的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地下墓群还在挖掘中，便不抱幻想地吩咐我说：

“你去那里转转,看能否写点什么。”

一百年前就改为医院的第二圣方济各会修女们的古老修道院将被出售，买主要在那里盖一幢五星级饭店。由于屋顶年久毁坏，它那美丽的小教堂几乎露天了。但是在它的地下墓群里却埋着三代主教、女修道院院长和其他著名人士。第一步是把死者挖出来，把尸骨交给要求收回的人家，然后把剩下的尸骨抛进公共墓穴埋起来。

施工方式之原始，使我大吃一惊。工人们用丁字镐和锄头把墓穴掘开，搬出那些一动就散架的腐朽棺木，把板结在骨头上的泥土、破衣烂衫和枯黄的头发剥掉。死者身份越高贵，工作就越艰巨，因为必须在尸骸堆中挖掘，十分仔细地检查残留物，以便把宝石和金银饰品清理出来。

施工员在一个学生笔记本上抄录着墓碑上的材料，把尸骨分别堆放好，把写着姓名的纸条放在每个骨堆上，以免混淆。所

以，走进教堂后我最先看到的便是一大溜尸骨堆，从屋顶上的裂口里倾泄下来的十月的炎热阳光早把它们晒热了。除了用铅笔在一块纸头上写的名字外，一堆堆尸骨没有其他任何识别物。几乎过了半个世纪后，无情岁月的这些可怕证据仍然使我感到不安。

在那众多死者中，有一位秘鲁总督和他的秘密情妇；有那个教区的主教堂托里维奥·德·卡塞雷斯·伊·比图德斯；有包括何塞法·米兰达修女在内的几个女修道院院长；还有半生致力于镶板式天花板制造的艺术学士堂克里斯托瓦尔·德·埃拉索。有一座墓穴用刻有第二代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伊·杜埃尼亚斯名讳的石碑封着，但是掘开墓穴时却发现墓穴是空的，不曾葬过人。相反的，侯爵夫人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的尸骨却埋在附近的另一座墓穴中，并立有自己的墓碑。施工员没有把这一现象当回事。一位土生白人贵族准备好自己的墓穴，却被埋在另一座墓穴里，这是正常的事。

新闻发生在主祭坛福音一侧的第三座壁葬墓窟中。碑石一镐就打碎了，一束生机勃勃的深铜色长发从墓窟里泄出来。施工员想在工人们的帮助下把那束长发全部拉出来，但是越拉，头发似乎越长、越多。拉到最后，头发仍然附着在一个小女孩的头颅上。墓窟里只剩下一些零散潮湿的小骨头。而在被硝腐蚀的石碑上，只辨认得出一个没有姓的名字：西埃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长发铺展在地上，长二十二点一一米。

施工员毫不惊奇地对我解释说，人死后，他的头发每月还要长一厘米，平均计算，二十二米要长二百年。但是我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小时候我外祖母对我讲过一个十二岁的侯爵小姐的传说，她的长发像新娘的新婚礼服一样拖在地上。她是被一只狗咬伤患狂犬病死的。在加勒比海的大小城镇，由于她创造的

许多奇迹而受到崇拜。那座墓窟可能就是她的：这个想法便是那天我写的报道，也是本书的起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九四年于卡塔赫纳

谨将此书献给泪人儿
卡门·巴尔塞尔斯[1]

① 卡 门·巴尔塞尔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经纪人。

看来，头发肯定远比身体其他部位复活得少。

—— 托马斯·德·阿奎那①

（引自《复活的肉体之完整性》〈问题八十，第五章〉）

① 托马斯·德·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天主教神学家。

一

十二月的头一个星期天，一只额头上长着一块白斑的灰狗闯进市场狭窄的通道里，撞翻了卖炸肉的桌子，搅乱了印第安人的小摊和抓彩的帐篷，同时还咬伤了横穿马路的四个人。其中三个是黑奴。另一个是卡萨尔杜埃罗侯爵的独生女儿西埃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她是为庆祝她的十二岁生日，和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佣人出来买一串铃铛的。

早就吩咐过她们最远不要走过梅卡德雷斯门。女佣人却冒险地跑到赫塞马尼郊区的吊桥前，因为她发现那座贩卖黑奴的港口非常热闹，码头上还在拍卖一船几内亚的奴隶。加迪塔纳公司的黑奴船，人们已不安地等了一个星期，因为船上发生三批人莫名其妙死亡的事件。为了掩盖这件事，尸体被抛进大海，但没有拴石头，波浪翻滚的海水把尸首浮上了水面。天亮时，一具具水鼓鼓、呈紫红色的怪模怪样的尸体躺在了海滩上。由于担心发生某种非洲传染病，船只被迫停泊在海湾外，直到查明死人事件是因为吃了不新鲜的冷餐肉中毒所致，才被准许驶入港口。

当那只狗闯进市场时，幸存的黑奴已经卖光；但由于黑奴的健康状况极差，价钱只好降低，黑奴贩子便想用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补偿所受的损失。那是一个身高约五尺的埃塞俄比亚女俘，身上抹满了蔗糖浆，而不是真正的商品油，她的美貌却那般迷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的鼻梁很高，头颅硕大，眼窝很深，

牙齿完美无缺，仪表很像一名罗马角斗士。黑奴贩子没有在圈监时给她打火印，也没有宣布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而仅仅按照她的姿色拍卖。省长不但没有讨价还价，而且立刻付现钱：相当于她的体重的黄金。

野狗在追猫或和兀鹰争夺弃在街头的牲口肉时咬伤人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尤其在商船队途经此地去参加波托贝洛交易会时货物丰富、人群拥挤的情况下。如果同一天有四五个人被狗咬伤，谁也不会因此而失眠，更不用说西埃尔瓦·玛丽亚受的伤了。伤口在左脚踝上，轻得几乎看不出来。所以女佣没有惊慌，用柠檬水和硫磺给她治了一下，替她洗掉长裙上的血迹，除了她十二岁生日的欢乐，谁也没有再想这件事。

女孩的母亲、卡萨尔杜埃罗侯爵的没有名分的妻子贝尔纳达·卡夫列拉那天早晨吃了一种特别厉害的泻药：玫瑰糖水杯子里的七粒含锑药片。她曾是一个所谓的柜台贵族阶层的粗野的混血种女人；她诱奸男人，盗窃成性，放荡不羁；她贪吃暴食的东西可以使一个兵营的人吃饱喝足。但是没过几年，由于滥吃发酵的蜜糖和巧克力糖块，她就从社交界消失了。她那双吉卜赛人的眼睛失去了光辉，她的智慧枯竭了，又是便血又是吐胆汁，从前那副美人鱼般的身材像死了三天的人一样浮肿起来，肤色焦黄，噔噔地直放臭屁，把大猎犬都给吓坏了。她几乎寸步不离卧室，即使在卧室里她也是赤身裸体，或者只穿一件哔叽长袍，里头什么也不穿，这使她显得比不穿什么都更加裸露无遗。

当女佣人带着西埃尔瓦·玛丽亚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拉了七次稀。女佣人没有告诉她孩子被狗咬伤的事。但是对她讲了码头上买卖那个女奴的热闹情景。“她既然像他们说的那么漂亮，她就很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贝尔纳达说。不过，即使她是萨巴

女王①，她认为也不会有人用相当于她的体重的金子来买她。

“他们是说要用金比索② 吧。”贝尔纳达说。

“不，”女佣人纠正说，“要用跟黑奴的体重一样重的金子。”

“一个五尺高的黑奴至少重一百二十磅。”贝尔纳达说。“如果她不拉钻石的话，没有一个黑女人或白女人能值一百二十磅金子。”

在买卖奴隶方面，谁也比不上她精明。她知道，如果总督买下那个埃塞俄比亚女人，那肯定不是为了让她在他的厨房里干什么省心省力的活儿。正这样议论时，她听见了庆祝生日的笛号声和爆竹声，紧接着又传来关在笼里的大猎犬的狂吠声。她立刻去了橙园，想看看那里出了什么事情。

卡萨尔杜埃罗的第二代侯爵、达里恩牧场主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伊·杜埃尼亚斯躺在午睡的吊床上。吊床吊在橙园里的两棵橙树之间。他也听见了音乐声。他像个死人，一副苦相，由于睡觉时被蝙蝠咬得流了许多血，面色苍白得像百合。为了在家里走动，他穿着一件贝督因人穿的那种带风帽的外衣，戴着一顶托雷多圆帽，那副样子使他显得更加孤苦伶仃了。一看见他那像上帝造她时那么一丝不挂的妻子，便抢先问她说：

“这是什么音乐？”

“不知道。”她说，“你知道吗？”

侯爵也不知道。这样问他妻子，他心里肯定真的感到很不安了。他妻子回答他时话里不带刺儿，她的病情也肯定好转了。当爆竹声又响起来时，他已经不安地回吊床坐下了。

①萨巴女王，古阿拉伯萨巴城的女王，以财富巨大著称。

②在西班牙文里，体重和比索是同一个字。

“天哪！”他叫道，“这是怎么回事呀！”

他的住宅和“神圣牧羊女”女精神病院为邻。女精神病患者们听见音乐和爆竹声后大呼小叫，纷纷跑到面向橙园的平台上看热闹，每听见一阵爆炸声，便欢呼一阵。侯爵大声问她们，哪里在举行庆祝活动。她们回答了他的问题。那天是十二月七日，圣昂布罗西奥主教日，奴隶们为庆祝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生日在院子里奏乐和放鞭炮。侯爵恍然大悟，拍了拍脑门。

“当然。”他说，“她几周岁了？”

“十二。”贝尔纳达说。

“才十二岁？”他说着，又躺在吊床上。“日子过得太慢了！”

直到那个世纪初，这所住宅一直是全城的骄傲。如今却破败了，变得阴暗了。由于一些挺大的地方空空荡荡，许多东西改变了位置，使得整个住宅显得好像在搬家。客厅里仍然保留着棋盘格式大理石地板和一些像蛛网一样吊着的带玻璃坠儿的灯。一个个房间保持着生气，任何时候都凉爽宜人，因为用灰石砌成的墙特别厚，门窗多年关闭着，特别是因为有从各种缝隙咝咝吹进来的十二月的柔风。一切东西都布满了脏乎乎的夜露和阴影。而老侯爵引为骄傲的权势，如今只剩下那五只守夜的大猎犬了。

为西埃尔瓦·玛丽亚庆祝生日的那么轰隆作响的黑奴院子，在老侯爵在世的年代曾是城中之城。继承人接管后，当不公平的奴隶买卖和面粉交易还存在时，那院子的盛况一如往常。那时贝尔纳达坐镇马阿特斯榨糖作坊，干练地经营买卖黑奴和面粉的生意。现在一切荣耀已属过去。贝尔纳达被她那些无法满足的恶习吞噬了，那个院子也只剩下两座用苦棕榈叶铺顶的木房子。这个望族最后的光辉终于在那木房子里熄灭了。

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那个真正的黑女人直到临死前都在用

她的铁腕儿管理着那个家。她是那两个世界之间的纽带。她身材高大、强壮，有一副称得上是远见卓识的聪慧头脑。正是她带大了西埃尔瓦·玛丽亚。她成了天主教徒，但没有放弃她的约鲁瓦教信仰；她同时信奉两种教，既没有先后，也无需协调。她说，她的心灵处在健康的平静状态，因为在一种教里缺少的东西，她在另一种教里可以找到。此外，她也是唯一有权力在侯爵和他妻子之间进行调解的人物，两个人都很喜欢她。只要一发现奴隶因鸡奸行为或在空房间里和不同的女人通奸而造成危害，她便用笤帚疙瘩把他们赶走。但是自从她死了以后，奴隶们便离开木房子，避开午间的热气，随便躺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地吃从蒸饭锅里摸来的干粮，或者在凉爽的走廊里玩响片或玩纸牌。在那个令人感到压抑的院子里，谁也不自由。只有西埃尔瓦·玛丽亚是自由的：只有她，只有在那里。所以才在那里祝贺她的生日，那是她真正的家，有真正的亲人。

在那般喧闹的音乐伴奏下，在自己家的和其他显赫人家的奴隶全身心参与下，如果跳什么沉闷的民间舞蹈是不可想象的。小女孩显露出她的天性，比非洲出生的黑人跳得还优美、活泼，并且以不同于自己的声音，用非洲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唱歌，或者用鸟的声音和兽类的声音唱歌，这使黑奴们都大吃一惊。按照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定的规矩，几个最年轻的女奴用烟黑给她进行面部化妆，把圣洁的项链给她戴在洗礼时用过的披肩上，还要把她的长发梳好。她那一头长发从没剪过，如果不是每天都给她编成辫子，在脖子上绕许多圈儿的话，她连路也没法走了。

她开始在两股彼此相反的力量的交汇点上开花生长。她像母亲的地方很少，像父亲的地方却很多：身材瘦小，胆怯得要命，肤色苍白，眼睛透出一种阴郁的蓝色，光闪闪的长发呈纯铜色。

她的举止静悄悄，仿佛是个无形的孩子。她的性情如此古怪，母亲很担心，便在她的手腕上拴了一个铃铛，免得她在黑糊糊的宅子里迷了路而无人知道。

过完生日两天后，几乎是没有留神，女佣人把西埃尔瓦。玛丽亚被狗咬伤的事告诉了贝尔纳达。贝尔纳达一边在睡前第六次用香皂洗着热水澡，一边想着这件事。但是等她回到卧室后，早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第二天夜里她才又想起这件事，因为那几条大猎犬无缘无故地一直叫到天亮，她担心它们疯了。于是她端着烛盘去了院子里的木屋，发现西埃尔瓦·玛丽亚睡在多明加·阿德维恩托留下的、用美洲油棕编织的吊床上。由于女佣人没有告诉她伤痕在何处，她便掀起孩子的裙子一点一点地查看，烛光和她的目光同时顺着她那根像狮子尾巴一样盘绕在身上的碍事的辫子移动。最后她找到了伤口：左脚踝上划了一道，血已凝固结了痂，脚后跟还有几处擦伤，轻得几乎看不见。

在城市的历史上，患狂犬病的病例为数不少，严重性也不一般。最轰动一时的是一个小商贩。他带着一只经过训练的长尾猴在人行道上走，那猴的举动和人类相差无几。在英国海军包围该城期间，猴子染上了狂犬病，咬伤了主人的脸，逃到附近的小山上去了。不幸的小商贩在恐怖的幻觉中被人用棍棒活活打死。多年后，为了吓唬孩子，母亲们仍然用流行的歌谣歌唱这件事。两个星期后，一群猕猴大白天发疯似的从山上冲下来，在猪圈和鸡栏里大闹一番，然后嚎叫着闯进了大教堂，同时嘴里吐着使它们窒息的血沫。当时那里正在为庆祝英国舰队的失败诵唱感恩颂。但是如此可怕的场景并没有历史记载，因为事件发生在黑人居住区。在那里，人们把被狗咬伤的人关进野生动物栏，用非洲的巫术对他们进行治疗。

尽管有这么多前车之鉴，但在不可挽回的症状出现之前，无论白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都没有想到狂犬病，也没有想到其他任何一种悄悄潜伏着的疾病。贝尔纳达·卡夫列拉按照同样的想法行事。她想，奴隶们编造的故事比基督教徒们的神话传说传播得还快、还远，甚至被狗咬伤这么平常的事情也会给家族的荣誉带来损害。她对自己的想法如此坚信，甚至都没有对丈夫提这件事，直到下个星期天前也没有再想起这件事。而在那个星期天，女佣人独自去了市场，看见一条死狗吊在一棵扁桃树上，那是为了告诉众人，它是得了狂犬病死的。她只要看一眼就认出了狗头上的那块白斑和灰色的皮毛：它正是咬伤西埃尔瓦·玛丽亚的那只狗。但是人们把这个消息讲给贝尔纳达听时，她仍然置若罔闻。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伤口已经愈合，甚至连擦伤的迹象也没有了。

十二月开始时天气不好，但很快就恢复了它那紫晶般的黄昏和海风大作的夜晚。由于从西班牙传来的好消息，这年的圣诞节比往年过得快乐。但是城市不是从前的城市了。买卖奴隶的大集市已经迁往哈瓦那，大陆各地的矿主和农场主宁肯到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上去低价购买走私来的劳动力。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城市：一个在商船队停留的六个月里，一片欢乐，人山人海；另一个在其余六个月间，昏昏欲睡，期待着船只归来。

直到一月初，人们才又知道有关被狗咬伤的人的消息。当时一个喜欢东游西荡的、都知道名叫莎贡塔的印第安女人在午睡的神圣时刻来敲侯爵家的门。她年事很高，却在烈日下赤脚行走，只拄着一根长拐杖，从头到脚裹着一条白披风。她有为人缝合处女膜和堕胎的臭名声。但是她了解印第安人使被宣判无法医治的

人起死回生的秘密，这又使她赢得了好名声。

侯爵没有出门，站在门廊里不情愿地接待了她，听了半天才明白她想说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讲话慢慢吞吞、转弯抹角、没有头绪的女人。她绕来绕去费了那么多口舌才说到正题，侯爵都听得不耐烦了。

“不管什么事，快告诉我，别转弯抹角的了。”他说。

“我们受到了狂犬病灾殃的威胁，”莎贡塔说，“只有我一个人掌握着猎人的庇护神和狂犬病患者的大救星圣乌贝尔托的密诀。”

“什么灾殃，我不明白。”侯爵说，“扫帚星没出现，也没发生日月蚀，这我知道，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罪孽惹得上帝来惩罚我们。”

莎贡塔告诉他，三月间将发生日全食，并把十二月份头一个星期天被狗咬伤的人的全部消息告诉了他。其中两个人已经消失，无疑是他们的亲人对他们施了巫术，把他们变没了。第三个人于第二个星期被狂犬病夺去了生命。还有第四个，没有被狗咬伤，而仅仅溅上了同一条狗的口水，他躺在“上帝之爱”医院里已奄奄一息。在那个月里，市长已下令毒死大约一百只野狗。再过一个星期，街上就没有一只活狗了。

“不管怎样，我不明白我跟这事有什么相干。”侯爵说，“更何况在这个令人困乏的时刻。”

“你的小女儿是第一个被狗咬伤的。”莎贡塔说。

侯爵非常自信地说：

“倘若是这样,我会最先知道的。”

他相信，孩子肯定感觉很好。孩子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事情他居然不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客人打发走，又接着睡午

觉去了。

但是，那天下午他到佣人们的院子里去找西埃尔瓦·玛丽亚了。她正在那里帮着剥兔子皮，脸上抹着烟黑，光着双脚，像女奴们那样头上包着红布。侯爵问她是不是真的被狗咬伤过。她回答说，确确实实没有。但是那天晚上，贝尔纳达对他肯定说有这事。侯爵困惑地问：

“那么西埃尔瓦为什么否认呢？”

“因为没有办法让她说实话，那怕是不经意。”贝尔纳达说。

“这样的话，就必须采取措施。”侯爵说，“因为那只狗患有狂犬病。”

“恰恰相反，”贝尔纳达说，“那只狗咬了她，可能被打死了。孩子被咬是十二月间的事，那个满不在乎的丫头现在好得像是一朵花。”

夫妇二人继续关注着关于传染病如何如何可怕的愈来愈多的传闻。即使违背他们的愿望，他们还是不得不再次谈一下他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就像他们彼此不那么憎恨的时候那样。对他来说，事情很清楚。他一直相信，他是爱他的女儿的。但是对狂犬病的恐惧迫使他承认，他一直在欺骗自己，为的是生活得安逸。贝尔纳达却不同，她连问问自己是不是爱她都没有，因为她完全明白，她不爱女儿，女儿也不爱她。她认为这两种情况是合乎情理的。他们二人对女儿的憎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性格既像他也像她。但是贝尔纳达还是准备演一出掉眼泪的闹剧，并作为母亲悲痛地戴孝，以保全她的面子，只是女儿必须死得庄重体面。

“只要她得的不是狗身上的病，”他说，“这都没什么。”

侯爵这时像天上的闪电一样突然明白了她的生命的意义。

“女儿不会死的。”他说，口气很坚决。“不过，如果她必须死的话，一定得听从上帝的安排。”

星期二他前往建在圣拉撒路山上的“上帝之爱”医院看望莎贡塔对他提到的那个患狂犬病的人。他并没有想到他那辆罩着黑绉绸的华丽的四轮马车会被人看成酝酿中的灾难的又一征兆，因为多年来，除了有重要事情，他是不出家门的；而多年来，也没有发生比不幸事件更重大的事情。

城市呈现出一片死寂凄凉景象，但是仍然有人瞧见了这位穿着塔夫绸丧服的犹豫不决的先生那憔悴的面孔和转瞬即逝的目光。他的马车离开高墙环绕的城区，穿过原野向圣拉撒路山驶去。到了医院后，躺在砖地上的麻疯病人看见他像幽灵一样走进来，便把他拦住，向他要东西。在关着不时发疯的病人的大房间里，那个狂犬病人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他是一位年迈的黑白混血种人，脑袋和下巴上像沾着棉花。他已半身瘫痪，但是狂犬病毒早已深深地侵入他的另一半身体，必须把他绑在柱子上才可以避免他在墙上撞破脑袋。他的讲述使人毋庸置疑，他就是被那只咬伤西埃尔瓦·玛丽亚、脑门上有一块白斑的灰狗咬伤患病的。他确实被溅上了狂犬的口水，只是口水不是溅在健康的皮肤上，而是溅在腿肚子上的一块慢性溃疡上。但是明白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侯爵心情平静。由于看到了那个垂死的病人，而没有看到可以使西埃尔瓦·玛丽亚避免不幸的希望之光，侯爵便恐惧不安地离开了医院。

当他沿着崎岖的山路回城的时候，遇见一个仪表不凡的男人，那人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旁边躺着他的死马。侯爵让马车停住；直到那个人站起身来，他才认出了阿夫雷农西奥·德·萨·佩雷伊拉·卡奥硕士，他是城里闻名遐迩、能言善辩的医生。他

长得和黑桃老K一模一样，戴着一顶宽沿太阳帽，穿着马靴，披着有文化的自由人披的那种黑斗篷。他用一种很少用的礼节向侯爵致意。

“以真理的名义祝福你①。”他说。

上山时一路小跑，下山时却经不住同一个坡路，心脏爆裂了。侯爵的车夫内普图诺想把马鞍卸下来。马的主人拦住了他。

“我没有马可骑了，还要马鞍干什么。”他说，“让它跟马一起烂掉吧。”

他的身躯像小孩一样胖墩墩的，车夫不得不帮助他爬上马车。侯爵对他特别敬重，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阿夫雷农西奥还在想他的马。

“马死了，好像我的半个身子也死了。”他叹道。

“一匹马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侯爵说。

阿夫雷农西奥来劲儿了。“这匹马可不同。”他说，“我要是有办法，我就把它埋到神圣的地方②去。”他望着侯爵，看他有什么反应。最后说：

“十月份它就一百岁了。”

“哪有活这么久的马呀！’侯爵说。

“我可以证明。’医生说。

每个星期二他在“上帝之爱”医院里上班，为麻疯病人治疗其他的疾病。他曾是另一个因在西班牙受迫害而移居到加勒比地区的葡萄牙犹太人胡安·门德斯·尼埃托硕士的高才生，但是他继承了他当巫师和中伤人的坏名声，不过谁也不怀疑他的才学。由

① 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② 指教堂墓地。

于其他医生不原谅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占卜本领和他那些异乎寻常的方法，所以他同他们的争吵总是不断，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他发明了一种一年只服一次的药丸，此药能使人的健康状况变得完美，能使人的生命延长，但是服药后的前三天会使人的理智发生严重混乱，而只有他敢于服这种药丸。过去，他经常在病人的床头弹竖琴，用某种特地谱写的乐曲为病人减轻痛苦。他不看外科疾病，因为他总认为那是拉丁文教师和理发匠们的低级技术。他的最可怖的专长是向患者们预告死亡的日期和时刻。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坏名声一样，都是建立在这同一件事情的基础上的：据说，并且谁也不曾否认，他曾使一个死人复活。

虽然他有经验，阿夫雷农西奥还是为那个患狂犬病的人感到不安。“人的肉体不是为他能够活的岁月创造的。”他说。对他那番详尽而有声有色的演说，侯爵一句话也不漏掉，直到医生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他才开口。

“对那个不幸的人该怎么办呢？”他问。

“杀死他。”阿夫雷农西奥回答。

侯爵恐惧地望了望他。

“倘若我们是好基督教徒，至少就应该这么做。”医生接着说，态度十分冷漠。“你别这么惊讶，先生，好基督教徒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实际上他指的是城郊和农村那些随便什么肤色的穷基督徒，他们敢于把毒药投进他们患狂犬病的亲人的食物里，使他们免受面临最后命运的恐惧。上世纪末有一个家庭，全家人一起喝了一种加了毒药的汤，因为谁也不忍心亲自毒死一个五岁的孩子。

“人们以为我们当医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阿夫雷农西奥说。“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在道义上我们没有权力支持这种

做法。与此相反，我们对濒临死亡的人做了你刚才见到的事情。我们把病人送进圣乌贝尔托，把他们绑在柱子上，让他们死前多受点罪，死得更慢一些。”

“没有别的办法吗？”侯爵问。

“经过最初的狂怒大骂后，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医生说。他谈到一些令人高兴的理论，那些理论认为狂犬病是一种可治之症，各种配方的基础是：地钱、朱砂、麝香、银白色甘汞和紫色的海绿花。“见鬼去吧。”他说，“问题在于，有些人得了狂犬病，有些人则没有。这就很容易说，没有得狂犬病的人，是由于药物起了作用。”他望了望侯爵的眼睛，确信他仍然醒着，这才又说：

“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出于同情。”侯爵撒谎说。

他从窗口望了望大海，下午四点钟一切显得疲惫不堪，大海也昏昏欲睡。侯爵心情压抑地发现，燕子已经归来了。风儿还没有吹来。一群顽童在投掷石头，想逮住一只跑到泥泞的海滩上的鲣鸟。侯爵盯着那只拍着翅膀逃走的鸟儿，直到那只鸟消失在要塞一般的城市中那些闪闪发光的圆形屋顶之间。

马车从半月形土门进入高墙环绕的城区。阿夫雷农西奥指点车夫穿过喧闹的手工艺人区来到他家门前。这很不容易，内普图诺已年逾七旬，而且优柔寡断，眼睛近视，只习惯让马自个儿顺着比主人更熟悉的街道走。终于来到他家后，阿夫雷农西奥在门口用贺拉斯的一句名言跟侯爵告别。

“我不懂拉丁文。”侯爵抱歉地说。

“你根本无须懂！”阿夫雷农西奥说，当然是用拉丁文说的。

侯爵非常激动，回家后办的第一件事在他一生中是罕见的：他吩咐内普图诺返回到圣拉撒路山去把那匹死马拉回来，埋到神

圣的墓地去，第二天大清早再把他马棚里那匹最好的马给阿夫雷农西奥送去。

服过含锑泻药病情稍微好转后，贝尔纳达开始用灌肠液，甚至一日用三次，以便熄灭内脏的烈火，或者一天内用香皂洗六次热水澡，用来缓和紧张的神经。出嫁伊始，她怀着占卜者的信心策划和经营生意方面的冒险活动，直到她认识胡达斯·伊斯卡里奥特从而遭到不幸的那个倒霉的下午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如今她刚结婚时的风采荡然无存了。

她是偶然在集市上的斗牛场遇见他的。他几乎赤身裸体，赤手空拳和一头公牛搏斗，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他那么英俊、那么勇敢，她怎么也忘不了他。几天后，她又在一次狂欢节的舞会上见到了他。她是戴面具化妆成乞丐参加的。女奴们穿着侯爵夫人的衣服、戴着短项链、手镯、金耳环和宝石围绕着她。胡达斯由一群看热闹的人环绕着，和一个付钱给他的女人跳舞，想同他共舞的女人个个迫不及待，为了安抚她们，人们不得不竭力地维持着秩序。贝尔纳达问他要多少钱。胡达斯跳着舞回答说：

“半个雷阿尔。”

贝尔纳达摘下了面具。

“我问的是买你这个人要多少钱。”她说。

胡达斯看到，她那张不戴面具的面孔并非像乞丐那么卑微。他丢下他的舞伴，迈着见习水手的高傲步伐走到她面前，让她明白自己的身价。

“五百金比索。”他说。

她像精明的估价员那样用一只眼睛测了测他。他身材魁伟，皮肤像海豹，躯干线条起伏像波浪，臀部窄小，双腿细长，双手

平静得和他的职业不相称。贝尔纳达估算说：

“你有六英尺高。”

“再加三英寸。”他说。

贝尔纳达让他把头低到她够得着的高度，查看他的牙齿。他腋下的狐臭熏得她头晕。他的牙齿健全而整齐。

“如果你的主人知道有人想用一匹马的价钱买你，他一定会发疯的。”贝尔纳达说。

“我是自由人，我自己愿意卖。”他回答。接着又以把握十足的口气加了一句：“是的，夫人。”

“侯爵夫人。”她纠正说。

他彬彬有礼地向她鞠了个躬，这使她吃了一惊。她用他出的一半的价钱买下了他。据他说，“只是为了这愉快的相见。”作为交换，她尊重他的自由的人格并给他时间继续同马戏团的斗牛搏斗。

她把他安顿在一个离她的房间很近的、马夫住过的房间里。从第一个晚上起，她就不闩门、一丝不挂地等着他，相信他不用邀请自己就会来。但是她却等了两个星期：她欲火中烧，辗转反侧睡不香。

实际情况是，他一知道她是什么人并从内部看到她的住宅后，便立刻同她划清了主奴的界限，自知身份低下。然而，当贝尔纳达不再等他、把门闩插上、穿着衬衫睡下的时候，他却从窗口跳进她的房间。他的狐臭使房间的空气变得窒闷，把她憋醒。她感觉到他像牛头怪那样在黑暗中气喘吁吁地摸索着找她，感觉到他身上的热气直扑她的脸，感觉到他那双利爪抓住了她的衣衫领并把她的衬衫刺啦一声撕为两半，同时对着她的耳朵吼道：“婊子，你这个婊子。”从这个夜晚起，贝尔纳达知道，在有生之

年，别的事她什么也不想干了。

她为他失去了理智。夜晚他们一起去郊外参加灯火舞会。他像绅士那样穿着长礼服，戴着圆顶帽，这都是贝尔纳达按照她的爱好为他买的。她最初随便戴上一副面具，后来干脆什么也不戴了。她给他披金挂银，戴项链、戒指和手镯，在他的牙上镶了钻石。

当她发现他竟然和碰到的任何女人睡觉时，她觉得自己简直要气死了。但是最后还是委曲求全了。就是在那段时间，女奴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趁午休时刻走进她的房间，因为她以为贝尔纳达还在榨糖作坊那儿干活。结果撞见他们：双双光着屁股正在地上做爱。女奴不仅目瞪口呆，更是惊慌失措，抓着门环不知如何是好。

“别像个死鬼似的呆在这儿了！”贝尔纳达冲她吼道，“快给我滚开，不然你就在这儿和我们一起滚个够。”

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哐啷一声关上门走了。那哐啷声，贝尔纳达觉得简直像给她的一记耳光。当晚，她把她找来，威吓她说，对发生的那件事，她如果说出去，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放心吧，白女人。”女奴对她说，“你可以不准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听你的。”然后又说：

“不幸的是，你不能禁止我想任何事情。”

要是侯爵知道了，他会装聋作哑的。总而言之，西埃尔瓦·玛丽亚是他和妻子尚存的唯一共同的东西。他不把西埃尔瓦·玛丽亚当亲女儿看，而只当作她的女儿看。贝尔纳达则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甚至于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当她在榨糖作坊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后归来时，女儿长大了，和先前不同了，她竟然把她当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她把女儿叫来，打量着她，询问她的生活情

况，但是一句话也没从她的嘴里掏出来。

“你和你爹一样。”她对孩子说，“是个怪物。”

在侯爵从“上帝之爱”医院回来的那一天，夫妻俩的精神状态依然如故。他告诉贝尔纳达，他决定使用战争手段执掌家政。他讲话的样子急迫而激动，使贝尔纳达无言以对。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女儿的奶奶老侯爵夫人的卧室还给女儿，因为是贝尔纳达把她从那里赶出来并让她和奴隶们一起睡的。当年的富丽在尘土下依然原封未动：豪华的床榻铜光闪闪，奴隶们以为那是金的；还有那新娘用的罗纱蚊帐，装饰着金银绦带的华贵衣服，雪白色的卫生间——无数香水瓶和化妆品像军队一样整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轻便尿壶，青瓷的便盆和痰盂，这是因患风湿病而瘫痪的老妇人为她不曾出世的女儿和从未见过的孙女设想的梦幻般的世界。

当女奴们使卧室恢复了当年的面貌后，侯爵开始整顿这个家庭：他把那些在连拱廊下的阴凉里打盹儿的奴隶轰走，用鞭子和牢房威吓那些仍然在角落里大小便或在关闭的房间里耍钱赌博的奴隶。这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新措施。当贝尔纳达掌权、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执行的岁月，这些措施就曾严格地施行过，侯爵曾公开取笑她的极其重要的决定：“在我家里，做什么事情我都服从。”

但是当贝尔纳达沉浸于对可可豆的嗜好以及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死后，奴隶们便又悄悄地卷土重来。先是女奴们带着孩子来帮助干零活儿，随后是好逸恶劳的男奴们躲到走廊下去乘凉。贝尔纳达被败落的幻觉吓坏了，便打发他们到大街上去乞讨。有一次发生家庭经济危机，她决定解放奴隶，只留下三四个奴隶干

家务活儿。但是侯爵却毫无道理地反对说：

“如果叫他们饿死，就让他们死在这里，不能死在偏僻的角落。”

当西埃尔瓦·玛丽亚被狗咬伤后，他不再执行那些过分简单的规定。他把权力授予他认为最有威信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奴隶，让他执行他的指示，指示的严厉性连贝尔纳达本人都感到惊愕。在家里自从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死后第一次有了秩序的第一天夜里，他在女奴们的茅屋里发现西埃尔瓦·玛丽亚睡在六个黑姑娘中间，她们睡的吊床在不同的高度上彼此交错地悬吊着。他把她们全叫醒，他要把新的管理规定告诉她们。

“从现在起，这个孩子必须回房去住。”他对她们说，“你们要明白，整个王国也要明白这件事。而这个王国中只有一个家庭，它只由白人组成。”

他想把她抱回卧室去，孩子不肯，他不得不让她明白，安排世界秩序的是男人。回到奶奶的卧室后，他给她脱掉女奴们的粗布裙换上睡衣时，没有听见她说一句话。贝尔纳达在门口看到了他们：侯爵坐在床上，费力地扣着睡衣的钮扣儿，钮扣儿就是扣不进新扣眼。小女孩站在他面前，冷淡地望着他。贝尔纳达克制不住地嘲弄说：“你干吗不跟她们结婚？”她见侯爵不理她，便又说：

“生一些长着鸡爪的、本土的侯爵小姐，卖给马戏团，生意一定不坏。”

她身上有些东西也改变了。尽管她的冷笑很残酷，她的面孔却似乎不那么痛苦了。在她不忠实的内心深处流露出一丝同情心，侯爵没有感觉到。一听见她走远了，他便对孩子说：

“她是一头猪。”

他觉得孩子对此产生了一点感兴趣的火星。“你明白什么叫猪吗？”他问她，渴望得到她的回答。西埃尔瓦·玛丽亚却一声不吭。她让他把自己放在床上躺下，让他把她的头放在羽毛枕上，让他把散发着雪松木箱子的香味的床单盖在身上，一直盖到膝盖处，却没有慈悲地看他一眼。他觉得自己的心灵在颤动：

“你在睡觉前祈祷吗？”

女儿连看都不看他。由于睡惯了吊床，她像胎儿那样蜷着身子，没有说晚安就睡了。侯爵十分仔细地把蚊帐掖好，免得蝙蝠钻进去吸她的血。快十点了，赶走了奴隶，府邸清静了，但女精神病人们的合唱声让他难以忍受。

侯爵把那些大猎犬放出来，它们突然向祖母的卧室跑去，到了门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对着门缝乱闻。侯爵用手指肚抓挠着它们的头，告诉它们一条好消息，使它们安静：

“是西埃尔瓦在里头，从今天夜里起她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那些发疯的女病人一直唱到深夜两点，吵得他没有睡好。他和第一批打鸣的雄鸡一起醒来，他首先想到的是到女儿的房间看看。她不在那儿，而在女奴们的棚屋里。睡在最外边的女奴醒来，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

“她是自个儿来的，老爷。”没等他问，女奴抢先说，“她睡在这儿我都不知道。”

侯爵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他问她们，在西埃尔瓦·玛丽亚被狗咬着的时候，当时谁和她在一起。名叫卡里达德·德尔·科夫雷的唯一的黑白混血女人吓得哆哆嗦嗦地说是她。侯爵安慰了她。

“以后你要像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那样照管她。”他对她

说。

他对她讲了她应负的责任。他提醒她，一分一秒也不要让那孩子离开她，对她要亲热，要理解，但是不要什么都满足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她穿过竖立在奴隶们的院子和住宅其他部分之间的那道铁蒺藜围墙。早晨醒来和晚上睡觉前，要把孩子的情况全面地报告给他听，不要等着他问。

“做什么，怎么做，都要特别注意。”他最后说，“对我的这些吩咐，你必须一个人负责办到。”

早晨七点，把大猎犬关进笼子后，侯爵去了阿夫雷农西奥家。医生亲自出来开了门，因为他没有奴隶，也没有佣人。侯爵责备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应该受责备。

“我不该这个时间来你这儿。”他说。

医生对他敞开心扉，感谢他送的马。那匹马，他刚刚收到。他带他穿过院子，一直走到一个旧铁匠棚子里，现在那里只剩下一堆锻炉的废物。只有两岁的美丽的枣红马，离开了它依恋的马棚，显得惶惑不安。阿夫雷农西奥轻轻地拍着马脸抚慰它，同时用拉丁语对着它的耳朵低声地许着愿。

侯爵告诉他，那匹死马，他已经把它埋在“上帝之爱”医院的老园子里了。在霍乱流行期间，那个地方被确定为有钱人葬身的墓地。对这份非同平常的恩惠，阿夫雷农西奥深表谢意。他们这样谈话时，医生注意到侯爵远远地站一旁。侯爵坦白地说，他从来也不敢骑马。

“对马,我像对母鸡一样害怕。”他说。

“这是很遗憾的，因为同马的隔绝，使人类落后了。”阿夫雷农西奥说，“倘若有一天我们把这种隔绝打破的话，我们就能制

造半人半马怪了。”

由于有两扇窗子面对大海，房子内部显得挺亮。房子被一个铁石心肠的单身汉精雕细刻一般地收拾得井井有条。整个房子充满了香脂的芳香，不由得使人相信它具有药品的效力。有一张收拾得很整齐的写字台和一个玻璃柜，柜里摆满了青瓷瓶，瓶子上贴着拉丁文标签。能治病的竖琴① 丢在一个角落里，上面落满了金黄色的粉末。最显眼的是书籍，许多是拉丁文的，书脊都装饰得花花绿绿。那些书放在玻璃橱里、敞着的书架上，或者很仔细地摆在地上。医生在书籍的夹道里行走，就像犀牛在玫瑰花间穿行那么灵巧。侯爵却被那么多书压得喘不过气来。

“人们知道的一切知识大概都在这个房间里了。”他说。

“这些书毫无用处。”阿夫雷农西奥诙谐地说。“我的生命在治疗其他医生用药引起的疾病的过程中耗掉了。”

他把一只在他那把大安乐椅上睡觉的猫抱开，让侯爵坐下。然后，他把一杯他自己在炼丹炉上煎的草药汤端给他喝，一面谈论他的医疗经验，直到发现侯爵感到厌倦。果然，他突然站起来，转过身去，从窗口望着孤寂的大海。他一直背对着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了。

“硕士。”他低声叫道。

阿夫雷农西奥没有料到他这样叫他。

“啊哈？”

“由于医生严守职业秘密一丝不苟，也仅仅为了让你心中有数，我要老实对你讲，人们的传闻是事实。”侯爵用严肃的口吻说，“那只疯狗也咬了我的女儿。”

①阿夫雷农西奥曾用此琴为患者弹奏，减轻其病痛。

他望了望医生，发现他的神情十分平静。

“我早知道了。”医生说。“我猜想，你这么早到这儿来，一定为了这件事。”

“不错。”侯爵说。他又提出了早先就医院里那个被狗咬的人提过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呢？”

阿夫雷农西奥没有像前一天那样粗暴地回答，而是要求看看西埃尔瓦·玛丽亚。这也是侯爵想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两人不谋而合，马车就在门口等他们。

到家后，侯爵遇到贝尔纳达正坐在梳妆台前，像他已忘记的、他们做爱的久远年月那样卖弄风情地梳洗打扮，但是这次并不为了任何人。房间里飘着她的肥皂散发出来的春天般的香气。她在镜子里看见了丈夫，并不含讥讽地对他说：“我们是什么人，竟然送马给人家？”侯爵没有理睬她，只是从乱七八糟的床上拿起她平日穿的长衫，扔到贝尔纳达身上，毫不同情地命令她说：

“快穿上，医生来了。”

“我有救了。”她说。

“不是为你来的，虽然你很需要。”他说，“是来看女儿的。”

“对她毫无用处。”她说，“要么死，要么就这样活着，没有其他可能。”但是好奇心压倒了一切：“他是谁？”

“是阿夫雷农西奥。”侯爵说。

贝尔纳达十分气恼。她宁肯就这样赤身裸体、孤单地死去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荣誉交给一个暗藏的犹太人。他曾经是她父母的家庭医生，后来他们不用他了，因为他泄露病人的病情，以夸耀他的诊断。

侯爵反对说：

“尽管你不喜欢他，我更不喜欢他，但你是孩子的母亲。”他说，“就凭着这种神圣的职责，我要求你相信他的检查。”

“从我这方面来说，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已经死了。”贝尔纳达说。

和预料的相反，小女孩毫不忸怩作态，怀着查看一件带发条的玩具的好奇心接受医生对她的身体进行仔细的检查。“我们医生是用手看病的。”阿夫雷农西奥对她说。小女孩很高兴，第一次对他微微一笑。

她的健康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虽然她有一副贫血的模样，可是她的身体的机能很协调，她的肉体上布满了金黄色的、几乎看不见的汗毛，幸福的花朵含苞欲放。她的牙齿完美无缺，眼睛明亮，双脚平稳，双手灵巧，每一根头发都预示着长寿。她很有力量、很克制地回答居心叵测的提问。必须十分了解她才能发现她的回答没有一句是真话。只是在医生找到脚踝上那道很小的伤痕时，她的神色才显得紧张。阿夫雷农西奥自然而然地耍起了小心眼儿。

“你从哪儿摔下来过吗？”

小女孩不眨眼儿地肯定说：

“从秋千上摔下来过。”

医生开始用拉丁语跟自己说起话来。侯爵打断他说：

“请用西班牙语对我说话。”

“不是对你。”阿夫雷农西奥说，“我在用拉丁语自言自语。”

西埃尔瓦·玛丽亚对阿夫雷农西奥的检查很着迷，甚至让他把耳朵贴在胸前听诊。她的心房发出不安的咚咚声，她的皮肤上渗出了冰凉的、青紫色的、散发着强烈的葱头味的汗珠。检查完后，医生亲切地拍了一下她的小脸蛋儿。

“你很勇敢。”他对她说。

单独和侯爵在一起时，医生对他说，女孩知道那只狗有狂犬病。侯爵不懂他的话。

“她对你讲了许多谎话。”侯爵说，“但是这种谎话她不会讲。”

“不是她，先生。”医生说，“是她的心房告诉我的：她的心房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青蛙。”

侯爵花了一些时间重述了女儿说过的其他一些令人吃惊的谎话。但他讲述时不是怀着憎恶的心情，而是怀着做父亲的几分骄傲。“说不定她会成为诗人。”他说。阿夫雷农西奥不认为说谎是艺术创作的条件。

“作品越透明，诗意就越明显。”他说。

他唯一无法解释的事情是小女孩汗水的洋葱头味。由于他不清楚某种气味和狂犬病有什么联系，所以认为那种气味不是任何疾病的症状，便把它排除了。

后来，卡里达德·德尔·科夫雷对侯爵说，西埃尔瓦·玛丽亚偷偷地迷上了奴隶们的学问，他们让她嚼刺藤黄药膏，赤身裸体把她关在一间洋葱头储藏室里，以便消除狗的病毒。

阿夫雷农西奥不忽略狂犬病的最微小的细节。“被狗咬的伤口越深，伤口离大脑越近，发生的昏厥就越严重，越迅速。”他说。他想起了他的一个病人的情况，那个人是过了五年后死的。但是留下了疑问：他是不是后来传染上狂犬病而没有发觉？伤口迅速愈合不说明任何问题，过一段时间后，伤疤可能肿起来，重新裂开、化脓。死前遭受的折磨非常可怕，还不如死了好。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依靠“上帝之爱”医院，那里有有经验的塞内加尔人，他们对付发疯的异教徒和中邪者很在行。否则的话，侯爵本人必须忍受把女儿锁在床上直到她死去的痛苦。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他最后说，“没有一个狂犬病患者能够活下来讲述自己的病情。”

侯爵下定决心，十字架无论多么重，他也坚决地把它背在身上。这就是说，他要让女儿死在家里。医生赞赏地望了望他。那目光与其说表示尊敬，毋宁说是表示遗憾。

“在你来说，这样做也算够伟大的了，先生。”他对他说，“我不怀疑，你的心有承受不幸的勇气。”

他又一次坚持说，症状并不令人感到不安。伤疤离最危险的部位很远，谁也不记得出过血。西埃尔瓦·玛丽亚非常可能没有染上狂犬病。

“那么与此同时该做什么？”侯爵问。

“与此同时，”阿夫雷农西奥说，“让她听音乐，把家里摆满花，让鸟儿歌唱，带她到海边看夕阳，把一切使她感到快乐的东西送给她。”

医生挥了挥帽子，并照例讲了一句拉丁格言跟他告别。但是这一次，为尊重侯爵，他把格言翻译出来了：“快乐治不好的病，药也治不好。”

二

人们从来不知侯爵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懒懒散散，也不知他为什么要维持一种如此不和睦的婚姻，而他本来是可以勇敢地过一种平静的鳏居生活的。当初他完全做得到心想事成，因为老侯爵跟他父亲——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有生杀大权的黑奴贩子、冷酷无情的军团长，国王陛下慷慨地赐予他荣誉和俸禄，却不惩处他的不公正行为——的权势太大了。

但是，唯一的继承人伊格纳西奥却很平常。他的生长表现出智力发育滞后的明显迹象，直到应该有所建树的年龄还不识字，并且也不喜欢任何人。到了二十岁才显露出生命的第一个征兆，这就是萌发了爱情，愿意和“神圣的牧羊女”疯人院的一个疯女人结婚；那个女人的歌声和叫喊声是他童年的催眠曲。她叫杜尔塞·奥利维娅，是国王的一个皮匠家中的独生女。她必须掌握制作马鞍的工艺，免得让这个保持了几乎两个世纪的手艺失传。正是这种本来是男人们干的工作使她丧失了理智。而且她的病情相当严重，为了教她明白不要吃自己的粪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果没这种病，对一个如此智商低的土生侯爵来说，她一定是一个极为合适的结婚对象。

杜尔塞·奥利维娅聪明伶俐，为人憨厚，很难发现她精神失常。从第一次看见她后，年轻的伊格纳西奥就觉得她在平台上那些喧嚣的疯女当中与众不同。就在那一天，他和她通过手势彼此心领神会了。她是扎风筝的能手，把情书叠成小鸽子抛给他。为了和她通信，他学会了读书、写字。这是一次正当的热恋的开始，但是谁也不愿意给予理解。老侯爵恼羞成怒，威吓儿子公开否认此事。

“这不但是事实，”伊格纳西奥回答，“而且她已允许我向她求婚。”针对老侯爵关于精神病的言论，他以自己的理由反驳说：

“如果一个人按照疯子的思维逻辑行事，他便不是疯子。”

他父亲这位和主人与老爷的身份不相称的家长下了一道命令，把他流放到他家的牧场去。这等于活活地让他等死。他害怕动物，若是母鸡则略好一点。但在牧场里，他却从近处观看一只活生生的母鸡，将那只母鸡在他的想象中变得愈来愈大，大得像一头奶牛。他觉得那是一个怪物，比陆地上和水中的任何怪物都

可怕。在黑暗的夜里，他出了一身冷汗。早晨他醒来时，面对牧场的可怕寂静，他感到不安。那只大猎犬蹲在他的卧室门前不眨眼地守护着，他觉得它比其他任何危险的东西更使他心惊肉跳。他说：“我因活着而担惊受怕。”在牧场的流放中，他养成了阴郁的性情、暗中观察事物的方式、好沉思的性格、懒惰的习惯、缓慢的讲话方式和神秘的信仰。这种信仰似乎注定使他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斗室里。

在流放的第一年，一次他被涨水的大河般的轰鸣声惊醒。原来是牧场的所有动物离开它们的栖息地，在满月下的万籁俱寂中穿越着田野。它们静静地打翻阻挡它们的一切，朝着草场、甘蔗田、激流险滩和沼泽地跑去。大牲口和驮马群在前头，猪、羊、鸡、鸭在后头，以不祥的队形消失在黑夜里。甚至包括鸽子在内的善飞的鸟类也步行而去。只有大猎犬在主人的卧室门前的哨位上守到天亮。这是侯爵同这只大猎犬和他家中后来养的许多猎犬保持的近乎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的开始。

被牧场荒凉可怕的景象所压倒，年轻的伊格纳西奥放弃了他的爱情，屈服于他父亲的安排。他父亲牺牲了他的爱情还不够，还把遗嘱中要求他同一位西班牙贵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条款强加给他。他就这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美貌出众、有着多方面的非凡才能的女人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成了亲。结婚后，他让她保持着她的童贞，连生个儿子的恩惠也不给她。后来，他仍然像他出世后一直生活的那样，过着不幸福的单身生活。

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把他推向了社会。双双去望大弥撒，与其说是去做礼拜，不如说为了炫耀于人。她穿着大幅的裙子，披着华丽的斗篷，包着卡斯蒂利亚的白女人用的那种浆过的花边头巾，身后跟着穿绸缎衣、戴满金首饰的女奴。她没有穿那

种在家里穿的、只有那些装模作样的女人才会在教堂里穿的拖鞋，而是套着装饰着珍珠的熟山羊皮高统靴子。和那些头戴不合时代潮流的假发、衣服上钉着祖母绿纽扣的达官贵人不同，侯爵只贴身穿着一身棉布衣，戴着一顶软帽。但是他却常常是被迫参加公众活动，因为他永远也克服不了对社交活动的恐惧心理。

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在塞哥维亚曾是斯卡拉蒂·多美尼科① 的学生，荣幸地获得在学校和修道院教音乐和唱歌的许可证。她来到这儿时，带来一架击弦古钢琴的零部件，她自己把它装好了；还带来了不同的弦乐器，她自己弹，也教别人弹，弹得非常熟练。她组建了一个初学者乐团，乐团以意大利、法国的新空气把家庭的下午变得神圣了。关于这个乐队，人们甚至说它是从圣灵抒情诗那里获得灵感的。

侯爵似乎缺乏音乐才能。照法国人的说法是，他有一双艺术家的手和炮兵的耳朵。不过，自打拆开乐器的包装那天起，他就开始注意意大利古诗琴：它那奇怪的双琴头、它的指板的大小、它的弦的数量和它那清晰的声音。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非要他弹得跟她一样熟练不可。每天早晨他们都是在果园的树下练习弹琴中度过的。她怀着爱情和耐心，他则像石匠那么顽强不懈，直到悔恨的情歌毫不遗憾地向他们投降。

音乐使他们的夫妇关系大为改善，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甚至敢于跨出她一直未跨出的一步。一个暴风雨之夜，也许是假装害怕，她跑进没跟她同过房的丈夫的卧室里。

“这张床的一半是我的，”她对他说，“我要睡在这半张床上。”

① 斯卡拉蒂·多美尼科（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古钢琴家。

侯爵坚持要她回去。而她相信可以用道理或强力说服或压服他，便也坚决不走。但是生命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十一月九日，他们双双在甜橙树下弹琴，因为那里空气纯净新鲜，天空万里无云，这时一道耀眼的闪电闪过，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巨响使他们惊慌失措，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被雷电击倒了。

惊恐不安的城市认为这场灾难是某种见不得人的罪孽引起上帝大发雷霆的结果。侯爵安排举办了葬礼。在葬礼上，他第一次穿着黑色的塔夫绸丧服、面色憔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此后他再也没有把丧服脱掉。从墓地回来后，他发现果园的甜橙树上落满了雪白的小纸鸽儿。他信手够了一只，展开来一看，上面写着："那道闪电属于我。"

不等九日祭结束，他就把支撑着长子的权势的物质财富捐给了教堂，其中包括：位于莫姆波斯和阿亚佩尔的两座牧场，离家只有十二英里的马阿特斯的两千公顷地和几群供骑用和表演用的马匹，一座农场和加勒比沿海地区最好的榨糖作坊。然而关于他的财富的说法，是以一座闲置的大牧场为基础的。在人们的记忆中，想象的大牧场边界消失在拉瓜里帕沼泽地和拉普雷萨低洼地那边，直到乌拉瓦地方的那片低湿地带的丛莽。他保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他家的那片深宅大院和变得十分狭小的奴隶庭院，以及马哈特斯榨糖作坊，他把住宅的管理权交给了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让年迈的内普图诺仍保留老侯爵赐予他的车夫的工作，并把家里所剩余的马匹交给他饲养。

他第一次独自住在前辈们的昏暗的宅院里，在黑暗的夜里几乎睡不稳，因为他们这些高贵的土生白人生来就害怕在梦中被自己的奴隶杀死。他常常突然醒来，不知道从天窗上往里探望的眼睛是人间的还是阴间的。他踮着脚走到门口，猛然打开门，发现

一个黑人正从锁眼里窥视他。他们赤身裸体、抹着椰子油在走廊里悄悄地溜来溜去，免得被抓住。这么多可怕事情凑在一起，他不知所措，便下令家里的灯烛要通宵不灭，把一步步侵占着空闲地方的奴隶逐出家门，并把经过作战训练的第一批大猎犬带到家里来。

大门关闭起来。把一泛潮就散发臭味的法国丝绒家具扔在一边，把哥白林双面挂毯①、瓷器和钟表精品卖掉，满足于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躺在用牛蒡编织的吊床上乘凉。侯爵没有再去望弥撒和静修，在宗教游行时没有佩戴至圣的白肩饰，不再过弥撒日，也不过四旬斋，尽管他准时向教会交纳税款。他躲在吊床上，有时是因为八月间卧室里太闷热，但几乎总是为了在甜橙树下睡午觉。隔壁的疯女们向他投掷残渣剩饭，大声对他说撩拨人的下流话。但是当政府愿意帮助他搬走精神病院时，他却由于喜欢她们而提出了异议。

杜尔塞·奥利维娅面对情人的冷淡态度泄了气，只好借徒劳的怀念安慰自己。一有机会她就从果园的小门溜出“神圣的牧羊女”精神病院。她用可口的精饲料驯养那些大猎犬，让它们听她的话，用睡觉的时间去收拾她从来也没有住过的房子，用罗勒扫帚清扫它，好为它带来好运气，并把蒜辫子挂在卧室里，好驱逐蚊虫。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从不随意摆放东西，但她至死也不知道每天早晨的走廊为什么总比前天晚上还干净，她用她的方式摆放的东西为什么第二天早晨总改变了位置。在侯爵的鳏居生活不满一年的时候，他偶然碰见杜尔塞·奥利维娅在擦洗她觉得被女奴们保管得不好的家具杂物。

①法国巴黎特产。

“我真不相信你会这么大胆。”他对她说。

“因为你还是往日那个懦弱的老实人。”她回答说。

这样，一种曾被严禁的、至少一度算是爱情的友谊又恢复了。两个人一直谈到天亮，既不抱幻想也并不绝望，就像一对命中注定要墨守成规的老夫妻。他们相信他们会幸福的，也许已经是幸福的了，甚至两人中有人讲了一句不该说的话，采取了不该采取的行动。夜晚在一群发疯的人的争吵声中腐烂，大猎犬被吵闹声弄得无精打采。于是，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此后，杜尔塞·奥利维娅很久没有再到他家里来。

侯爵坦白地告诉她，他之所以放弃财产，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并非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是由于看到妻子肉体被雷电化为灰烬时突然失去了信仰，使他产生了恐惧。杜尔塞·奥利维娅愿意安慰他。她保证做他的奴隶，无论在厨房里还是在卧室里。他没有答应。

“我永远不再结婚。”他对她起誓。

然而，没过一年，他又偷偷地和贝尔纳达·卡夫列拉结了婚。她是他父亲在海外经商发迹时用过的一个老监工的女儿。当老监工要她把堂娜奥拉利亚爱吃的卤大西洋鲱和黑油橄榄送到他家的时候，他们认识了。堂娜奥拉利亚死后，她仍然给侯爵送这些东西。一天下午，贝尔纳达看见他躺在果园里的吊床上，便拉过他的左手来给他看手相。发现她看得那么准，侯爵很激动。从此后，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要买，他仍然在午休时把她叫来。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他却一点儿也不主动。于是她采取了行动。她突然跳上吊床压在他身上，用他穿着的外衣下摆堵住了他的嘴，一直把他弄得精疲力竭。然后用她的热情和智慧使他振作起来；这一切，在他独身的爱情中少得可怜的快乐中，他是不敢想象的。最

后，她不顾一切地剥夺了他的童贞。他已经五十二岁，她却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年龄的差别并没有什么妨碍。

后来，午睡时间，他们仍然在甜橙树下做爱，但总是匆匆忙忙，没有爱情。疯女们站在平台上不知羞耻地唱着歌儿为他们加油，像在运动场上那样为他们的胜利欢呼。未等侯爵明白等待着他的危险，贝尔纳达便带来已怀孕两个月的消息，使他从麻木状态中醒来。她提醒他说，她不是黑女人，而是一个拉迪诺① 和一个卡斯蒂利亚白女人的女儿，因此，缝补被破坏的贞操的唯一的针线就是正式成亲了。他一直拖延着，直到她父亲在午睡时刻背着一支旧火枪来敲他的大门。他说话慢慢吞吞，表情和蔼。他把火枪交给侯爵，没有看他的脸。

“侯爵先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问他。

侯爵手里拿着武器，不知怎么办。

“根据我掌握的知识，我想这是一支火枪。”他说。然后，他真正好奇地问：

“那你用这个干什么？”

“为了防备海盗，先生。”土著人说，仍然没有看他的脸。“现在我把它交给你，请你大发慈悲，把我打死，不然我就打死你。”

侯爵望了望他的脸，他有一双忧伤而无声的小眼睛，但是侯爵明白他的话中包含的意思。他把火枪还给他，请他进来谈谈，以便达成协议。两天后，附近一座教堂的教区神甫和女方的父母及双方的证婚人一道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时，谁也不知道莎贡塔从哪里冒出来，给新娘新郎戴上了幸福的花环。

①拉迪诺，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儿。

一个落着小雨点的早晨，在人马星座下，妊娠七个月的不幸的西埃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出世了。她像个毫无生气的小蝌蚪，缠在脖子上的脐带差一点把她勒死。

“是个女孩，”接生婆说，“不过，她活不长。”

就是这个时候，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对她的神灵许下了愿：诸神灵如果发善心让女孩活下来，在新婚之夜到来之前决不让她把头发剪短。她刚许完愿，孩子就哇地一声哭了。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高兴地叫道：“她一定是个圣女！”等孩子被洗净包起来后，侯爵看了看她，他的眼力不如多明加。

“如果上帝让她健康地活下来，”他说，“她一定是个妓女。”

这个女孩，贵族父亲和平民母亲生的女儿，童年如同孤儿。母亲只让她吃了一次奶，就憎恨起她，由于害怕会把她掐死而拒绝把她带在身边。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喂她，为她举行基督教洗礼，并祈求奥洛昆保佑她。奥洛昆是一个性别模糊不清的约鲁瓦神，他的面孔在人们的想象中非常可怕，只有在夜间才显现，而且总是戴着面具。后来，西埃尔瓦·玛丽亚被安排到奴隶们的院子里住，还不会说话就学会了跳舞，同时学会了三种非洲语言，学会了在早饭前喝鸡血，并能在基督教徒中间行走，既不会被人看见也不会被人觉察，就仿佛一个无形的生灵。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让她生活在一群快活的黑女奴、混血女佣人、印第安女帮工中间，她们用有利于健康的水给她洗澡，用耶马亚的马鞭草给她擦身，像照管一株玫瑰一样关心她的浓密的长发，才五岁那长发就长达她的腰部了。女奴们渐渐地把一条条挂着不同的神像的项链给她戴上，一直给她戴了十六条。

贝尔纳达已经用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家庭的权力，侯爵却在果园里闲居。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恢复被丈夫分掉的、在老侯

爵的权势保护下的财产。老侯爵在世时获得许可，可以在八年内贩卖五千个奴隶，同时按合同配额每个奴隶从国外进口两桶面粉。凭着他的精明骗术和对海关检查员的收买，他卖掉了商定的面粉，但是他也通过走私超额卖掉了三千个奴隶，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幸运的个体商贩。

贝尔纳达想到，赚钱的买卖不是贩卖奴隶，而是贩卖面粉，尽管大买卖实际上都对她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仅仅由于获准四年内进口一千个奴隶，同时按每个奴隶进口三桶面粉，她就发了大财：她卖掉了商定的一千个黑奴，但是她进口的面粉不是三千桶，而是一万两千桶。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走私活动。

那时，她的一半时光是在马阿特斯榨糖作坊度过的。她把那里确定为她的生意中心，因为那地方离马格达莱纳大河近，便于同总督辖区内地进行各种交易。关于她的买卖兴隆昌盛的零星消息是传到侯爵家里来的，因为她对谁也不透露她的买卖的情况。在她在这里度过的时间里，即使在他俩的危机发生前，她也仿佛是另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大猎犬。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说得好"：她总是焦躁不安。"

照看她的女奴死后，西埃尔瓦·玛丽亚第一次在家里有了一个安稳的地方。人们为她收拾了老侯爵夫人住过的富丽堂皇的卧室，并给她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教她学习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语，掌握算术和自然科学概念。但教师想教她阅读和写字时，她却拒绝学习，说她不明白那些字母是什么。一位世俗的女教师开始叫她欣赏音乐。小女孩很感兴趣，很高兴。但是她没有耐心学习任何乐器。女教师突然辞了职，和侯爵道别时，她说：

"不是因为这孩子能力差，什么也学不会，而是因为她不属于这个世界。"

贝尔纳达本想把自己的怨恨压下去，但是很快她便明白了：过错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女儿的，而是双方的性格问题。自从她在女儿身上发现了某种幽灵的属性后，她便一直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一想到回头看时会遇到一个罩着可怖的眼纱、留着达到膝窝的野人的长发的女孩的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她就浑身发抖。“孩子！”她冲她喊道，“不准你这样看我！”当她比较聚精会神地忙她的生意时，觉得脑后有一股像伺机捕食的蛇发出的咝咝的喘气声，把她吓一跳。

“孩子！”她冲她叫道，“进来前要言语一声！”

女儿讲了一通约鲁瓦话，更加使她感到恐惧了。晚上的情况更糟，因为她觉得有人碰她，她突然惊醒，原来是女儿站在床边看她睡觉。让她手里拿着一个铃铛也没有用，因为西埃尔瓦·玛丽亚的静悄悄的活动使小铃铛不会作响。“这孩子只有肤色像白女人。”母亲说。一点儿也不错，小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换成了人们编造的另一个非洲名字“玛丽亚·曼丁加”。

一个大清早，贝尔纳达由于吃了太多的可可豆而渴得醒来，看见西埃尔瓦·玛丽亚的一个玩具娃娃漂在大水缸里，于是母女关系发生了危机。贝尔纳达认为，实际上在水缸里漂着的玩具娃娃绝不平常，肯定是一种可怖的东西：一个咽了气的娃娃。

她相信这是西埃尔瓦·玛丽亚用来对付她的一种非洲妖术，便决定母女俩不能同住在这房子里。侯爵想试着调解一下，她坚决地回答他说：“她不走，我走！”结果，西埃尔瓦·玛丽亚又回到女奴们的棚屋，尽管当时她母亲常住在榨糖作坊，她依然像出生时那样一声不响，一个字也不识。

但是贝尔纳达的情况也并不比原先好。她本想把胡达斯·伊斯卡里奥特留下，平等待他。只是不到两年的工夫，她就迷失了

做生意的方向，生活本身的方向也迷失了。她把他化装成努比亚海盗、金棒花 A、梅尔乔博士，把他带到城郊，特别是在商船队停泊和城市沉浸在长达半年的热闹之中的时候。人们在城外临时开设了酒店和妓院，迎接从利马、波托贝洛、哈瓦那和韦拉克鲁斯到这儿来抢购整个被发现的世界的产品和货物的商人。一天晚上，胡达斯在一个苦役犯们出入的小酒店里喝得烂醉，挨到贝尔纳达身边十分神秘地对她说：

“你张开嘴,闭上眼。”

她照他说的做了。他在她的舌头上放了一粒神奇的瓦哈卡巧克力糖。贝尔纳达知道是什么，随即吐了出来，因为她从孩提时起就特别讨厌可可豆。胡达斯要她相信，那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它可以使人的生命旺盛，增强体力，振奋精神，加强性机能。

贝尔纳达听了不禁爆发出一阵大笑。

“如果是这样，”她说，“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不都壮得像斗牛一样了？”

她特别爱吃发酵的蜂蜜，结婚前她就和学校里的女友们吃。如今在榨糖作坊的热乎乎的空气里，她仍然吃，不但用嘴吃，而且用五官吃。她和胡达斯在一起学会了嚼烟叶和拌着甜棕灰的可可叶，就像内华达山区的印第安人那样。她在酒馆里尝过印度大麻毒、塞浦路斯的松节油、雷亚尔·德·卡托尔塞[①] 的老头掌[②]，至少尝过一次中国船上由菲律宾商人贩卖的鸦片烟。但是，对胡达斯所做的关于可可豆的宣传，她并没有当耳旁风。其他的种种癖好失灵后，她承认可可豆的功能，结果比什么都更喜欢它了。

①墨西哥地名。

② 仙人掌科植物，产于墨西哥，可制毒品。

胡达斯变成了强盗、淫媒，偶尔也干鸡奸的勾当。这全是由于恶习所致，因为他什么也不缺。一个不幸的夜晚，在贝尔纳达面前，他赤手空拳和三个苦役打起来，因为赌牌发生了争吵。他举起凳子，把他们砸死了。

贝尔纳达躲避在榨糖作坊。那个家已是风雨飘摇。从那时起它之所以像船一样没有沉没，多亏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的一双巧手。她按照她的神灵们的指点完成了对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教育。侯爵几乎对妻子的病危一无所知。从榨糖作坊传来消息说她已处于昏迷状态，有时自言自语。在她的淫乐之夜，她挑了一些最勤快的奴隶供她和她在学校时的女友们使唤。财富随水漂来，又随水漂去，她全凭一袋袋蜜糖和可可豆度日；她把蜜糖和可可豆藏在这儿那儿到处都有，以便在她急切地渴望吃的时候可以随手拿来。如此这般，她尚拥有的东西就剩下两个装满了一百元和四元纯金币的罐子了。当初家道兴旺之时，她把它们埋在了床底下。她的健康状况如此糟糕，当她一连三年不在家，于西埃尔瓦·玛丽亚被狗咬伤前不久第一次从马阿特斯回来时，她丈夫都不认得她了。

三月中旬，狂犬病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了。侯爵为自己的好运庆幸不已，他打算弥补过去的不足，用阿夫雷农西奥提出的、使女儿得到幸福的妙方来取得她的好感。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她身上了。他设法学着给她梳头，给她编辫子。他设法教她做个真正的白女人，设法为她复原他这个高贵的土生白人被打破的梦，改变她对卤制鬣蜥和犰狳肉菜的嗜好。他什么都想为她做，却不想一想他的做法会不会使她幸福。

阿夫雷农西奥仍然到侯爵家来拜访。要他同侯爵达成一致是

困难的。不过，他对侯爵那种置身在一个被宗教裁判所吓坏的世界的边缘地带而凡事满不在乎的态度很感兴趣。他在花儿盛开的甜橙树下侃侃而谈，不管对方听不听；侯爵在距离一位从没有听说过他的国王一千三百海里的吊床上“腐烂”；他们就这样送走了炎热的月份。在这样一次拜访中，他们的交谈被贝尔纳达悲哀的呻吟声打断了。

阿夫雷农西奥吃了一惊。侯爵假装没听见。但是第二声呻吟是那么令人心碎，他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无论他是谁，都需要安魂经。”阿夫雷农西奥说。

“是我续弦的妻子。”侯爵说。

“准是她的肝脏坏了。”阿夫雷农西奥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呻吟时张着嘴。”医生说。

他冒昧地推开门，想看看贝尔纳达。房间里黑糊糊的。她不在床上。他喊她的名字，她没有回答。于是他推开窗子，四点钟的金属般的光辉射进来。只见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伸开双臂躺在地上，全身笼罩着死亡的可怕光辉。她的皮肤由于溢出的黑色胆汁而呈死灰色。她抬起头，被突然打开的窗户射进的光线照得眼花，没有认出医生来。他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命运。

“猫头鹰在为你歌唱，我的孩子。”他对她说。

他对她解释说，只要她接受一次换血的紧急治疗，还能有救。贝尔纳达终于认出了他，费力地坐起身，冲他破口大骂起来。阿夫雷农西奥漠然地让她骂，一面重新把窗子关上。道别前，他停在侯爵的吊床前确切地说出他的诊断：

“侯爵夫人最迟将在九月十五日死去，如果她不悬梁自尽的话。”

侯爵不动声色地说：

“糟糕的是，九月十五日那么遥远。”

他继续设法使西埃尔瓦·玛丽亚感到幸福。父女俩站在圣拉撒路山上，向东他们看见了荒凉的沼泽地，向西看见了硕大的红太阳正沉向如在烈火中的海洋。女儿问他大海彼岸有什么，他回答说：“有一个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在女儿身上引起意想不到的共鸣。一天下午，他们看到苦役船队扬着鼓鼓的帆出现在地平线上。

城市的面貌改变了。父女俩快乐地观看木偶戏、吞火表演；在那个有着好兆头的四月，集市上的许多新鲜事传到港口上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西埃尔瓦·玛丽亚见识的白人的事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侯爵竭力想把女儿变成另一个人，他自己也和从前不同了。他发生的变化如此彻底，以至他改变的似乎不是性格，而是天性。

家里摆满了在欧洲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各种上发条的会跳舞的玩具娃娃、八音盒和机械表。侯爵擦掉古诗琴上的尘土。给它安上弦，怀着只能被认为是爱心的恒心调琴音，又自弹自唱起了往年唱过的歌曲。他的嗓音优美，耳朵却不灵，无论是岁月还是朦胧的记忆都没有能把它们改变。在那些日子，女儿问他，是否真像歌里唱的那样“爱能够战胜一切”。

“是的。”他回答，“不过，你不相信也是对的。”

看到这些新的起色，侯爵很高兴。他开始考虑去塞维利亚旅行的事，好通过旅行使西埃尔瓦·玛丽亚从无声的痛苦中振作起来，结束她关于世事的教育。当卡里达德·德尔·科夫雷把他从午睡中唤醒告诉他一个无情的消息时，旅行的日期和路线都考虑好了：

“ 先生,我可怜的小姐正在变成一条狗。”

阿夫雷农西奥被紧急地叫来，他破除了民间流传的、关于狂犬病人最后会变得和咬过他的狗一样的迷信。他检查了一下，发现小女孩有点发烧；虽然发烧本身也是一种病，并非是其他疾病的一种征兆，但他没有忽视。他提醒痛苦的先生说，他女儿还无法排除任何一种疾病，因为被狗咬伤后，不管它带不带狂犬病毒，都不会对其他病有什么预防作用。就像往常那样，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侯爵问他说：

“ 这是你能对我说的最后的办法吗 ?”

“ 科学没有教给我更多的办法。 ”医生以同样生硬的口吻回答他说，“ 不过，倘若你不相信我，你还有另外一个办法：相信上帝。”

侯爵不明白他的意思。

“ 我原以为你是个不信教的人。”他说。

医生几乎没有回头看他：

“ 我还能有别的什么希求呢,先生。”

侯爵不相信上帝，只相信一切给他某种希望的人。在城市里，还有另外三个大学毕业的医生、六个药剂师、十一个为病人放血的理发师、不计其数的庸医和从事巫术行业的拉丁文教师，尽管宗教裁判所在近五十年间已判处一千三百人不同的徒刑，将六人投入火中烧死。一位年轻的萨拉曼卡医生把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愈合的伤口割开，敷上一帖糊剂，好把长期积存的脓吸出来。另一位医生为此目的在她的背上放了几只医蛭。一位放血的医生用她自己的尿给她洗了伤疤，另一位医生则让她喝她自己的尿。两个星期后，她每天忍受两次青草浴和两次软化剂灌肠，用天然锑药水和其他致命的迷魂汤把她推到了濒死的边缘。

烧退了，但是谁也不敢宣布狂犬病毒已经解除。西埃尔瓦·玛丽亚觉得自己要死了。一开始，她十分自爱地忍受着，但是忍受了两个星期也毫无结果，她的脚踝上有了一块火烧的溃疡，皮肤被芥子泥和起泡剂烫伤，胃受到损伤。什么她都经受了：头晕眼花、痉挛、抽搐、昏迷、腹泻、疼得或气得在地上打滚、嚎叫。连最有胆量的庸医们也把她交给了命运去安排，因为他们相信她疯了，或被魔鬼控制了。当莎贡塔带着圣乌贝尔托的秘诀来到侯爵家时，侯爵已经绝望了。

这是最后一招。莎贡塔脱去她的披风，在身上涂印第安人的油脂，以便使自己的肉体同西埃尔瓦·玛丽亚的赤裸的肉体磨擦。后者虽然非常虚弱，还是手脚并用极力反抗。莎贡塔强迫她服从。贝尔纳达在房间里听到了疯狂的喊叫声，赶忙跑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她看到西埃尔瓦·玛丽亚在地上踢蹬，莎贡塔身上披着波浪般的铜色长发骑在玛丽亚身上，一面怒吼似的诵着圣乌贝尔托的经文。贝尔纳达用吊床的挂绳抽她们俩。她们先是在地上惊慌地蜷缩在一起，后来又被贝尔纳达追打得各个角落乱窜，直到她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教区主教堂托里维奥·德·卡塞雷斯·伊比尔图德斯对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精神失常和胡言乱语引起的满城风雨感到不安，便给侯爵捎去一个口信，其目的、日期或时刻都不清楚，结果被看作一个万分紧急的信号。侯爵克制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当天未事先通报就去了。

主教走马上任时，侯爵已退出公众活动，所以二人未曾晤谈过。此外，由于健康状况欠佳，主教命中注定有一个硕大的身躯，使得他不能独立生活；此外他还忍受着恶性哮喘病的折磨，

使他的信仰受到了考验。他不在众多的公众活动中露面，尽管他的缺席令人难以理解。而在他出席的不多的社会活动中，他也远远地躲在一边，这渐渐使他变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人。

侯爵见过他几次，但也总是离得很远并且在公共场合。不过，他所保留的关于主教的记忆是一次共同主持的弥撒，主教由政府的达官贵人用担架抬着，怀着热情主持了那次弥撒。由于身躯高大和他那身华丽的法衣，一看就觉得他像一位巨人般的老人。不过，他那张五官端正、有一双少见的绿眼睛、未留胡子的面孔却保持着一种不受年龄影响的始终不变的美。他坐在担架上，俨然笼罩着教皇那种光环，凡是了解他的人都会感觉到他那智慧的光芒和强烈的权力欲。

他住的楼房是城里最古老的，共两层，相当宽敞，只是太破了。主教连半层楼也没占用。楼房挨着大教堂，和教堂共用一条拱顶已发黑的回廊。楼房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荒凉的灌木丛中有一个毁坏了的雨水池。连用方石块砌的威严的楼房正面和整体木门也现出一副年久失修的破败模样。

侯爵在大门口受到一名印第安人执事的迎接。他把一些小东西施舍给在门廊里爬来爬去的乞丐们，走进了凉爽的、半明不暗的楼房。这时，从大教堂传来钟声，下午四点轰鸣的钟声在他的腹腔里回荡。中心通道异常黑暗，他甚至看不见带路的执事，每一步都得注意别撞在摆得不稳的雕像和横在路上的瓦砾堆。在通道的尽头，有一间小接待室，里头被天窗透下来的光线照得挺亮。执事走到那儿停下，让侯爵坐在那里等着，他走进旁边的一道门。侯爵站着察看正面墙上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像：上面是一位身穿国王的旗手的华丽制服的年轻军人。直到看到像框上的铜牌儿后才明白，那原来是主教年轻时代的画像。

执事拉开门请侯爵进去。他毫不费力地再次看见了比画像上老四十岁的主教。他比人们说的要高大得多、威武得多，只是仍然忍受着哮喘的困扰，热得透不过气来。他脸上流着汗水，坐在菲律宾摇椅上缓缓地摇着，用芭蕉扇轻轻地扇着，为了更好地呼吸而向前探着身子。他穿着一双农民穿的那种系带凉鞋，一件粗麻布无袖衬衫。由于过多地使用肥皂，衬衫上有多处搓破的地方。简朴度日的老实态度一眼就能看出来。然而，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那双眼睛的纯洁目光，这只能认为他的心灵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一看见侯爵出现在门口，他就停止了摇晃，用扇子亲切地招呼他。

“请进，伊格纳西奥。”他说，“这也是你的家嘛。”

侯爵在长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汗水，进了门，走到由黄色钟状花和吊着的欧洲蕨形成的“华盖”下面的一块露天平台上，从那里可以望见所有教堂的钟楼、高大的房舍的红房顶、由于天热而昏昏欲睡的鸽群、明亮的天空下清晰可见的军事设施和冒着火焰似的大海。主教真诚地伸出他那老战士的手，侯爵吻了一下戒环。

由于哮喘，主教的呼吸十分困难。他的话常常被不适时的叹息和猛烈而短暂的咳嗽打断。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口才。很快彼此便聊起了日常琐事。侯爵坐在他对面，他那番令人欣慰的、海阔天空、内容丰富的开场白令侯爵感激。但是他们的交谈被五点钟的钟声打断。那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且是一种强烈的震动，震得下午的光线直颤抖，受惊的鸽子满天飞。

“真可怕，”主教说，“每个小时它都像地震一样在我的五脏六腑里回荡。”

他的话使侯爵感到惊讶，因为四点的钟声响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想的。主教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巧合。“思想不属于任何

人。”他说。他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串连续不断的圆，又说：

“思想像天使一样在附近飞舞。”

一个当佣人的修女提来一只盛着泡有水果丁的浓葡萄酒的双耳凉水瓶和一个盛着冒热气的、使空中充满了药味的热水盆。主教闭着眼睛吸着那种热气。当他陶醉地吸完气抬起头来时，他和刚才完全不同了，开始使用他的绝对权力。

“我们叫你到这儿来，”他对侯爵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你需要上帝帮助，你却假装若无其事。”

他的声音没有了风琴般的音调，眼睛恢复了尘世的光辉。侯爵将半杯酒一饮而尽，顺着他的话茬儿说：

“阁下应该知道，我正忍受着一个人能够忍受的最大的不幸。”他垂头丧气地说，“我不再相信他了。”

“我们知道，孩子。”主教毫不惊讶地说，“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

他说这句话时流露出某种快乐心情，因为他二十岁作为国王的少尉在摩洛哥服役时，在战争的枪炮声中，也曾失去了信仰。“是突然觉得上帝不存在了。”他说。他恐惧地过着一种祈祷和悔罪的生活。

“直到上帝同情我，给我指出了信仰之路。”他说，“所以，最要紧的不是你不相信上帝，而是上帝仍然相信你。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你拼命奋斗之时，是他指引我们给你这种安慰。”

“我本想不声不响地忍受我的不幸。”侯爵说。

“可是结果很不好。”主教说，“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的不幸的女儿全身抽搐，不顾廉耻地在地上打滚儿，狂吠似的说着偶像崇拜者们的黑话。这不是中邪的明显征兆吗？”

侯爵惊恐不已。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在魔鬼的无数狡诈伎俩中，采用可憎的疾病的形式钻进一个无辜的人的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他说，“他一旦钻进人的肉体，人类的力量是难以把他赶出来的。”

侯爵介绍了女儿被狗咬伤后医生的治疗情况，但是主教总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他提了个无疑他十分清楚的问题：

“你知道阿夫雷农西奥是什么人吗？”

“他是第一个为我女儿看病的医生。”侯爵说。

“我一直想听你亲口说。”主教说。

他拿起手边的一只小铃摇了摇，一个大约三十多岁、衣着讲究的教士像从瓶子里放出的精灵似的立刻出现了。主教只介绍说，他是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甫，然后请他坐下。他穿着一件家制的防暑教士服和一双跟主教穿的一样的系带凉鞋。他神情紧张，面色苍白，眼睛滴溜溜转，头发漆黑，一缕白发飘在额前。他呼吸短促，双手发烫，并不像个幸福的人。

“你了解阿夫雷农西奥吗？”主教问他。

神甫无需思索：

“阿夫雷农西奥·德·萨·佩雷伊拉·卡奥，”他说，仿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这个名字，接着转向侯爵：“侯爵先生，你注意到最后一个姓在葡萄牙语里是狗的意思吗？”

德劳拉接下去说，铁的事实是，这个名字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名字，谁也不知道。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调查，他是一个被逐出半岛的葡萄牙犹太人，在此地受到一位知恩必报的总督的庇护，他曾用图尔瓦科① 净化水给总督治好了疝气。他谈到他的神奇药

①哥伦比亚北部城市名。

方，谈到他预测死亡的狂言，他可能有过的鸡奸，他的淫秽的读物和他的不信上帝的生活。但是加在他头上的唯一具体的罪名是使一个客西马尼园[①]的修补裁缝起死回生。人们找到了证据，说明阿夫雷农西奥命令裁缝起来时，裁缝已经被装殓入棺。幸而，复活者本人面对宗教裁判法庭断言，他一分钟也不曾丧失过知觉。“他是把他从火刑中救出来的。”德劳拉说。最后，他还提起那匹死在圣拉撒路山上、埋在圣洁的土地里的马的事件。

“他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侯爵同情地说。

“这是对我们的宗教信仰的羞辱，侯爵先生。”德劳拉说，“活一百岁的马跟上帝不相干。”

侯爵感到惊讶，私下里开的玩笑竟然进入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他怯生生地想为医生进行辩护：“阿夫雷农西奥是个出言不逊的人。但是我的确相信，出言不逊和异端还是有距离的。”如果不是主教把谈话拉回原来的方向，争论很可能会变得激烈且没完没了的。

“不管医生们怎么说，”主教说，“人类的狂犬病总是魔鬼的众多花招之一。”

侯爵不明白他的意思。主教向他做了骇人的解释，就像判处永恒的火刑的前奏。

“幸运的是，”主教说，“尽管你女儿的肉体已无可挽回，但是上帝还是赐给了我们拯救她的灵魂的办法。”

傍晚的闷热遍布世界。侯爵在紫红色的天空看到了第一颗明星，不由得想起他的女儿：她独自呆在肮脏的房子里，拖着那只被江湖骗子治坏的脚挪动。他用天生谦卑的口吻问道：

①耶路撒冷东部一座橄榄山上的花园，耶酥在被捕的当夜曾在此祈祷。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主教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他准许侯爵做每件事情都可以用他的名义，特别是在圣克拉拉修道院里；应该尽快把他的女儿送进修道院。

“把她交给我们吧。”主教最后说，“剩下的事上帝会做的。”

侯爵告辞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比来这儿时更加难受。他从马车的窗口望着凄凉的街道，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水坑里洗澡，垃圾被兀鹰弄得到处都是。转过街角后，他看见了总是原地不动的大海。他突然感到心慌意乱。

他随着奉告祈祷的钟声回到笼罩着阴影的家中。自从堂娜奥拉利亚死后，他第一次大声诵念奉告祈祷词：“主的天使传报马利亚。”古诗琴的弦像在水塘深处一样在黑暗中振荡。侯爵顺着音乐声向女儿的卧室走去。她坐在弹琴用的椅子上，穿着白长衫，散乱的长发拖到地上，正在弹奏跟他学的一首初级练习曲。他不能相信，她会是中午留在家中的、被无情的庸医们折磨得萎靡不振的女儿，除非出现了奇迹。这是他转瞬即逝的幻想。西埃尔瓦·玛丽亚知道他回来了，便停止弹琴，心里又难过起来。

整个晚上他都陪着女儿。他像不称职的父亲那样笨手笨脚地帮助她做睡前的准备工作。他把睡衣给女儿穿反了，她不得不脱下来重新穿上。他第一次看见她光着身子，看到她的肋骨突露出来，她的乳头小得像只纽扣，汗毛那么细小，他很难过。发炎的脚踝周围红红的。他帮助她睡下时，女儿仍然几乎听不清地呻吟着，独自忍受着痛苦。他惊慌地相信，他正在促使她死去。

自从丧失了宗教信仰后，他第一次感到祈祷的迫切性。他到了祈祷室，竭尽全力恢复对他抛弃的上帝的信仰，但是无济于事：他对上帝的怀疑比信仰还顽固，因为他的支柱是感觉。在凉

丝丝的清晨，他听见女儿咳嗽了几下，便去她的卧室看她。走过贝尔纳达的房间时，发现她的房门虚掩着；他推开门，急于把他的疑虑告诉她。她正趴在地上睡觉，发出雷鸣般的鼾声。侯爵手里抓着门把探头往里瞧，没有叫醒她。他自言自语地说：“你是为了她活着。”但他马上纠正说：

“全是为了她，我们俩的臭狗屎般的生命换她的生命，妈的！”

女儿在沉睡。侯爵见她一动不动，那么枯瘦，不禁心想：你是宁愿她死去，还是让她遭受着狂犬病的折磨呢？他给她掖了掖蚊帐，免得蝙蝠来吸她的血；又给她盖了盖被子，免得她继续咳嗽。然后坐在床边守着她，心里不禁涌起对女儿的疼爱，他过去没有这么爱过她，这是一种全新的愉快的体验。于是他对女儿的生命做出决定，既没求教上帝，也没求教任何人。早晨四点钟，西埃尔瓦·玛丽亚睁开眼，看见他坐在床前。

“我们该走了。’侯爵说。

女儿爬起来，什么也没有问。侯爵给她穿上该穿的衣服。他在箱子里找一双长毛绒套鞋，免得靴子后跟磨伤她的脚踝，结果无意中发现一件他母亲小时候穿过的礼服。由于岁月久远，衣服显得很旧，洗不出来了。不过，看得出来，它没有穿过第二次。几乎过了一个世纪后，现在他给戴着圣洁的项链、披着洗礼时用的披肩的西埃尔瓦·玛丽亚穿在身上。她穿着有点紧，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显得更古老了。然后又给她戴上一顶帽子，也是在箱子里找到的，帽子的彩带和衣服丝毫不相配，她戴着大小挺合适。最后，他为女儿准备了一只小手提箱，里头装着一件睡衣，一把梳子，梳齿细密得连虮子都能刮出来，还装上了孩子奶奶用过的一本用金丝装订、珍珠母封面的小日课经。

正值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侯爵带着西埃尔瓦·玛丽亚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不知为什么，她很高兴地接受了祈福的棕榈枝。出来时他们在车上看见天亮了。侯爵坐在正座上，把小手提箱放在膝头上；女儿坐在他对面的位子上，漠然地望着街道从车窗外掠过，这是十二岁的她最后看到的街景。看样子，她一点儿也不想知道，天色这么早让她穿着疯女胡安娜① 那样的衣服、戴着钟形帽，带她去哪里。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侯爵问女儿：

“你知道上帝是谁吗？”

女儿摇了摇头。

天边传来雷声，闪着电光，天空阴云密布，大海波浪汹涌。转过街角就望见了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孤立的白房子。它建在沙滩上的一处到处是垃圾的地方，共三层楼，都安着百叶窗。侯爵用手指指给她看。“那就是修道院。”他说。然后他指着左边说：“什么时间你都能从窗口望见大海。”女儿没有理他，他便对她做了关于她的命运的从没有做的唯一解释：

“你要到那里去和圣克拉拉的小姐妹们冷静地待几天。”

由于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转门前的乞丐比平日多。一些和乞丐们争剩饭的麻疯病人也伸着手向侯爵跑来。他给了他们一些小钱儿，每人一个，直到把小钱分光。修道院的女看门人看到他穿着黑塔夫绸衣服，看到女孩穿着女王式的盛装，便敞开门迎接他们。侯爵对她解释说，他是按照主教的指示把西埃尔瓦·玛丽亚送来的。看门人根据他说话的表情相信了他的话。她看了看孩子的面色，给她摘掉了帽子。

“院里不准戴帽子。”她说。

① 疯女胡安娜（1479—1555），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女王。

她把帽子扣下了。侯爵也想把小手提箱交给她，她没有接受。

“她什么也不会缺的。”

扎得不结实的辫子散开来，几乎拖到了地上。看门人不相信那是真头发。侯爵想把头发给她挽起来，女儿把他推开，她要自己挽，她的动作那么熟练，看门人十分惊讶。

“应该把头发剪一剪。”

“这是对圣母许的愿，到结婚之日才能剪。”侯爵说。

看门人被说服了。她不给侯爵道别的时间，抓起孩子的手进了转门。由于走路脚疼，孩子把左脚上的套鞋脱了。侯爵望着女儿提着那只鞋，一瘸一拐地走远了。他徒劳地希望在某个罕见的慈悲时刻，她能回头看一看他。他关于女儿的最后一个记忆是，她拖着受伤的脚穿过花园的柱廊，消失在被活埋的女人① 住的楼里。

三

圣克拉拉修道院是一幢面对大海的正方形建筑，共有三层，装着无数扇一模一样的窗子，院子里有一条半圆拱的长柱廊环绕着一座杂草丛生的阴暗的花园。有一条石径穿过香蕉树丛和野生的欧洲蕨，一棵苗条的海枣树为吸收阳光，长得比楼房的平台还高。还有一棵参天大树，树枝上垂挂着香子兰的爬藤和像辫子似的风兰。树底下有一座死水塘，周围镶着生锈的铁框，被关着的赤鹈鹕在那里玩着马戏团的走钢丝。

①她们被关在那里跟活埋了一样。

楼房被花园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右边的三层住着被活埋的女人，那里几乎听不见海边陡壁上的波浪声和在教规规定的时刻祈祷与唱赞歌的声音。这部分建筑通过一扇内门和小教堂相连，这是为了让修道院内院的修女可以进入唱经处而不必经过教堂的中殿，可以直接到她们能看见别人而别人看不见她们的百叶窗后面去听弥撒和唱歌。修道院的所有房间那种千篇一律用珍贵木料做成的镶板式天花板是由一位西班牙手艺人安装的。他花了半生的心血，为的是取得安葬在主祭坛旁的一个墓龛里的权利。他在那里和几乎死了两个世纪的女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其他重要人士一起，挤在那些大理石板后面。

西埃尔瓦·玛丽亚进修道院时，修道院内院的修女中共有八十二个西班牙人（她们都有自己的佣人）、三十六个来自总督领地的豪门望族的土生白人。在宣誓过简朴生活、保持沉默、保守贞节后，她们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偶尔几次到装着透声不透光的木条百叶窗的会客室去会见亲人。会客室在转门旁，来访照章办事，且有限制，总有一个人陪伴，在场监听。

花园左边是学校，各种作坊，那里有众多女手工艺师傅和徒弟。下房也设在那里，包括一个烧木柴的大炉灶，一张剁肉的大台子和一个烤面包的大炉子。深处有一个总是积存着洗东西的脏水的院子，那里住着几家奴隶。最后是马棚、羊栏、垃圾场、果园和蜂房。那里养着和种着为过美好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很远很远、被上帝之手遗弃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大楼，它一直被用作宗教裁判所的监狱达六十八年之久，现在仍然是囚禁误入歧途的圣方济各第二会的修女的地方。西埃尔瓦·玛丽亚就被关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的最后一个房间里。在她被狗咬伤后已经过了九十三天，始终没有出现狂犬病

的任何症状。

看门人领着西埃尔瓦·玛丽亚走到走廊的尽头，碰见一个要去厨房的新修女，要她把女孩儿带到女修道院院长那里去。新修女觉得一个女孩这么有气无力，又穿得这么好，让她到厨房去忍受那里的嘈杂声是不谨慎的，便让她坐在花园的一条石凳上，等一会儿再来领她。但是回来时却把她忘了。

后来有两个新修女从那里经过，对她的项链和指环发生了兴趣，问她是谁。她没有回答。又问她是不是懂西班牙语，结果却像是对一个死人说话。

“她又聋又哑。”年轻些的修女说。

“她或许是德国人。”另一个修女说。

年轻些的修女开始像对待一个五官失灵的人那样对待她。她解开她那根绕在脖子上的辫子，一拃一拃地量它。“几乎有四拃。”她说。她确信女孩没听见，便开始对她讲粗话，但是西埃尔瓦·玛丽亚用眼睛吓她们。修女盯着她的眼睛，对她吐舌头。

“你的眼睛像魔鬼。”修女对她说。

她摘下她的一枚指环，没有受到拒绝。但是当另一个修女想把她的项链抢过去时，她却像蛇一样发怒，突然在她的手上咬了一口。修女跑开去洗手上的血。

当诵唱午前祷时，西埃尔瓦·玛丽亚已经离开过石凳想去水塘喝水。水没喝到，她便恐惧地回到石凳上坐下。但是当她明白那是修女们在唱赞美诗后，再次跑到水塘边。她用手麻利地把腐烂的树叶拨开，用手捧水喝，不顾水中的蛆虫，直到喝够为止。然后在树后蹲下撒了尿。撒尿时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随时防备凶恶的动物和居心不良的男人，就像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教给她的那样。

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黑女奴，她们认出了圣洁的项链，并用约鲁瓦语跟她讲话。女孩用同样的语言高兴地回答她们的问话。由于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呆在那里，两个女奴便把她带到乱哄哄的厨房去，在那里受到奴隶们的兴高采烈的欢迎。这时，有人看到了她脚踝上的伤疤，想知道那是怎么弄的。“是母亲用刀子划的。”她说。有人问她叫什么时，她把她的黑人名字告诉了他们“：玛丽亚·曼丁加。”

她的世界立刻恢复了。她帮助她们砍掉一只不愿意死的山羊的头，抠出了它的眼睛，割下了它的睾丸，这是羊身上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跟厨房里的大人和院子里的孩子们一块抖空竹，把他们全赢了。她用约鲁瓦语、刚果语和曼丁加语唱歌，连听不懂的人也出神地听着。中午，她吃了一盘子羊睾丸和羊眼睛，它们是用猪油烧的，用热佐料调制的。

到这个时候，整个修道院已经知道，西埃尔瓦·玛丽亚在厨房，只有女修道院院长何塞法·米兰达一无所知。她是个身材干瘦、经历丰富的女人，由于家族的遗传，她头脑古板。她曾在宗教裁判所的庇护下到布尔戈斯受教育，但是她的管理才能和抱残守缺的刻板作风却渗透进血液，一如往常。她手下有两个能干的副院长，可她们无事可干，因为她包揽了一切，无需任何人帮助。

她对地方上的主教们所怀的那种怨恨，几乎在她出世一百年前就产生了。犹如历史上的重大争端，第一位的原因是由钱财问题和圣方济各第二会的修女们与圣方济各会主教之间的权限问题而引起的微不足道的分歧。圣方济各会主教不妥协，而修女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于是发生了一场在一段时间发展到双方全体都被卷入的战争。

在另一些团体的支持下，主教围困了修道院，企图用饥饿迫使它投降，并下令停止祭神。这就是说：城市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直到新的命令下达。市民们四分五裂，政府和教会各自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彼此对抗。但是被围困六个月后，圣方济各第二会的修女仍然活着并处于临战状态，后来发现一条秘密通道，她们的支持者们通过通道给她们提供给养。这一次圣方济各会会员在另一位新总督的支持下闯入圣克拉拉修道院内院，驱散了修女。

此后过了二十年，人们的情绪才平息下来，·被破坏的修道院才重新回到圣方济各第二会的修女们手里。但是一个世纪之后何塞法·米兰达依然忍受着她的怨恨之火的缓慢煎熬。她叫新修女们铭记这种怨恨，把这种怨恨的种子种在她们的五脏六腑里，比在心灵里种得还深，并把造成怨恨的一切过失全归咎于德·卡塞雷斯·依·比图德斯主教和一切跟他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当主教方面通知她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已把具有被魔鬼控制的致命征兆的十二岁的女儿送到修道院来的时候，她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她只提了一个问题：

“不过，当真有这么一个侯爵吗？”她的话中包含着两根毒刺：一是因为那是主教的事情，她管不着；二是因为她一向否认土生白人贵族的合法性，她称他们是“老朽的贵族”。

吃午饭时，她没有能在修道院里找到西埃尔瓦·玛丽亚。看门人曾对一个副院长说，大清早一个穿丧服的男人交给她一个留着金发、穿着女王般的衣服的女孩，但是她一点也没了解女孩的情况，因为适逢乞丐们争抢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施舍的木薯面粥的时候。作为她说的话的证明，她交出了带彩带的帽子。大家在寻找女孩时，副院长把帽子交给了女院长。院长毫不怀疑这帽子是

谁的。她用手指尖捏着帽子，伸直手臂提着它打量着。

“一位真正的侯爵小姐，却戴着一顶又难看又邋遢的女仆的帽子。”她说，“她在干什么，魔鬼才知道。”

上午九点她去探访室时经过那里，并在花园里停下来和泥瓦匠们讨论修水沟的价钱问题，但是没看见坐在石凳上的小女孩。另一些可能多次经过那里的修女也没有看见她。抢她的指环的那两个新修女却发誓说在午前祷结束后她们经过那里时没有看见她。

女院长刚刚从午睡中醒来就听见有一个人在唱歌，歌声响彻整个修道院。她拉了拉床边的铃绳儿，一个新修女马上来到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院长问是谁在这么自由自在地唱歌。

“是小女孩。”新修女说。

还在打磕睡的女院长喃喃地说：“多美的声音啊！”她立刻跳起来：

“哪个女孩？”

“不知道。”新修女对她说，“她从今天早晨起使后院变得很不安宁。”

“圣体啊！”女院长叫道。

她跳下床，飞也似的穿过修道院，顺着歌声跑到奴仆们干活的院子。西埃尔瓦·玛丽亚正坐在一个小板凳儿上唱歌，长发拖到地上，奴隶们着迷地围着她。她一看见女院长就不唱了。院长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耶稣受难像。

“圣母马利亚！”她说。

“你没有受孕的罪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院长像挥动作战的武器一样对着西埃尔瓦·玛丽亚摇着耶稣受难像。“离开这儿！”她叫道。仆人们向后退去，把小女孩一个

人丢在那里。她目不转睛，处于戒备状态。

“邪恶的怪物！”院长叫道，“你变得无影无形，是想迷惑我们。”

她们没有能从她嘴里掏出一句话。一个新来的修女抓着她的手把她带走，但是院长恐惧地拦住了。“别碰她！”她叫道。然后对大家说：

“谁也不准碰她。”

最后她们强行把她带走，她又是蹬腿又是像狗一样龇牙咧嘴，一直被带到牢房楼的最后一个房间。在路上她们发现她身上沾满自己的大便，便在马棚里用一桶桶的水给她冲洗。

“本城有这么多修道院，主教先生却把这个讨厌的东西送到我们这儿来。”院长抗议说。

牢房十分宽敞，但墙壁粗糙，屋顶很高，镶板式天花板上有一溜一溜的白蚁。在唯一的一扇门旁边，有一扇特别大的窗子，窗棂用刨过的木条做成，窗子中央横闩着一根铁棍。在对着大海的后墙上还有一扇高窗子，用交叉的木条封着。床是一个用灰泥垒的台子，铺着一个塞满稻草和用旧了的布垫子。有一个坐人的石凳和一张既当祭坛又当脸盆架的桌子。桌子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孤独的耶稣受难像。她们把连辫子都浸湿的、怕得直哆嗦的西埃尔瓦·玛丽亚扔在那里，由一个为赢得反对魔鬼的千年战争而经过训练的女人看守着。

西埃尔瓦·玛丽亚坐在床上，望着铁门上的铁栏杆。下午五点端着盆子来给她送饭的女佣人看见她这样发着呆。她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女佣人想把她的项链抢过去，她抓住她的手腕，迫使她把抓项链的手松开。那天晚上修道院开始记事时，女佣人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股力量把她打倒了。

当女佣人把房门关上，响起一阵铁链声，钥匙在锁眼儿里转了两下时，小女孩一动未动。她看了看她必须吃的东西：一些咸肉碎渣、一个木薯面饼和一小杯巧克力饮料。她咬了一口木薯面饼，嚼了嚼，吐了。然后仰着躺在床上。她听到了大海的波涛声、水面上的风声和四月间最早的几声愈来愈近的雷鸣。当第二天清晨女佣人端着早饭回来时，发现她睡在垫子的草堆上。她是用牙齿和指甲把垫子撕开的。

吃中饭时，她老老实实地被带到修道院内院尚未宣誓[①]的寄宿修女用餐的饭厅。那是一间宽阔的大厅，拱顶很高，窗子很大，大海的光辉呼啸着从窗口泻进来，撞击峭壁的浪涛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二十个新修女，其中多数很年轻，正坐在两排粗糙的长桌上用餐。她们穿着平常的哔叽法衣，头已剃光，傻乎乎的挺高兴，掩饰不住和一个中邪的女孩在一张桌上吃她们那份像兵营里那样的饭食的激动心情。

西埃尔瓦·玛丽亚坐在正门附近的两个心不在焉的女看守之间，几乎一口饭也不吃。她们事先给她穿上了一件和新修女穿的一样的晨衣和一双仍然潮湿的套鞋。吃饭的时候谁也不看她，但是吃完饭后几个新修女围着看她的玻璃串珠。有一个新修女想把串珠夺走。西埃尔瓦·玛丽亚猛地跳起来。女看守们想按住她，被她一下子推开。接着爬上桌子，叫喊着从一端跑到另一端，仿佛一个在战前的混乱中真正发疯的人。她把碰到的东西全打碎，从窗口跳出去，把院子里的花棚藤架拆毁，把蜂房捣坏，把马棚的围墙和牲口栏的栅栏推倒。蜜蜂四处乱飞，受惊的畜牲恐惧地嚎叫着，甚至冲进了修道院内院的宿舍。

①新修女入院后要宣誓，保证不回尘世。

从此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归罪于西埃尔瓦·玛丽亚的妖术。有几个新修女在记事本里说，她常张开一对透明的翅膀飞行，飞行时翅膀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嗡嗡声。一个奴隶小队花了两天时间才把牲口赶回栏，把蜜蜂引入蜂巢，把家里的东西整理好。人们传说，猪中毒了，水里冒出了预示着不幸的怪物，一只受惊的母鸡飞过一个个房顶，消失在大海的尽头。但是修女们的恐惧是矛盾的，因为尽管女院长大惊小怪、每个人惶恐不安，但是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间却成了所有的修女好奇的中心。

修道院的宵禁从晚上七点钟的夕祷开始，到早晨六点钟的晨祷为止。灯火要熄灭，只有少数被准许的房间里可以点灯。但是在宵禁的时间里，修道院的生活是最热闹、最自由的。走廊里有来来往往的人影，到处听得见断断续续的私语声，看得见无声无息的忙碌。在意想不到的单人房间，既有人玩西班牙纸牌，也有人在掷色子赌钱，她们偷偷地喝白酒，吸背地里卷的烟。这是何塞法·米兰达院长早就严令禁止的。修道院里的一个中邪的小女孩迷上了新奇的冒险活动。

即使最守本分的修女也在宵禁钟响过后离开修道院内院，三一帮两一伙地去找西埃尔瓦·玛丽亚聊天。她先是张牙舞爪地对待她们，但是很快她就根据每个人的情绪和每天晚上的情况把她们掌握在手心里。她经常表示愿意替她们把信带给魔鬼，求魔鬼为她们办不可能办的事情。西埃尔瓦·玛丽亚善于模仿阴间的声音、被砍了头的人的声音、可怕的怪物的声音，许多修女都相信自己有淫邪之念，并把它们作为事实写入言行录。一群女扮男装的修女在一个不祥的夜晚袭击了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间，堵住了她的嘴，抢走了她的圣洁的项链。这是一次暂时的胜利。在慌忙逃跑的时候，抢劫行为的指挥者在黑暗的楼梯上绊倒，摔破了

脑袋。她的同伙不把抢去的项链还给它的主人就不得一时的安宁。从此，谁也不敢再扰乱西埃尔瓦·玛丽亚房间的夜晚了。

对卡萨尔杜埃罗侯爵来说，那些日子是悲伤的。他把女儿送进修道院后很快就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了。从此得了忧郁症，再也振作不起来。他在修道院周围转游了好几个小时，心里想：楼房有那么多窗子，西埃尔瓦·玛丽亚正在哪一扇窗子里想他呢？刚黑天回到家时，他看见贝尔纳达正在乘凉。看样子她要问他西埃尔瓦·玛丽亚在哪儿，他不禁心里一颤。但她只是看了看他。

他把大猎犬放出来，躺在卧室的吊床上，幻想进入永恒的梦乡。但是他不能够。信风已经吹过，夜晚炎热似火。沼泽把热得发疯的各种虫子和一群群吸人血的蚊子派来，必须在卧室烧牛粪把它们赶走。人们昏昏欲睡。大家怀着那么强烈的渴望盼着那年的第一场大雨，六个月后却不得不祈求它永远停下来。

黎明的曙光刚刚出现，侯爵就前往阿夫雷农西奥家。还没有坐下，他就预感到倾诉他的痛苦的巨大宽慰。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把女儿送进圣克拉拉修道院了。”

阿夫雷农西奥不明白他的意思。侯爵趁着他困惑不解，接着又猝然说：

“必须为她驱邪。”他说。

医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分平静地说：

“给我讲讲吧。”

侯爵于是把他拜访主教、祈祷的渴望、盲目的决定和夜不能眠的情形一一告诉了他。这是一个年迈的基督教徒的忏悔。为了排解烦闷的心绪，他什么秘密也不保守了。

“我确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他末了说。

“你是说，你恢复了宗教信仰了。”阿夫雷农西奥说。

“谁也不会完全放弃信仰，”侯爵说，“怀疑总是存在的。”

阿夫雷农西奥明白了。他一向认为，放弃信仰总会为他所信仰的、使他不能忘记信仰的东西上留下抹不掉的伤痕。但他不能理解的是，侯爵竟让自己的女儿遭受驱邪的折磨。

“这和黑人的巫术没有多少区别。”他说，“而且更糟。因为黑人至多是杀鸡祭神。宗教裁判所却要把无辜的人们拷打得皮开肉绽或在公众面前活活地折磨他们，这样才满足。”

他觉得在拜访主教时，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甫的参与是个险恶的前奏。“他是刽子手。”他不假思索地说，接着滔滔不绝地列数起了为把精神病人当作中邪者或逆教徒处死而举行的古老宗教仪式。

“我认为杀死她也许比活活地埋葬她更符合基督教精神。”他说。

侯爵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阿夫雷农西奥看了看他，他颤抖着，穿着丧服像个幽灵；又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与生俱来的迟疑不决的荧光。

“把她从那儿领回来吧！”他对侯爵说。

“自从我望着她向活埋女人的楼走时我就想这么做。”侯爵说，“可是，我觉得没有力量和上帝的意志对抗。”

“你会有力量的。”阿夫雷农西奥说，“也许有一天上帝会感谢你。”

那个夜晚，侯爵希望主教召见。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写得潦草，字体幼稚。然后亲自把信交给了看门人，相信她会及时把信送到主教的手中的。

星期一，主教得知，西埃尔瓦·玛丽亚已准备好接受驱邪。

他已在他那长着黄色钟状花的花园里吃完了午饭，没有特别注意听那封信。他吃得很少，并且不慌不忙，这种仪式他可以持续三个小时。卡耶塔诺·德劳拉坐在他对面，用做作的语调和演戏似的方式给他念信。这种语调和方式是在他读那些按他的爱好和标准挑选的书时养成的。

对主教来说，那幢旧楼房实在太大了。他有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和露台就足够了；他在露台上吃饭和午睡，直到雨季到来。另一端的配楼是一个正式图书馆，它是由卡耶塔诺·德劳拉创办、丰富并以其杰出的才智支持的，是那时西印度群岛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楼房的其他部分是修道院的十二个房间，那里堆满了两个世纪以来积存的瓦砾。

除了轮班送饭的修女外，只有卡耶塔诺·德劳拉在吃饭时可以去主教的家，这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由于他个人的特权，而是由于他作为读经师的资格。他既没有固定职位，除了图书馆馆员外也没有其他头衔。但由于他接近主教而被认为实际上是一位副主教，都认为少了他，主教就不会做出任何重要决定。他个人的房间在一幢内部和楼房相通的邻近的房子里。那幢房子里有主教管区的官员的办公室和住房，以及为主教做家务活的五六个修女的房间。但是他的真正的家是图书馆，他在那里工作和读经，每天多达十四个小时；他在那里安了一张行军床，困了就睡一觉。

在那个历史性的下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德劳拉在读经时好几次结结巴巴。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翻错了页码，他漏读了一页，没有发觉而继续往下读。主教透过他那副炼丹术士的微型小眼镜注视着他，直到他读下一页。于是他开心地打断他说：

“你在想什么呀？”

德劳拉吓了一跳。

“大概是太闷热了。”他说，“干吗这么问？”

主教仍然望着他的眼睛。“肯定不只是闷热问题。”他对他说。又用同样的语气说：“你在想什么呀？”

“想那个小女孩。”德劳拉说。

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个小女孩，因为对他们来说，自侯爵来访后，在那个世界没有第二个小女孩。关于那个孩子的情况，他们谈过多次。他们一起翻阅过关于中邪的人的记录和神圣的驱邪师们的回忆录。德劳拉叹了口气：

“我梦见她了。”

“你怎么会梦见一个你从没见过的人呢？”主教问他。

“她是个十二岁的土生白人侯爵小姐，长长的头发像女王的斗篷一样拖在身后，”他说，“怎么可能是别的女孩呢？”

主教是个缺乏关于天国、奇迹和惩罚的观念的人。他的王国在人间。所以他怀疑地摇了摇头，接着吃他的饭。德劳拉更谨慎地继续朗读。主教吃饭时，德劳拉扶着他坐在摇椅上。舒适地坐好后，主教说：

“好了，现在给我谈谈你的梦吧。”

很简单。德劳拉梦见西埃尔瓦·玛丽亚坐在下雪后农村的一扇窗前，腿上放着一串葡萄，她一粒一粒地摘着吃。每摘下一粒，葡萄串上立刻又长出新的。很显然，梦中的小女孩在那个巨大的窗前已经坐了许多年，她想吃完那串葡萄，但是并不着急，因为她知道，最后一粒葡萄意味着死亡。

“最奇怪的是，”德劳拉最后说，“面对田野的那扇窗子就是在那个大雪下了三天、羊群被雪压死的冬天萨拉曼卡的窗子。”

主教很激动。他了解并特别喜欢卡耶塔诺·德劳拉，并不在

乎他的梦境的费解之处。无论在主教辖区还是在他的影响方面，他的地位都是由于他多方面的才智和他的好脾气赢得的。主教合上眼睛，想睡几分钟的午觉。

与此同时，在两人一起进行祈祷之前，德劳拉在同一张桌上吃着饭。还没有吃完，主教就在摇椅上伸了伸懒腰，采取了他平生的决定：

“你负责办这件事吧。”

他说话时仍然闭着眼，发出雷鸣似的鼾声。德劳拉吃完了饭，坐在花儿盛开的爬藤植物下他经常坐的扶手椅上。这时主教睁开了眼睛。

“你还没有回答我。”他说。

“我还以为你在说梦话呢。”德劳拉说。

“现在我醒着再说一遍，”主教说，“我委托你负责小女孩的健康问题。”

“真希罕，我从没有办过这种事情。”德劳拉说。

“你是想拒绝吗？”

“我不是驱邪师，我的主教。“德劳拉说，“我不具备做这种事的品格、修养和知识。再说，我们也已知道，上帝已为我指定另一条路。”

正是这样，由于主教的斡旋，德劳拉被列入负责看管梵蒂冈图书馆塞瓦尔迪人的资产的三个候选人名单之中。但这是第一次在他们中间提到这件事，尽管两人知道这一点。

“更重要的理由是，”主教说，“小女孩的事情办好了，可以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在同女人交往方面，德劳拉明白自己头脑笨拙。他认为女人有一种不可取代的智慧，她们能够在难以预测的现实中应付自

如。只要想到和西埃尔瓦·玛丽亚这么一个不能自卫的女孩相遇，他双手就会捏一把冷汗。

“不，先生，”他做出了决定，“我觉得我不能胜任。”

“你不但能胜任，”主教反驳道，“而且别人缺少的东西你绰绰有余：这就是灵感。”

这句话虽非最后的决定，但也很说明问题。然而主教并不强迫他立刻同意，而是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即到那天开始的圣周的哀悼活动结束后。

“你去看看女孩吧，”他说，“认真了解一下情况，把结果告诉我。”

就这样，卡耶塔诺·阿尔西诺·德尔·埃斯皮里图·圣托·德劳拉·依·埃斯库德罗在三十六周岁时进入了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生活和城市的历史。在著名的萨拉曼卡神学系学习时，他是主教的学生。毕业时获得该校颁发的最高勋章。他确信，他父亲是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① 的后代，他对维加保持着一种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拜心情，并且逢人便讲这件事。他母亲是莫姆波斯省圣马丁·德·洛瓦的一个土生白女人，后来随父母移民到西班牙。德劳拉在来到格拉纳达新王国、承认他继承的思乡病以前，一直不相信他和母亲有什么关系。

自打在萨拉曼卡同他进行第一交谈后，德·卡萨雷斯·依·比尔图德斯主教就觉得他面对着的是当时体现基督教徒品德的罕见的人物之一。是在一个寒冷的二月的早晨，窗外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原野，尽头是一排生在河边的杨树。那幅冬天的风景一定是一个将在年轻的神学家后来的岁月里缠绕着他的复现的梦境。

①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6），西班牙诗人。

当然他们谈到了书籍。主教不能相信，在那样的年纪，德劳拉会看那么多书。他对他谈到加尔西拉索。老师坦白地对他说，他不很了解加尔西拉索，不过记得他是一位不信神的诗人，在其全部作品中仅两次提到过上帝。

“并非仅两次。”德劳拉说，“不过，在文艺复兴时代，这在正直的天主教徒身上并不奇怪。”

在他第一次对天主宣誓那天，老师建议他陪他去情况不明的尤卡坦王国，他刚刚被委任为那地方的主教。德劳拉了解书里描写的那个地方的生活，但是他觉得他母亲的那个广大世界是一个永远不会属于他的梦境。他很难想象那种闷热的天气、死畜死兽腐肉的永恒臭味和烟雾蒙蒙的沼泽，而与其同时，人们却在雪里挖掘被冻僵的羊羔。对参加过非洲战争的主教来说，这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

“我听人说过，我们的教士为在西印度享受的幸福欣喜若狂。’德劳拉说。

“可也有些人悬梁自尽了，”主教说，“那是一个受着鸡奸、偶像崇拜和食人肉的习性威胁的王国。”然后又毫无成见地说：

“跟摩尔人的土地一样。”

不过，他也认为，那是它最诱惑人的东西。那里需要勇敢的武士，以便推行基督教的文明，比如在荒凉的地区布道。然而，年仅二十三岁的德劳拉相信他的道路已经确定：要走到圣灵的右边，对圣灵他是无比虔敬的。

“我一生都梦想当图书馆馆长。”他说，“是想干我唯一能干的事情。”

他参加过托莱多的谋职应试，这可能给他提供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他相信他能够达到目的。但是老师十分执拗。

“在尤卡坦当图书馆管理员比在托莱多当殉道者更容易成为圣人。”他对德劳拉说。

德劳拉理直气壮地回答：

“倘若上帝赐我恩惠，我宁愿当天使，而不当圣人。”

当他还在考虑老师的建议时，他被任命为托莱多的主教，不过他更愿意去尤卡坦。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去成。在气候恶劣的海上航行了七十天后，他们在卡纳尔·德·洛斯·比恩托斯遇难，被一条自身难保的破运输船救上来，后来又被丢在圣玛丽亚·拉·安蒂瓜·德尔·达里恩。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等待幻想中的苦役船带信件来，直到德·卡塞雷斯主教被任命为那个地方的临时主教。由于正式主教的突然死亡，其职空缺。从把他们送到新的目的地的小船上看到乌拉瓦的广阔丛林时，德劳拉印证了在阴暗的托莱多冬天折磨着他母亲的思乡病、光怪陆离的黄昏、恶梦般的鸟群和林莽的腐殖物，他觉得就像他不曾经历过的过去的亲切往事。

“只有圣灵能够把万物安排得这么美，从而吸引我来到我母亲的故乡。”他说。

十二年后，主教放弃了去尤卡坦的梦想。他已经足足地满七十三周岁，经受着哮喘病的致命折磨，他知道永远也看不到萨拉曼卡下雪的景致了。在西埃尔瓦·玛丽亚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日子，他已决定：一旦为他的学生铺平去罗马的道路，他就退隐。

卡耶塔诺·德劳拉第二天去了圣克拉拉修道院。尽管天气很热，他仍然穿着粗毛法衣，带着圣水器和一个圣油盒，这是同魔鬼作斗争的基本武器。女院长从未见过他，但是他那尽人皆知的智慧和权力早就打破了修道院的幽静。当早晨六点钟女院长在探

访室迎接他时，他那副年轻人的仪表、那副殉道者的苍白面孔、那种金属般的声音和他那一缕白发，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任何特征也不能使她忘记他是主教的斗士。对德劳拉却相反，引起他注意的仅仅是一群公鸡的欢叫声。

“只有六只，可叫起来像一百只。”女院长说，“此外，还有一头猪说过话，一头山羊生了三只羔子。”然后又严肃地补充说：“自从你的主教大发慈悲把这个有害的东西送来后，一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鲜花盛开的花园也同样使他大吃一惊：花园充满了生机，仿佛违背情理似的。在穿过花园时，院长使德劳拉注意到，有些花的大小和色彩亦真亦幻，有些花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对她来说，一切日常的事情都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特点。德劳拉听到每一句话都觉得她比他厉害，于是他赶紧磨快他的武器。

“我们没说过小女孩中了邪。”他说，“只说过有理由这样推测。”

“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本身就是证明。”女院长说。

“你要当心，”德劳拉说，“有时我们会把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归咎于魔鬼，却想不到它们可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圣托马斯[①] 这样说过，我赞成他的说法。”女院长说，“不能相信魔鬼的话，即使他们说的是真话。”

到了二层楼，环境开始安静了。一边是没人住的空房间，白天用锁锁着；房间对面是一排窗子，面对明亮的大海。新修女们在干活，好像很专心，但实际上她们在注意听女院长和来客的谈

①圣托马斯，即圣托马斯·德·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天主教神学家。

话。他们一面交谈一面向牢房楼走去。

在走到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间所在的走廊尽头之前，他们经过马丁娜·拉博德的房间。她是一个老修女，由于用一把剔肉刀杀死两个同伴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她始终未供认杀人动机。她已经被关了十一年；人们知道她，与其说是因为她杀过人，勿宁说是因为她越狱未遂。她从来不认为终身监禁和当修女是一回事，所以随后她便表示她愿意在牢房楼当佣人继续服刑。她有一个固执念头，就是一定要获得自由，哪怕为此而再杀人。就像对待她的信仰一样她怀着巨大热情坚持她的意愿。

德劳拉像孩子一样克制不住他的好奇心，非要从小铁窗的栏杆间向单人牢房里看看不可。马丁娜面朝里坐着。感觉到有人看她时，她把身子转向了门口。德劳拉立刻感受到她的巫术的威力。女院长感到不安，赶忙拉他离开了窗口。

“留神，”她对他说，“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她这么厉害？”德劳拉说。

“她就是这么厉害。”女院长说，“倘若她听我的，她早就被释放了。对本修道院来说，她带来的麻烦太大了。”

女看守打开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牢房门时，一股腐烂味从里头冲出来。小女孩仰面躺在没有铺垫子的石床上，手脚用皮绳儿捆着。像个死人，但她的眼睛像明亮的海水一样闪光。德劳拉发现她和他梦见的那个小女孩一模一样，他不禁浑身一阵战栗，出了一身冷汗。他闭上眼睛，怀着他的信仰的全部虔诚低声祈祷。祈祷完后，恢复了平静。

“即使她没有被任何魔鬼缠身，”他说，“让她留在这儿，对这个不幸的孩子来说，这儿的气氛也是很合适的。”

女院长反对说：“这份荣耀我们不配。”因为虽然他们已把她

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但是西埃尔瓦·玛丽亚却故意把这里弄得像垃圾堆。

“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她身上的魔鬼。”德劳拉说。

他躲着地上的脏东西，踮着脚走进去，用掸洒器把圣水洒在房间里，同时喃喃地诵着仪式用的歌诀。看到墙壁被水洒得那么脏，女院长吓坏了。

“是血!”她叫道。

德劳拉指责她的理智太脆弱。水虽然是红的，但并不是血，即使是血，也没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才更正确，而这种威力只属于上帝。”他说。但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因为石灰墙上的那些污斑晾干后，不是红色的，而是鲜绿色的。女院长脸红了。不只是修女，而且那个时代的一切女人都不准接受任何科学知识教育，但是她很年轻就去她那个有着著名的神学家和非凡的异教徒的家庭里学习过剑术。

“起码，”她反驳说，“我们不应否认魔鬼有改变血的颜色的力量。”

“及时提出问题比什么都有益。”德劳拉立刻回答。正面看了她一眼“:请读读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吧。”

“我早就认真读过了。”女院长说。

“那你就再读读吧。”德劳拉说。

在给小女孩做检查前，他客气地要求女看守离开房间。然后却不客气地对女院长说：

“请你也离开!”

“你要负责任。”她说。

“主教是最高的官员。”他说。

“不要对我提他。”女院长生气地讽刺说，“我们明白上帝掌握在你们手里。”

德劳拉愉快地说，上帝也掌握在她手里。然后坐在床沿上，以医生的严格态度给女孩做检查。他还在发抖，但是没有再出汗。

就近查看，西埃尔瓦·玛丽亚身上有抓痕和青斑，皮肤被皮条磨得露出了嫩肉。不过，最使他感到不安的是脚踝上的伤口，由于庸医的胡医乱治，伤口红红的，已化脓。

检查时，德劳拉对她解释说，把她送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折磨她，只是怀疑魔鬼钻进了她的肉体，拿走她的灵魂。他需要她帮助，以便确定真象。但是他很难知道她是不是在听他讲话，是不是明白这是她的心灵的请求。

检查完后，德劳拉要人把卫生箱拿进来，但是他不准当药剂师的修女进来。他在伤口上涂了些香脂，轻轻地吹了吹灼疼的嫩肉，很佩服女孩对疼痛的忍受能力。西埃尔瓦·玛丽亚没有回答他提的任何一个问题，对他的说教毫无兴趣，对遭受的痛苦也没有丝毫抱怨。

沮丧的情绪油然而生。德劳拉垂头丧气地回到一潭死水似的图书馆。这是主教家中最宽敞的房间，但一扇窗子也没有，墙边立满了桃花心木的玻璃柜，柜里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书。房间中央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海图、等高仪和其他航海仪器，还有一个地球，上面补补贴贴附加了些东西，那是随着世界的扩大由一代代的地图绘制人员陆陆续续用手贴上去的。靠后墙放着一张粗糙的写字台，台上放着墨水、铅笔刀、土火鸡羽毛笔、吸墨粉和一个插着麝香石竹花的花瓶，花儿已经腐烂。整个房间黑乎乎的，有一股静止的纸味儿和树林的凉爽、宁静的气氛。

在大厅深处一个非常窄小的地方放着一个书柜，用普通木板做的柜门紧紧地关着。那是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规定被禁止的图书的“监狱”，因为它们涉及到“亵渎的和虚假的材料及虚构的历史”。谁也不可以打开它，只有卡耶塔诺·德劳拉经主教允许可以打开它去勘察迷途的文字的深渊。

自从见到了西埃尔瓦·玛丽亚后，那个一潭死水似的房间就变成了他的地狱。他不再去和他的朋友、教士和俗人聚会：他们曾和他分享纯洁的思想的娱乐，一起组织学校的比赛、文学作品评奖和音乐晚会。他的热情只限于了解魔鬼的狡诈伎俩。在回修道院前的五天五夜里，他的阅读和思考全是为了这一目的。星期一，主教见他迈着稳健的步伐出门时问他感觉如何。

“我觉得有了一对圣灵的翅膀。”德劳拉说。

出门前，他穿上普通棉布做的教士服，这为他增添了一股打柴人的勇气。他的心中充满了克服沮丧情绪的毅力。他需要这一切。女看守哼了一声算是回答他的问候，西埃尔瓦·玛丽亚则紧紧地皱着眉头迎接他，房间的地上到处洒着剩饭和粪便，让人喘不上气来。当天的午饭放在祭坛上圣体旁，原封未动。德劳拉端起盘子，舀了一勺黑菜豆和凝奶油给她吃，她躲开了。他又试了几次。她仍然不吃。于是，德劳拉自己吃了一勺黑菜豆，品了品味道，没有嚼便带着非常厌恶的表情吞了下去。

“不怪你，”他对女孩说，“这饭太难吃了。”

小女孩一点儿也不理睬他。给她治脚踝上发炎的伤时，她的皮肤抽动了一下，眼睛湿了。他相信她肯定疼极了，便像一个善良的教士那样，悄声细语地安慰她。最后，他大胆地为她解下了皮绳，让她那受伤的肉体得以歇息。小女孩活动了一下手指，看它们是否还是自己的；又伸了伸被勒得麻木的脚。这时，她才第

一次看了看德劳拉，然后推了推他，看他有多重，又打量了他一番，终于像猎食的野兽一样准确地跳到他身上。女看守帮助他把她按倒，捆了起来。德劳拉在离开前，从口袋儿里取出一条檀香木念珠，挂在她戴着圣洁的项链的脖子上。

看见他回来时，主教不禁一阵惊慌，因为他的脸被抓破了，手也被咬伤，一看见伤口就让人觉得疼痛。但是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德劳拉的表现：像战利品一样让主教看他的伤，对染上的狂犬病毒的危险满不在乎。但是主教的医生认真地给她做了包扎，因为他和别人一样也担心下星期一的日蚀是大灾大难临头的预兆。

相反的，杀过人的马丁娜·拉博德却没有受到西埃尔瓦·玛丽亚的丝毫反抗。她踮着脚走到女孩的房间门口，看见她被捆着手脚躺在床上。小女孩保持着警惕，眼睛注视着，直到马丁娜对她微笑；这时她也微微一笑，无条件打消了敌意。仿佛多明加·德·阿德维恩托的灵魂充满了她的房间。

马丁娜告诉她自己是谁，既然由于千百次声明她清白无辜而无人理会，她为什么还要在那儿度过后半生。当她问西埃尔瓦。玛丽亚为什么被关在那儿时，她只对她讲了从她的驱邪师口里知道的事：

“我的肉体里有一个魔鬼。”

马丁娜不再烦扰她，以为她是说谎，或者别人对她说谎，却不知道小女孩对她说的是真话，而听到她说真话的白女人是不多的。马丁娜让她看她刺绣的东西，小女孩恳求她给她解开皮条，好让她跟她一样自由活动。马丁娜把装在晨衣口袋儿里的剪刀给她看，还有其他做针线活的用具。

“你要我给你解开，”马丁娜对她说，“可是我提醒你、你要

是企图伤害我，我有办法杀死你。”

西埃尔瓦·玛丽亚对马丁娜的决定毫不怀疑。她的手脚被放开了，她像学弹古诗琴时的良好感觉一样很容易地重复了一遍学的东西。马丁娜在离开前，对她保证争取获得准许在发生日全蚀的星期一再相见。

星期五天亮时，一群燕子在空中飞了一大圈儿，掠过街道和覆盖着散发臭味的假靛蓝色积雪的房顶，告别了。只要中午的阳光不把粪便晒干，夜晚的微风不使空气纯净，人就很难吃得下饭，睡得好觉。但是恐惧压倒了一切。从未见过燕子飞着拉屎，也不曾有过粪便的臭味妨碍人的生活的现象。

当然，在修道院里，谁也不怀疑西埃尔瓦·玛丽亚具有足够的力量改变鸟儿迁徙的规律。德劳拉甚至在令人不快的空气里感觉到了这一点。星期天望完弥撒后，提着一篮子从市场买来的甜食穿过花园。对一切漠不关心的西埃尔瓦·玛丽亚脖子上还戴着那条念珠，但是没有回答他的问候，也不屑看他一眼。他坐在她身边，津津有味地嚼着篮子里的一块奶酪饼，含着满满的一嘴东西说：

“真香。”

说完，他就把另一半奶酪饼送到她嘴边。她躲开了，不过没有像前几次那样面对墙壁，而是告诉德劳拉，女看守在监视他们。他把手对着门口用力一挥。

“走开！”他命令道。

女看守离开后，小女孩想用那一半奶酪饼填饱她那早就饥肠辘辘的肚子，但是咬了一口吐了出来。“有一股燕子屎味。”她说。但是她的情绪好转了。这方便了对她的背部的创伤的治疗。当她发现德劳拉的手上扎着绷带时，她第一次注意他。她用一种

绝非假装的天真无邪的口吻问他那是怎么弄的。

“是被一只长着一米多长的尾巴的小母疯狗咬的。”德劳拉说。

西埃尔瓦·玛丽亚想看看他的伤口。德劳拉解下绷带，她用食指轻轻碰了一下伤口的边缘，第一次笑了。那伤口已经发炎，呈紫红色，像一块火炭。

“我比瘟疫还坏。”她说。

德劳拉的回答不是用福音书，而是用加尔西拉索的话：

“对能够忍受的人，你完全可以这么做。”

由于意识到某种重大的、不可挽回的事情已开始在他的生活中发生，所以他走时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女看守以女院长的名义提醒他，不准从外面往这里带吃的，以防有人在食品里下毒，就像围城期间发生过的那样。德劳拉骗她说，他提篮子进来是经过主教批准的，并且为这个以良好的烹调术著称的修道院竟给被监禁的妇女提供这么差的饮食提出了正式抗议。

用晚餐时，他怀着新的热忱为主教朗读了书，跟往常一样和他一起举行晚祷。他祈祷时闭着眼睛，更加集中精神想念西埃尔瓦·玛丽亚。他想念她，比平日早一点回到图书馆。他越是想念，想念的愿望就越强烈。他高声地朗诵着加尔西拉索的爱情十四行诗。但是一想到每句诗中都可能包含着某种与他的生活有关的预感，他便感到恐惧。他辗转难眠。天亮时，他趴在写字台上，把头放在没有读的书上。在深沉的梦中，他听见从邻近的圣殿传来在新的一天的早祷诵唱的三首梦幻曲。“上帝拯救你，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他在睡梦中说。他自己的声音突然把他惊醒，他看见西埃尔瓦·玛丽亚穿着牢房的号衣，烈火似的长发披在肩上，她把枯干的石竹花扔掉，把一束新开的栀子花插

进长桌上的花瓶里。德劳拉以火热的声调，借用加尔西拉索的诗对她说：“我为你生，我为你活，一定为你死，现在就为你死。”西埃尔瓦·玛丽亚微微一笑，但没有看他。他闭上眼睛，以便确信那不是阴影使他产生的幻觉。他睁开眼睛，幻觉已经消失，但是图书馆里充满了栀子花的香味。

四

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甫被主教邀请到黄色钟状花架下去等着看日蚀。家里只有在那个地方能够看到大海的天空。在空中展翅不动的鲣鸟，看去仿佛在飞翔中死去。主教刚刚睡完午觉，在吊床上缓缓地摇着扇子。吊床用船上的绞缆绳悬挂在两个树杈上。德劳拉坐在旁边一把柳条摇椅上晃动着。两个人神态平静，喝着罗望子水，望着屋顶后面万里无云的天空。刚刚打过两点的钟声，天色便开始暗了，母鸡纷纷爬上栖木，满天的星斗也同时亮了。一阵神奇的寒战震动了大地。主教听见迟归的鸽子扑打着翅膀寻找黑暗中的鸽子房。

“上帝真伟大，”他叹道，“连动物都感觉到他的存在了。”

值班的修女给主教送来一盏大蜡烛和几块观察太阳用的烟色玻璃。主教在吊床上坐起身，开始用玻璃观望日蚀。

“必须用一只眼看。”他说，竭力克制着喘息声。“不然的话，会有双眼失明的危险。”

德劳拉手里拿着玻璃，没有看日蚀。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过了良久后，主教在阴暗中察看他，发现他眼里闪着磷光，对“夜晚”的巫术一点也不关心。

“你在想什么？”主教问他。

德劳拉没有回答。他看到太阳像下弦月。尽管玻璃是烟色的，光线还是刺激他的视网膜。但是他仍然在观察。

“你还在想那个小女孩。”主教说。

尽管主教不但自然地而且更是经常地猜中他的心思，卡耶塔诺还是感到惊讶。“你认为老百姓会把他们的不幸同这次日蚀联系起来吗？”他说。主教摇了摇头，但目光没有离开天空。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有道理？”他说，“上帝玩的牌很难看明白。”

“这种现象几千年前就被巫术天文学家测出来了。”德劳拉说。

“这是耶稣会教徒的回答。”主教说。

由于漫不经心，卡耶塔诺仍然不用玻璃观察太阳。两点十二分时，太阳像一张完美的黑唱片，有一瞬间，大白天变成了月黑夜。随后，日蚀恢复了地球的白天，黎明的雄鸡叫起来。卡耶塔诺停止观察后，火红的圆球仍然留在他的视网膜上。

“我仍然看得见日蚀，”他高兴地说，“我看哪儿，哪儿就有日蚀。”

主教说，日蚀已经结束了。“过几个小时你的日蚀就会消失。”他说。他坐在吊床上，伸了一下懒腰，打了个呵欠，为新的一天感谢上帝。

德劳拉没有忘记原来的话题。

“尽管我很尊敬你，我的主教，”他说，“但我不相信那个孩子中了邪。”

这一次，主教真的感到惊讶了。

“你这么说有何根据？”

“我认为她只是被吓坏了。”德劳拉说。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主教说，“难道你没有看言行录吗？”

是的，德劳拉都认真地研究过。那些言行录对了解女院长的思想更有用，对了解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状况却不然。那天早晨小女孩进修道院后到过的地方、碰过的东西，都已驱邪收妖。和她接触过的人也受到了洗涤和净化。第一天抢她的指环的那个新修女被判处在果园强制劳动。据说小女孩在肢解一只她用手拧断头的山羊时很高兴，并吃了羊睾丸和烧制得像炭火似的眼睛。她炫耀自己的语言才能，她能和任何一个民族的非洲人交谈，比非洲人跟非洲人之间的交谈还流利，并能和任何一种动物对话。她到修道院的第二天，二十年来被抓来美化花园的十一只赤鹈鹕天亮时无缘无故地死了。她用不同于她的嗓音唱的魔鬼歌儿使佣人们神魂颠倒。当知道女院长找她时，她只为对付她而变得无影无踪。

“但是，”德劳拉说，“我认为，我们视为邪恶的东西应是小女孩被父母遗弃后养成的那些黑人的习惯。”

“当心！”主教提醒他说，“比起我们的弱点来，魔鬼更善于利用我们的智慧。”

“这么说，对魔鬼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为一个健康的女孩驱邪了。”德劳拉说。

主教发火了。

“你是要我明白你要反叛吗？”

“你应该明白我要坚持我的怀疑态度，我的主教。”德劳拉说，“不过，我会老老实实听你的话的。”

这样，他没有说服主教，回修道院去了。他左眼上蒙着一个医生为他消除视网膜上的太阳而给他戴上的独眼人的眼罩。他觉得从花园和一条接一条的走廊直到牢房楼，到处都有目光盯着

他，但是谁也不跟他讲话。整个修道院的气氛恰似日蚀已经结束一切恢复原状了。

女看守给他打开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门时，德劳拉觉得心脏要在胸膛里爆炸，使他几乎站不稳脚。只是为了探察那天早晨她的心情，他才问她看没看日蚀。事实上，她在平台上看了。她不明白他的眼上为什么戴着眼罩，他问她看太阳时是不是没有保护眼睛，感觉是不是好。她告诉他，修女们跪着看日蚀，修道院直到雄鸡叫一切都停止了。不过，她认为一点儿也不像冥冥的阴间。

“我看到的情景和每个夜晚一样。”她说。

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但他说不清。最明显的迹象是她的痛苦情绪。他没有想错。治疗刚开始她就用一双忧虑的眼睛望着他，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我要死了。”

德劳拉哆嗦了一下。

“谁对你说的？”

“马丁娜。”女孩说。

小女孩对他说，马丁娜曾到她的房间来过两次，教她学刺绣，两人一起观看了日蚀。她对他说，马丁娜对人善良、和气，女院长允许她在露台上教她刺绣，以便看海上的日落。

“啊哈！”他说，没有眨眼睛。“她说你什么时候死？”

小女孩紧闭着嘴，免得哭起来。

“日蚀结束后。”她回答。

“一百年也是日蚀结束后。”德劳拉说。

但是他必须集中精神给她治疗，不能让她看到他难过得哽住了喉咙。西埃尔瓦·玛丽亚没有再说话。他又望了望她，对她的

沉默感到不安。他看到她的眼睛湿了。

“我怕。”她说。

她扑在床上失声地哭起来。他挨到她旁边，像忏悔神父一样用宽慰话鼓励她。这时西埃尔瓦·玛丽亚才知道，卡耶塔诺是她的驱邪师而不是她的医生。

“那么，你为什么给我治疗呢？”她问。

他的声音颤抖了：

“因为我非常爱你。”

对他的大胆表白，她无动于衷。

离开她后，德劳拉走到马丁娜的房门口往里看了看。他第一次就近看到她脸上有麻子，她的头光着，鼻子特别大，牙齿像老鼠的。但是她的诱惑力却像流动的物质，立刻能感觉到。德劳拉宁肯就站在门口说话。

“那个不幸的女孩已有相当多的理由感到害怕了。”他说，“我恳求你，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马丁娜困惑不解。她从未预言过任何人的死亡日期；更何况她是一个多么可爱、多么无力自卫的小女孩。她只是询问过她的状况，问了她三四个问题就发现她有说谎的毛病。马丁娜说话的严肃样子足以使德劳拉明白，西埃尔瓦·玛丽亚也对他说了谎。他请求马丁娜原谅他的轻率态度，并恳求她不要要求小女孩做任何事情。

“该怎么做，我很清楚。”她说。

马丁娜把他纳入了她的巫术。“我知道阁下是谁，”她说，“我知道你一直很清楚她做的事情。”但是德劳拉感到痛苦，因为他证明西埃尔瓦·玛丽亚已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在那个孤独的房间里面对死亡的恐惧。

在那个星期中，何塞法·米兰达女院长寄给主教一份她亲手写的既含有抱怨也含有要求的申述书。她要求免除修女们对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监护责任，她认为这种监护责任是对她们已经充分涤除的罪孽的过时的惩罚。她重新列了一个关于已经记入言行录的重要事件的清单，这些事件只能说明小女孩同魔鬼保持着一种不可告人的联系。最后她怒气冲冲地控告了卡耶塔诺·德劳拉滥用职权、思想放纵、对她的私愤和无视修道院的禁令随意往里带食物的行为。

德劳拉刚回到家，主教就把申述书拿给他看。德劳拉站着看申述书，面部的肌肉一丝不动。看完后却大发雷霆：

“如果说有人被所有的魔鬼：怨恨的魔鬼、不容忍的魔鬼、白痴的魔鬼缠身的话，那就是何塞法·米兰达。真可恨！”

主教对他的激愤态度感到惊讶。德劳拉注意到了，便竭力以平静的语调进行解释。

“我是说，”他说，“她认为罪恶的力量那么无所不能，我看她更像是魔鬼的崇拜者。”

“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同意你的看法。”主教说，“不过，我很高兴和你一致。”

他斥责他可能会做出任何一种过分的事情，要求他忍耐女院长的坏脾气。“福音书上写了许多像她这样的女人，她们的缺点比她还严重。”主教说，“但是耶稣很赞赏她们。”他不能再说下去，因为雨季的第一声雷鸣在住宅里炸响。然后滚向大海，一场像圣经上描写的大雨把他们同外面的世界隔断了。主教躺在摇椅上，陷入对家乡的思念。

“我们离得多远啊！”他叹道。

“离什么？”

“离我们自己。”主教说，“一个人竟然花了一年才知道自己是孤儿，你说这公平吗？”没等对方回答他就道出了他的思乡之情。

“一想到在西班牙人们已经进入梦乡我就充满了恐惧。”

“我们不能干预地球的转动。”德劳拉说。

“但是我们可以装做不知，这样就不痛苦了。”主教说，“除了信仰，伽利略所缺少的是心。”

德劳拉了解折磨着主教的那种恐慌情绪。自从他突然感到衰老后，在那些凄凉的落雨之夜，他总是忍受着恐惧的折磨。他能做的只是转移他对他那倒霉的精神的注意力，直到被睡意征服。

四月底，张贴的布告上说，新总督堂罗德里科·德·布恩·洛萨诺即将到来，路过此地，然后前往他的圣菲总督府。他的随行人员有法官、政府官员、他的仆人和私人医生，还有一支女王送给他的、为排解对印第安人的厌倦心情用的四重奏弦乐曲。总督夫人和女修道院院长沾点亲，要求把她安顿在修道院里。

西埃尔瓦·玛丽亚被遗忘在腐蚀性的生石灰、沥青的蒸气、折磨人的锤击声和一直侵入到修道院内院的各类人的高声叫骂声中。脚手架倒了，发出一阵巨响。一个泥水匠丧生，七个工人受了伤。女院长把灾祸归罪于西埃尔瓦·玛丽亚这个丧门星。在修道院建院五十周年时，她利用这个新机会坚持要求把她转到别的修道院去。这一次她提出的理由主要是有一个中邪的女孩为邻，对总督夫人是不合适的。主教没有理睬她。

堂罗德里科·德·布恩·洛萨诺是一个成熟持重、年轻漂亮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巴斯克球戏和猎石鸡的冠军。他比妻子大二十岁，他凭着他的翩翩风度弥补了这一不足。即使在笑他自己的时候也用整个身体。有机会他就展示自己的肉体。一感觉到夹带着

夜晚的鼓声和熟透的番石榴的香味的加勒比海风，他便脱掉春天的衣服，袒露着胸脯从女士们中间走过。上岸时他只穿着衬衫，既没发表演说也没有放礼炮。尽管主教早就明令禁止，但人们还是以他的名义批准跳方丹戈舞、布恩德舞和昆比安巴舞，还在空旷的场地斗鸡、斗牛。

总督夫人几乎是个少女，特别活泼，但有点任性，像一阵乍起的大风一样冲进修道院。没有一个角落她不查看，没有一个问题她不想明白，没有任何好东西她不想改进。在察看修道院的过程中，她是想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想的那样轻易地使一切尽善尽美，以致使女院长觉得应该减少她对监狱的不良印象。

“不值得你看，”她对她说，“这里只有两个女囚犯，其中一个被魔鬼缠身。”

一听这话，她的兴趣就来了。无论是房间尚未收拾还是囚犯没有准备，都挡不住她。房间的门一打开，马丁娜·拉博德就扑在她面前，哀求宽恕。

她曾两次企图逃走，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现在要求宽恕似乎就难了。第一次发生在六年前，她和另外三个因不同的罪行判处不同徒刑的修女一起想从面对大海的露台上逃走。一个修女逃了出去。从那以后，窗口就被封死了，露台下的院子也加固了。第二年，未能逃走的那三个修女把当时睡在楼里的女看守捆起来，从一道便门逃了出去。据马丁娜的忏悔神甫说，她的父母又把她送回了修道院。漫长的四年来，她是修道院唯一的女囚犯，没有权利去探访室会见亲友，也无权利去小教堂望星期天的弥撒。所以，得到宽恕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总督夫人答应替她去向丈夫说情。

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间里，由于生石灰和沥青的难闻的气

味，空气仍然刺鼻。但是有了一种新秩序。女看守一打开房间，总督夫人就觉得有一阵寒冷的邪风扑来。西埃尔瓦·玛丽亚穿着破长衫、脏套鞋坐在一个被她自己的光线照亮的角落里慢慢地缝着什么。直到总督夫人跟她打招呼才抬起头来。总督夫人在她的目光里感觉到一股不可克制的诉说的力量。“圣体啊！”她低声说，接着向里头走了一步。

“小心，”女院长对她耳语说，“她就像一只母老虎。”

女院长抓住了她的手臂。总督夫人没有进去，但是一看见西埃尔瓦·玛丽亚那副样子，她就想把她赎出来。

省长是个过着独身生活的轻薄男子，他请总督和他共进一顿单身男人用的午餐。进餐时，奏了一支西班牙四重奏弦乐曲，一个圣哈辛托鼓号乐队进行了演奏，跳了集体舞，举行了黑人化妆游艺会——这是模仿白人舞蹈胡乱编织的舞蹈形式。吃饭后甜食时，客厅的深处拉开一道幕，省长用相当于其体重的金子买的那个埃塞俄比亚女奴出现了。她穿着一件几乎是透明的长衫，这进一步增加了她赤身裸体的危险。在众人身边展露了一番她的身姿后，停在了总督面前，她的长衫从她的肉体上滑落到了脚上。

她那完美无缺的胴体使众人为之震惊。肩头并没有因为买卖时打的银色烙印而遭亵渎，后背也没有因为印着第一个主人的姓名的缩写而遭亵渎。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亲狎的气息。总督面色发白，喘了口气，把手一挥，把他脑海里难以忍受的幻觉驱散。

“看在主的分上，快把她带走！”他命令说，“我今生再也不想看见她。”

也许是为了对总督的轻浮态度进行报复，当女院长在她的私人餐厅请总督夫妇进晚餐时，总督夫人把西埃尔瓦·玛丽亚带了

来。马丁娜曾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摘她的项链和手镯，不然的话，你们会看到她有多么厉害。"果然不错。她们给她穿上她来修道院时穿的祖母的衣服，给她洗了、梳了披散的长发，使头发拖在身后更好看了。总督夫人亲自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丈夫的桌前。连女院长都对她的非凡的姿容、她自身的光华和长发的无比秀美惊呆了。总督夫人对着丈夫的耳朵说：

"她中了邪了。"

总督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在布尔戈斯见过一个被魔鬼缠身的女人，她不停地拉了一宿屎，把房间都拉满了。他希望西埃尔瓦·玛丽亚不要遭到这样命运，便把她交给他的医生治疗。医生们确信她没有任何狂犬病的症状，和阿夫雷农西奥的看法一致，认为她不可能受到狂犬病毒的传染。但是谁也无权怀疑她已被魔鬼缠身。

主教趁着节日对女院长的申述书和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最后安排问题进行了考虑。卡耶塔诺·德劳拉则想进行驱邪前的洁身工作，带着木薯面饼和水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但未能如愿。他夜里神志紊乱，白天不肯睡眠，拚命地写无所顾忌的诗，这是平息他的肉体的欲望的唯一的办法。在几乎过了一个世纪后图书馆被拆毁时，这些诗有一些仍保存在一份几乎辨认不清的纸卷里。第一首，唯一完全看得清的一首是对他自己十二岁时的样子的回忆：在阿维拉学校的铺着石头的院子里，他冒着春天的濛濛细雨，坐在他的学生衣箱上。他穿着按照他的身材改做的他父亲的衣服，从托莱多动身骑了几天的骡子刚刚到达。衣箱比他本人重两倍，因为他母亲把他直到期末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统统给他装在了里头。看门人帮助他把衣箱放在院子中央，让他呆在那儿淋着小雨。

“ 把箱子提到三楼去吧，”看门人对他说，“ 那里有人告诉你睡在哪里。”

有一会儿，全学校的学生都跑到对着院子的台子上，等着看他怎样把衣箱运到楼上去。这时他就像一出戏的唯一的角色，他自己却没有察觉。当他明白没有人肯帮助他时，他便把箱子里能够用手抱的东西拿出来，顺着用粗石头砌的陡直的楼梯抱到三楼上去。辅导老师把新生宿舍的两排床铺中他的床位指给他。卡耶塔诺把他的东西放在床上，返回院子，又爬了四次才把东西运完。最后，他抓着箱子的提手，把空箱子顺着楼梯拖上了楼。

他经过每层楼时，在阳台上看热闹的师生没有再看他。但是等他爬上三楼时，校长却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等着他，并带头鼓起掌来。其他人也跟着欢呼起来。这时卡耶塔诺才知道他已经通过了学校接待新生的第一项仪式，这便是什么也不问，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把衣箱运到楼上的宿舍。他的敏捷的头脑、善良的性情和坚强的毅力，被宣布为新生的榜样。

但是，最能代表他的过去的往事是那天晚上他在校长室的谈话。校长约他去谈谈在他的衣箱里看到的那唯一的一本书。书的装钉线已绽开，页码不全，封面已掉，他偶尔把书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时就是这样。在旅行的夜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渴望了解书的结尾。校长想知道他的看法。

“ 把书看完后我会知道的。”他说。

校长轻松地微微一笑，把书锁了起来。

“ 你永远不会知道了。”校长对他说，“ 这是一本禁书。”

二十六年后，他在主教的藏书室门口意识到，凡是他摸过的书他都读了，准读的还是禁读的都有，唯独没有读完那一本。当他想到一种完美的生活在那一天结束了，另一种难以预料的生活

开始了，他不禁浑身一颤。

在斋戒的第八天他开始进行下午的祈祷时，有人通知他主教在客厅等着他接待总督。即使对总督来说这也是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因为这是他在第一次游览城市时突然想到的。当人们召唤附近的官员、稍微整理一下客厅的时候，他不得不站在鲜花盛开的露台上观望眼前的房顶。

主教和他的参谋部的六位教士接待了他。他让卡耶塔诺·德劳拉坐在他右边。主教只介绍了他的全名，而未提他的任何头衔。在交谈开始前，总督用同情的目光察看了墙皮剥落的四壁、破旧的窗帘、最便宜的手工家具和穿着粗糙的法衣、汗流满面的教士。主教近乎自豪地说："我们是木匠约瑟的儿子。"总督做了个理解的表情，接着讲述起他第一个星期的印象。他谈到了他想象中的计划：战争的创伤一旦痊愈，他就增加同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谈到了政府干预教育的功绩；谈到了对文学艺术的鼓励措施，以便使这些殖民地的边区和世界相称。

"时间是属于改革的。"他说。

主教再一次证实了尘世的权力是多么轻率。他把食指哆哆嗦嗦地指向德劳拉，但没看他，同时对总督说：

"我们这儿了解这类信息的是卡耶塔诺神甫。"

总督顺着他的食指看去，看到远处的一张面孔和一双惊呆的眼睛。那双眼睛正不眨眼地望着他。他怀着真正的兴趣问德劳拉：

"你读过莱布尼茨① 的书吗？"

"读过，阁下。"德劳拉说，又解释说，"这是由于我的职务

①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

关系。”

访问结束时，已无庸置疑，总督最感兴趣的是了解西埃尔瓦·玛丽亚的处境。他解释说，他的来访就是为了她，为了女院长的安宁。她的忧虑使他感到很不安。

“我们还缺乏确凿的证据，不过修道院的言行录告诉我们，那个不幸的女孩已被魔鬼缠身。”主教说，“女院长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她认为你们落入了撒旦的陷阱。”总督说。

“不仅是我们，还有整个西班牙。”主教说，“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是为了实行基督的宗教。我们在弥撒、宗教游行和守护神的节日上达到了目的，但在精神上尚未达到。”

他提到了尤卡坦，那里建造了豪华的大教堂，用来遮蔽异教的金字塔，却没有想到，土著人去望弥撒是因为在银色的祭坛底下，他们的圣殿仍存在。他提到了征服以来一直存在的血统的混合：西班牙人的血和印第安人的血、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同各种各样的黑人甚至伊斯兰教的曼丁加人的血的混合。他问自己，这样的混血在上帝的王国里能否存在。尽管他有呼吸上的障碍和老年人的咳嗽，直到讲完也不给总督插话的机会：

“这一切，不是魔鬼的陷阱又会是什么呢？”

总督的脸色突然改变。

“阁下的失望心情太重了。”他说。

“阁下不要这么说。”主教十分礼貌地说，“我想把我们需要的宗教力量变得更显要，使这些人民无愧于我们做出的牺牲。”

总督又接着刚才的话碴儿说：

“根据我的理解，女院长的考虑是可行的。”他说，“她认为别的修道院也许有更好的条件来解决如此棘手的问题。”

“阁下应该知道，根据何塞法·米兰达的正直、能力和权威，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圣克拉拉。”主教说，“而且上帝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我可以把你的话转达给她。”总督说。

“她非常清楚。”主教说，“我感到不安的是，她为什么不敢相信这一点。”

说话时，他觉得一阵哮喘即将发作，便匆匆忙忙结束了谈话。他说女院长交给他的一份关于职责问题的申述书还没有看。他答应，只要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就以主教火热的爱心加以解决。总督对他表示感谢，以个人的方式礼貌地结束了会见。他也忍受着顽固的哮喘病的折磨。他提出让他的医生来给主教看病。主教不相信自己的病能够治好。

“我的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他说，“我的年龄都达到圣母死时的年龄了。”

和问候时的情形相反，告别拖的时间长些，而且彬彬有礼。包括德劳拉在内的三位教士陪伴总督默默地穿过阴暗的走廊，走到大门口。总督的卫兵将戟交叉在一起组成一道墙把乞丐拦住。在上马车前，总督把身子转向德劳拉，用食指指着他，不容分辩地说：

“你可别让我忘记你。”

他说这句话如此突然和费解，德劳拉来不及说什么，只恭敬地点了点头。

总督前往修道院，去把拜访主教的结果告诉女院长。

几个小时后，即将离开修道院时，尽管总督夫人一再追逼，他还是拒绝赦免马丁娜·拉博德，因为他认为这对他在监狱里看到的那许多损害人类尊严的囚犯来讲，是个有害的先例。

主教向前躬着身子，闭着眼睛，想把呼吸的咝咝声压下去，这样一直呆到德劳拉回来。助手们已经悄悄离开客厅，客厅里一片黑暗。主教看了看周围，看到一排排空椅子靠在墙边，只有卡耶塔诺站在客厅里。他用很低的声音问他：

“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人吗？”

德劳拉做了个模棱两可的表情算是回答。主教吃力地直起身子，两手扶着椅子扶手，直到呼吸平静下来为止。他不想吃晚饭。德劳拉赶紧点上一支蜡烛，照着路送主教去卧室。

“我们对总督很不好。”主教说。

“有理由对他好吗？”德劳拉说，“不正式通报，谁也不能敲主教家的门。”

主教不同意他的看法，非常坚决地要他明白这一点。“我家的门是教堂的门，他的表现证明他像一位先前的教徒。”他说，“由于我的胸中患的疾病，我那样对待他太不慎重了。我必须想办法补救。”走到卧室门口时，他说话的语气和话题改变了。他拍了拍德劳拉的肩头，跟他告别。

“今天晚上为我祈祷吧。”他对德劳拉说，“我担心黑夜会变得很长。”

果然，由于接待来访时就预感到的哮喘病发作，他觉得自己要死了。由于酒后呕吐剂和其他激烈的缓和剂没有减轻他的症状，人们只好给他做紧急放血治疗。天亮时，他的精神又恢复正常了。

在隔壁的图书馆里失眠的卡耶塔诺却一无所知。当有人通知他主教在卧室里等他时，他正开始做早晨的祈祷。他看见主教在床上吃早饭：面包、奶酪和一杯巧克力饮料，一面吃一面像一个新风箱似的喘气，情绪很激动。卡耶塔诺一看见他就明白他已

采取了决定。

正是这样。和女院长的请求相反，西埃尔瓦·玛丽亚仍然留在圣克拉拉修道院里，卡耶塔诺在主教的完全信任下继续照管她。她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受监狱制度的管制，而应该和修道院的居民一样享有一般的待遇。主教非常感谢言行录上的记述，但是言行录缺乏严格性，致使事情的发展过程不清楚，所以驱邪师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主教最后要求德劳拉以他的名义去拜访侯爵，以便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只要他有时间、健康允许，就召见他过问这件事。

“我要说的就这些。”主教最后对他说，“上帝赐福于你。”

卡耶塔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一口气跑到修道院，但是西埃尔瓦·玛丽亚不在她的房间里。在礼拜堂里找到了她：她戴满了真正的珠宝，长发拖到了脚上，正摆好姿势让总督的随行画像师画像。她服从画像师安排的老实态度和她的长发一样令人惊讶。卡耶塔诺如醉如痴，坐在阴影里偷偷地望着她。这使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打消心中的疑团。

傍晚时分，她的像画完了。画像师站在远处仔细察看画像，又加了两三笔。写名字前，他要西埃尔瓦·玛丽亚看看她的像。跟她一模一样，脚下是一团云，周围是一群顺从的魔鬼。她不慌不忙地欣赏着，看到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她终于说：

“像一面镜子。”

“画有魔鬼也像吗？”画师问。

“是的。”她说。

画完像后，卡耶塔诺送她回房间。他从未见过她走路，她走路的样子像跳舞那么优美、轻松。他也从未见过她穿过除了长囚衣外的其他衣服，那身女王装使她显得既年轻又漂亮，充分展示

出一个女人的魅力。他们从未一块走过路，双双这么天真无邪地相伴而行，他感到很愉快。

多亏总督夫妇的斡旋，房间完全不同了。因为在告别前的拜访中，他们使女院长明白了主教讲的那些令人信服的道理。床垫换成了新的，床单是亚麻的，枕头是羽毛的。增加了日常的卫生用品和浴盆。窗口的交叉木条已拆除，海上的光线射进来，在新刷的墙上闪烁。由于饭菜和内院的修女们吃的一样，就不需要从外面往里带了。但是德劳拉还是经常偷偷地从大门口往里带美味可口的食物给她吃。

西埃尔瓦·玛丽亚想请他一起吃午饭。德劳拉只吃了一块修女们做的有名的小饼干。吃饭时，她突然说：

“我见过雪。”

卡耶塔诺并不感到意外。从前有一位总督，他想把比利牛斯山的雪弄来，让土著人见识见识，因为他不知道几乎在海里的圣玛尔塔雪山上有雪。也许堂罗德里科·德·布恩·洛萨诺以其新颖的艺术描绘过雪景。

“不，”小女孩说，“是在梦里见到的。”

她说，她坐在窗前，窗外下着大雪，她的腿上放着一串葡萄，她一面一粒一粒地摘着葡萄吃一面望着下雪。

德劳拉突然感到一阵恐惧。面对即将听到的最后一句回答而颤抖。他鼓起勇气问：

“那最后呢？”

“我害怕说。”西埃尔瓦·玛丽亚说。

他不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了。他闭上眼睛为她祈祷。祈祷完后，他的情绪完全不同了。

“不必担心。”他对她说，“我向你保证，有圣灵保佑，你很

快就会获得自由，得到幸福的。”

贝尔纳达一直不知道西埃尔瓦·玛丽亚被关在修道院里。她几乎是偶尔知道的。一天晚上，她遇见杜尔塞·奥利维娅在打扫和整理房子。在幻觉中，她以为她是自己的某个亲人。为了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她便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看。在这个过程中，她突然发觉，她很久没看到西埃尔瓦·玛丽亚了。卡里达德·德尔·科夫雷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她：“侯爵先生对我们说，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她看见丈夫的卧室里亮着灯，便不敲门进去了。

侯爵躺在吊床上睡不着。吊床笼罩着一片为驱蚊子而缓缓燃烧的马粪烟。他看见由于穿着丝绸晨衣而变了样子的古怪女人走进来，他也以为是个幽灵，因为她面色苍白，无精打采，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贝尔纳达问他西埃尔瓦·玛丽亚在哪里。

“她好些天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说。

她觉得情况非常不妙。为了喘口气，她不得不坐在碰到的第一把扶手椅上。

“你是说阿夫雷农西奥不得已那么做了。”她说。

侯爵划了个十字：

“上帝宽恕我们吧！”

他说了实话。他谨慎地对她解释说，他没有及时告诉她，因为他想按照她的愿望对她讲此事：就当做她已经死了。贝尔纳达眼也不眨地注意听着。十二年来，贝尔纳达和丈夫一直过着不和睦的生活，她从未这么注意地听他讲话。

“我知道，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侯爵说，“不过，这可以换回她的生命。”

贝尔纳达叹道：“你是说，现在我们的耻辱已众所周知。”她

在丈夫的眼皮间看到一滴泪水在闪动，心里不禁一阵颤栗。这一次不是因为想到死亡，而是因为不能不相信不幸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她没有想错。侯爵使出全身的力气从吊床上下来，倒在她面前，用无用的老人的刺耳声音大哭起来。丈夫的炽热泪水透过丝绸晨衣顺着她的腹股沟往下流，贝尔纳达心软了。她虽然对西埃尔瓦·玛丽亚无比地憎恶，还是坦白地说，知道她还活着，心里好受多了。

“除了死亡,我什么都理解。’她说。

他又把自己关在他的房间里，只喝蜜糖与可可饮料。但是两个星期后出来时，已枯瘦不堪。侯爵早就察觉贝尔纳达在三番五次地外出，只是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在阳光升高前，他看见贝尔纳达骑着一匹温顺的骡子从院子的大门出去，后面跟着另一头骡子，驮着行李。许多次她都是这样离去的：没有人给她牵骡子，也没有奴隶跟着；既不向任何人告别，也不做任何交待。但是侯爵明白，这一次她走后再也不回来了，因为除了往常的箱子外，她还带走两个装满纯金子的罐子。多少年来她一直把那两个罐子埋在床底下。

侯爵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又陷入被奴隶们用刀子捅死的恐惧，即使白天也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所以当卡耶塔诺·德劳拉按照主教的吩咐来拜访他时，不得不推门而入，因为他用门环敲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几只大猎犬在笼子里汪汪叫，但是他不停地往前走。侯爵正在果园里睡午觉。他穿着撒拉逊人穿的带风帽的外衣，戴着托莱多人戴的那种圆沿帽，身上落满了甜橙花。德劳拉没有叫醒他，只是站在床前打量他，就像看到了衰老的、被孤独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西埃尔瓦·玛丽亚。侯爵醒了，半天才根据眼罩认出了他。德劳拉伸开五指举起一只手表示要他安静。

“上帝保佑你，侯爵先生。”他说，“你好吗？”

“我在这儿都快发臭了。”侯爵说。

他用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揉了揉因午睡而变得模糊不清的眼睛，在吊床上坐起来。卡耶塔诺为自己冒昧地闯进来表示歉意。侯爵解释说，敲门的声音之所以没人理，是因为接待客人的习惯早就丧失了。德劳拉用严肃的口吻说：“主教先生很忙，哮喘得厉害，他要我代表他来见你。”礼节性的开场白说完后，他坐在吊床前，开始谈使他心急如焚的事情。

“我想告诉你，主教已把你女儿精神上的康复问题交给我负责。”他说。

侯爵对他表示感谢，并想知道他女儿的情况如何。

“还好。”德劳拉说，“不过，我想帮助她恢复得更好。”

他解释了驱邪的内容和方法，对他谈了耶稣赋予他的弟子驱除肉体内的污秽灵魂、治疗疾病和弱点的权力，对他讲述了古罗马军团的福音课经和两千只猪中邪的情形。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确定西埃尔瓦·玛丽亚是不是确实中邪了。他不相信这个，但是他需要侯爵帮助他消除一切疑虑。他说，首先他想知道他女儿进修道院前的情况怎样。

“不知道。”侯爵说，“我觉得对她，知道得越多就越是不了解她。”

把她抛在奴隶们的院子里不管的过错折磨着他的心灵。他把她可能几个月沉默无言、不理智的暴力的爆发和嘲弄母亲的主意——把母亲戴在她手腕上的铃铛给猫戴上——都归咎于自己。为了了解她，最大的困难是她那种把说谎当作快乐的癖好。

“就像黑奴一样。”

“黑奴对我们说谎，但对他们自己不说谎。”侯爵说。

在卧室里，德劳拉一眼就分清了哪是她祖母的数不清的用品，哪是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新东西：活生生的洋娃娃、上弦的女舞蹈演员和八音盒。侯爵送女儿去修道院时用的小手提箱仍然像侯爵收拾的那样放在床上。落满尘土的古诗琴被随便地丢在一个角落里。侯爵解释说，这是一件废弃不用的意大利乐器，它使小女孩弹奏它的才能表现了出来。侯爵开始心不在焉地调弦，最后不但能以良好的记忆演奏，而且唱起了和西埃尔瓦·玛丽亚一起唱过的歌儿。

那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时刻。琴声把侯爵关于女儿的、未能清楚告诉德劳拉的事情告诉了他。侯爵的情绪如此激动，歌儿都唱不下去了。他叹道：

“想不到那顶帽子她戴着那么合适。”

德劳拉被他的激动情绪感染了。

“看得出来，你很疼爱她。”他说。

“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她。”侯爵说，“为了看到她，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

德劳拉又一次感动，圣灵不会忽略那怕是最微小的细节。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她没有中邪，”他说，“那你就很容易见到她。”

“你去跟阿夫雷农西奥谈谈，”侯爵说，“一开始他就说西埃尔瓦·玛丽亚很健康，只有他能够说清楚。”

德劳拉看出了他的难处。阿夫雷农西奥可能是他的保护人，跟他谈话可能会自讨没趣儿。侯爵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说。

德劳拉用脑袋做了个意味深长的动作。

“我看过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他说。

“为了使她复原，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侯爵坚持说。由于德劳拉没有任何表示，他最后说：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恳求你拯救她。”

心灵已受到创伤的德劳拉对他说：

“我恳求你,不要让我忍受更多的痛苦了。”

侯爵没有再坚持。他拿起床上的小提箱，请德劳拉带给他女儿。

“起码她知道我想念她。”侯爵对他说。

德劳拉没有道声别就匆匆走了。他把小手提箱藏到法袍下裹起来，因为瓢泼似的下着雨。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心里在哼唱古诗琴弹的那支歌儿的几句歌词。他在风雨吹打下大声唱起来，并且从头到尾重唱了一遍。在手工艺人的作坊区，他向左边的僻静的住所拐去，嘴里仍然唱着歌。他敲了敲阿夫雷农西奥家的门。

静悄悄地过了很久，才传来腿瘸的人匆匆的脚步声和一个半睡不醒的声音：

“谁呀!”

“政府官员。”德劳拉说。

为了避免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只想到这个办法。阿夫雷农西奥开了门，以为真是政府的官员。他不认识。“我是主教管区的图书馆管理员。”德劳拉说。医生在昏暗的门廊里为他带路，帮助脱掉被雨淋湿的法袍。按自己的方式用拉丁语问道：

“在什么战斗中你失去的那只眼睛？”

德劳拉用他的古拉丁语对他讲述了观察日蚀时发生的小问题，并且详细告诉他，尽管主教的医生肯定地说眼罩确实管用，但是眼病还是迟迟不愈。不过，阿夫雷农西奥注意的只是他的纯

正的拉丁语。

“你的拉丁语真是完美无缺。”他钦佩地说，“你是哪里人？”

“阿维拉人。”德劳拉说。

“那就更不一般了。”阿夫雷农西奥说。

他让他脱下教士服和凉鞋，给他拧干衣服控干鞋。然后把他的自由缎斗篷给他盖在袜裤上。接着又把他的眼罩取下来，扔进了垃圾箱。“最不幸的是，你这只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应该看到的东西多。”他说。德劳拉特别注意大厅里密密实实排列着的许多书。阿夫雷农西奥察觉到了这一点，把他带到药房，那里的高书架挨着屋顶，书更多。

“圣灵啊！”德劳拉叫道，“这简直是彼特拉克① 的藏书室。”

“比他的书还多二百本左右。”阿夫雷农西奥说。

他让他随意翻阅那些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孤本。德劳拉辨认着，高兴地浏览着，然后无比遗憾地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去。在特殊的位置，和永垂不朽的《修士赫龙迪奥》② 在一起，他看到了伏尔泰的法文版全集和一部《哲学通讯》③ 的拉丁文译本。

“伏尔太的拉丁文译本几乎是左道邪说。”他开玩笑地说。

阿夫雷农西奥告诉他，此书是由科英布拉④ 的一位僧侣翻译的。为了供朝圣者们开心，此人不惜笔墨，写了许多奇特的书。德劳拉翻阅时，医生问他懂不懂法文。

“不会讲，只会读。”德劳拉用拉丁语说。接着又说，一点不

①佛朗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古书收藏家。

②《修士赫龙迪奥》，西班牙作家何塞·佛朗西斯科·德·伊斯拉（1703—1781）的传记作品，全名为《著名讲道士修士赫龙迪奥的历史》。

③《哲学通讯》，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理论著作，出版于1734年。

④科英布拉，葡萄牙城市。

难为情："此外，我也可以看希腊文、英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一点德文的书。"

"我问你这个，是因为你谈到了伏尔泰。"阿夫雷农西奥说，"他的散文尽善尽美。"

"这使我们更加感到难过。"德劳拉说，"遗憾的是，它是一个法国人写的。"

"你说这话，因为你是西班牙人。"阿夫雷农西奥说。

"在我这样的年纪，身上有多少代人的混血，我也说不清是哪国人了。"德劳拉说，"甚至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在这些王国，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血统。"阿夫雷农西奥说，"我想，恐怕得多少世纪后才能知道。"

德劳拉一边交谈一边不停地翻阅着图书。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突然想起十二岁时学校校长给他没收的那本书。他只记得书中写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漫长一生中，他曾反复对能够帮助他的人讲这个故事。

"你记得书名吗？"阿夫雷农西奥问。

"我始终不知道。"德劳拉说，"为了了解故事的结尾，我什么都可以献出来。"

医生冷不丁把一本书放在他面前，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一部塞维利亚出版的古老的《阿马迪斯·德·高拉》（四卷）。德劳拉哆嗦着翻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差一点不可救药。他终于鼓起勇气说：

"你知道这是一本禁书吗？"

"它的命运跟这些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一样。"阿夫雷农西奥说，"不印这类书，而只为学者印刷论著。如果不偷偷地看骑士小说，今天的穷人看什么书呢？"

“有别的书。”德劳拉说，“《堂吉诃德》初版一百册在出版当年就在本地流传开来。”

“人们没读到，”阿夫雷农西奥说，“经过海关运到各个王国去了。”

德劳拉没有听他讲话，因为他认出了《阿马迪斯·德·高拉》的珍藏本。

“九年前，这本书从我们图书馆的秘密书框里消失了，一直没见它的踪迹。”他说。

“我应该想到这一点。”阿夫雷农西奥说，“不过，有别的理由认为它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在一年多时间里，它至少在十一个人中间手手相传，至少有三个人已死去。我确信，他们肯定是某种不明气味的受害者。”

“我的责任是向宗教裁判所揭发此事。”德劳拉说。

阿夫雷农西奥开玩笑地说：

“我说过左道邪说吗？”

“我说这话是因为这里有一本别人的禁书，没有人告发。”

“这本书和其他许多本书。”阿夫雷农西奥说，同时用食指对着他那些放满书的书架搁板画了个大圆圈。“不过，如果你从前为此事到这儿来，我也许不会给你开门。”他转向他，愉快地说，“但是，你现在来了，我很高兴，看到你在这儿很愉快。”

“侯爵对他女儿的命运感到焦虑，他建议我到你这儿来。”德劳拉说。

阿夫雷农西奥让他坐在他面前，开始进行使他们陶醉的交谈。这时一场可怖的暴风雨使大海翻动着滔天的波浪。医生聪明而博学地讲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狂犬病史、狂犬病造成的无人过问的灾难和千百年来面对这些灾难医学的无能为力。他举了一些

令人遗憾的例子，说明人们总是把狂犬病同中邪和其他某些精神失常的疾病或神经错乱混为一谈。至于西埃尔瓦·玛丽亚，经过几乎一百五十天后，好像不存在染上狂犬病的可能性。阿夫雷农西奥最后说，唯一现实的危险是，她可能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被残忍的驱邪术折磨死。

德劳拉认为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中世纪医学的夸张，但他没有进行争论，因为这对他从神学上说明小女孩没有中邪很有用处。他说，西埃尔瓦·玛丽亚会讲的三种非洲语言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完全不同，但远远没有在修道院里归咎于它们的极其有害的罪行。有许多证据证明她具有不一般的体力，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同样也不能证明她有任何升腾的功能或预卜未来的能力。而这两种现象的确也可以作为神力的辅助证据。然而德劳拉却竭力想得到著名的教友会会员或其他团体的成员的支持，但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反对修道院的言行录，也不敢反对公众的轻信态度。但他明白，无论是他的还是阿夫雷农西奥的观点，都说服不了任何人，两个人的观点合在一起更不行。

“也许是我和你在反对所有的人。”他说。

“所以我才对你到这儿来感到意外。”阿夫雷农西奥说，“我不过是宗教裁判所的狩猎场上的一个被人追捕的猎物。”

“老实说，要不是圣灵非要通过那个女孩证明我的信仰的坚定性的话，我根本不清楚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德劳拉说。

一说完这句话，阻塞着他的喉咙的疙瘩就消除了。阿夫雷农西奥望着他的眼睛，透过眼睛看到了他的内心，发现他几乎要哭了。

“没有必要这么难过，”他用劝慰的口吻对他说，“你到这儿

来也许仅仅因为你需要谈谈她的情况。”

德劳拉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他站起来，寻找房门的位置，但没有惊慌地逃走，因为他没有把脱掉的衣服穿上。阿夫雷农西奥帮他把还没有干的衣服穿好，一面向他表示希望继续他们的交谈。“和你交谈，可以一直不停地谈到下一个世纪。”他对他说。阿夫雷农西奥拿来一瓶可以治疗他观日蚀的眼伤的透明眼药水，想挽留住他。并把他从门口叫回来拿他忘在房间某个角落的小手提箱。但是德劳拉似乎被一种致命的痛苦所左右。他感谢那个下午，感谢医生的帮助和他的眼药水，但是他唯一应允的事情是保证改日回来多谈一会儿。

他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看到西埃尔瓦·玛丽亚。走到门口他才发现天色已完全黑了。雨已停止，但是下水道被大雨灌得满满的。德劳拉顺着街心往前走，雨水漫到了他的脚脖子。由于宵禁的钟声即将敲响，修道院的看门人拦住了他。他让她躲开。

“这是主教先生的命令。”

西埃尔瓦·玛丽亚恐惧地醒来，在黑暗中没认出他来。他不知道怎么对她解释，他为什么在一个这么不平常的时刻到这儿来。但他立刻找到了借口：

“你父亲想见你。”

小女孩认出了小手提箱，脸上马上燃起了怒火。

“可我不想。”她说。

他慌乱不安地问她，为什么不想。

“因为我不想。”她说，“我死也不想。”

德劳拉想把她那只健全的脚脖上的皮绳解下来，以为这样她会高兴。

“躲开，”她说，“别碰我。”

他不听，小女孩啪啪地向他的脸上吐唾沫。他一动不动，并把另一张脸也给她吐。西埃尔瓦·玛丽亚又吐了他一脸。他又换了一张脸让她吐，被锁在心头的快乐终于冲破了牢笼，他陶醉了。他闭上眼睛，在心里祈祷，一面继续让她往脸上喷吐。他越是感到快乐，她吐得就越凶，直到她明白她的发怒毫无用处为止。这时，德劳拉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邪女人的可怖表现。西埃尔瓦·玛丽亚的长发像美杜莎[1]的蛇发一样凭着自己的生命竖立起来，嘴里流出一股绿口水，同时用狂热的信仰者的语言发出一连串的辱骂声。德劳拉摇动他的耶稣受难像，把受难像凑近她的脸，恐怖地吼道：

"快离开这儿，不管你是谁，那怕是地狱的畜牲！"

他的吼声更加激怒了小女孩，狂暴的举动几乎把皮绳的扣袢崩开。女看守惊慌地赶来，竭力想制服她。但是只有马丁娜以她那种美妙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德劳拉逃走了。

晚饭时，他没有回来给主教读经，主教感到不安。他觉得自己飘浮在脚下的一团云雾上。在那里，除了被魔鬼夺去尊严的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恐怖形象外，人间和阴间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无关。他躲进图书馆，但是拿起书却看不下去。他怀着强烈的信念祈祷，唱古诗琴弹过的歌曲，流着热泪哭泣，泪水像滚烫的油一般烧灼着他的腑脏。他打开西埃尔瓦·玛丽亚的小提箱，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桌上。他仔细地察看，怀着肉体的贪婪的欲望闻着，他爱那些东西，用下流的六步韵诗跟它们说话，直到再也控制不住。于是他脱掉上衣，从大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他

①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戈耳工，原为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奇丑无比。

从未敢碰过的钢鞭，怀着无比强烈的仇恨开始鞭打自己，不把西埃尔瓦·玛丽亚留在他心中的最后一丝痕迹拔除干净决不罢休。一直等待着德劳拉回来的主教，发现他在血和泪水的泥泞中打滚儿。

“她是魔鬼，我的神甫，”德劳拉对他说，“是所有魔鬼中最可怕的一个。”

五

主教把他喊到他的办公室里，严肃地听着他进行老实而彻底的忏悔。但他知道，他不是在主持一种圣礼，而是在进行法庭审判。他对他的唯一偏爱是偷偷地保守着他的真正缺点，但是取消了他的封地和特权，且不向公众做任何解释，命令他到“上帝之爱”医院去护理麻疯病人。他恳求允许他为麻疯病人做五点钟的弥撒，以求安慰。主教答应了。他怀着无比轻松的心情跪下，和主教一起念诵了一遍天主经。主教为他祝福，扶他站起来。

“上帝保佑你。”主教对他说。随后便把他从自己的心头抹去了。

即使在卡耶塔诺开始服刑后，主教管区的达官贵人仍然为他说情，但是主教却坚定不移。他批驳了关于驱邪师最终会被他想驱除的魔鬼缠身的论调。他的最后理由是，德劳拉不仅未以基督的不可争辩的权威面对魔鬼，而且不适当地同魔鬼讨论信仰问题。主教说，正是这一点危及到了他的灵魂，把他推到了左道邪说的边缘。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为了一次勉勉强强该受点轻微的惩罚的过失，主教居然对他信赖的人那么严厉。

马丁娜早就怀着可敬的献身精神担负起了照管西埃尔瓦·玛

丽亚的责任。由于未得到赦免，她也感到痛苦。但是小女孩并没有察觉，直到一天下午在露台上刺绣，她抬起眼睛，才看见她泪流满面。马丁娜没有对她掩饰自己的绝望情绪：

“我宁肯死去也不愿被关在这里活受罪。”

她说，她唯一的希望是西埃尔瓦·玛丽亚同她那些魔鬼的来往。她很想知道魔鬼是什么，魔鬼是啥样的，怎样和魔鬼打交道。小女孩列举了六个魔鬼。马丁娜认出了一个，好像是个非洲魔鬼，有一次曾经骚扰她父母的房子。一种新的幻想鼓舞了她。

“我很想跟他谈谈。”她说，并让西埃尔瓦·玛丽亚捎信儿说，“我可以交出我的灵魂。”

西埃尔瓦·玛丽亚故弄玄虚。“魔鬼不讲话，”她说，“看看他的面孔就知道他说的什么。”她一本正经地向她保证，一定通知她，让她下次来时和魔鬼见面。

至于卡耶塔诺，他已老老实实忍受医院的极坏的条件。处在合法的死亡状态中的麻疯病人都睡在茅屋的地上。茅屋屋顶用棕榈叶铺成，地板是整平的泥土地。许多病人以尽可能方便的姿势在地上爬。星期二是综合治疗日，是最累人的。卡耶塔诺自告奋勇，承担为不能自理的病人在马棚木槽里洗身的纯粹牺牲性的工作。当他在服刑的第一个星期二怀着已变成护士的粗布大褂的教士尊严做这件工作时，阿夫雷农西奥骑着侯爵送给他的枣红马来了。

“你那只眼睛好些了吗？”阿夫雷农西奥问他。

卡耶塔诺不给他机会谈他的不幸或同情他的处境。他感谢他的眼药水。实际上，眼药水已经把他的视网膜上的日蚀影象消除了。

“对我，没有什么可感谢的。”阿夫雷农西奥对他说。“为了

治好你的眼疾，我把我们知道的最好的药：几滴雨水，给了你。”

阿夫雷农西奥请他到他家做客。卡耶塔诺对他解释说，不经许可，他不能出门。阿夫雷农西奥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你要是了解这些总督辖区的毛病，就会明白，法规连三天也执行不了。”他对他说。阿夫雷农西奥收拾了一下藏书室，以便在他受审理时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卡耶塔诺兴致勃勃地听他讲，但是不抱任何幻想。

“我走了，你在这儿忍着吧。”阿夫雷农西奥说，同时踢了一下坐骑。“没有任何上帝创造你这样的天才是为了让你来这儿为麻疯病人擦身。”

下一个星期二他给他带来一部拉丁文的（哲学通讯》。卡耶塔诺翻阅着，在书里闻着，估计着它的价值。他越是觉得它价值大，就越是不理解阿夫雷农西奥。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迎合我。”他对他说。

“因为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没有教士便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阿夫雷农西奥说，“病人把他们的肉体交给了我们，但是没有把灵魂交给我们。我们像魔鬼一样活动，想和上帝争夺他们的灵魂。”

“这不符合你的信仰。”卡耶塔诺说。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信仰是什么。”他说。

“宗教裁判所知道。”卡耶塔诺说。

和人们可能想到的相反，这句讽刺话反倒激发了阿夫雷农西奥的热情。“到我家来吧，我们慢慢讨论。”他说，“夜里我只睡两个多钟头，而且断断续续，所以你随时都可以来。”说完，他踢了一下马，走了。

卡耶塔诺突然明白，一种巨大的努力不会半途而废。以前为

了私事讨好他的那些人，如今像见了麻疯病人一样远远地躲开，他那些尘世的文艺界的朋友们也躲到一边，免得和宗教裁判所发生冲突。但是不管怎样他都无所谓。他只对西埃尔瓦·玛丽亚怀有感情。即使这样，他觉得还不够。他确信，没有高山、大海，没有人间或上天的法律，也没有地狱的力量能够把他们分开。

一个夜晚，他灵机一动，不顾一切地跑出医院，无论如何要进入修道院。它有四座门。正门就是那扇转门；另一座门和正门一样大，面对大海；两个小门是仆役们走的门。前两座门无法进入。卡耶塔诺从海滩上很容易认出牢房楼上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窗口。因为只有那扇窗子没有再被封死。他从外面仔细察看大楼，想找个豁口钻进去，但是没有找到。

当他想起“停止宗教信仰”期间居民们为修道院供应东西时走的地道时，他都几乎感到绝望了。兵营或修道院的那些地道完全是时代的产物。城市里至少有六条已为全城人所知。其他的地道在岁月的流逝中也随着各自的传说渐渐被发现。一个当过掘墓人的麻疯病人把卡耶塔诺想找的地道告诉了他：一条废弃的地道，从邻居的后院通入修道院。那个后院上世纪曾是首批修女们的墓地。地道的出口就在牢房楼底下，对着一堵似乎不可翻越的粗糙的高墙。但是卡耶塔诺经过多次尝试后终于翻了过去，因为他相信，依靠祈祷的力量，什么事情都能办到。

黎明前，牢房楼寂静得像一潭死水。他确信，女看守睡在外面，他只防备马丁娜·拉博德就行了，因为她正虚掩着房门打鼾。直到这时，紧张的冒险一直使他提心吊胆。但是当他来到小女孩的房门口、看见开着的铁锁挂在铁环上时，他的心房简直要跳出来了。他用手指尖推了推门，合叶吱嘎响时，他几乎要晕死过去了。他看见西埃尔瓦·玛丽亚还在圣体旁的卧室小灯下睡觉。她

突然睁开眼睛，由于他穿着麻疯病人护士的麻布长衫，她半天才认出他来。他把流血的手指伸给她看。

“我是翻墙进来的。”他悄悄地对她说。

西埃尔瓦·玛丽亚并不吃惊。

“为什么？”她说。

“来看你呀。”他说。

他双手发抖，声音嘶哑，慌乱不安，不知道再说什么。

“滚！”她吼道。

由于害怕嗓子说不出话，他便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滚！”她重复了一声，“不然我要喊了。”他离她特别近，能感觉到她那少女的气息。

“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走。”他说。突然，他感到了另一方面的恐怖，便用坚定的声音说：“所以，如果你叫喊，那你就叫喊吧。”

她紧紧地咬着嘴唇。卡耶塔诺坐在了床上，细细地对她讲述他受的处罚，但是没有把受惩罚的原因告诉她。她知道的比他能够告诉她的情况还清楚。她毫不怀疑地看了看他，问他为什么把眼上的眼罩摘了。

“不需要了。”他说，情绪振作了，“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你的长发像一条金水河。”

两个小时后，他幸福地走了，因为西埃尔瓦·玛丽亚答应，只要把市场上她喜欢吃的甜食带来，他随时都可以回来。第二天晚上他来得很早，修道院里还有活动，她正在油灯下结束马丁娜的刺绣。第三天是晚上他带来点灯用的灯芯和灯油。第四天晚上是星期六，他逗留了好几个小时，帮助她消灭房间里又大量繁殖起来的虱子。当她的长发又变得干净、柔滑时，他又觉得冒出了

欲望的冷汗。他躺在了西埃尔瓦·玛丽亚身边，呼吸很不平静；在离他的眼睛一拃远的地方，他看到一双透明的眼睛。双双不知所措。他恐惧地祈祷着，目光盯着她。她勇敢地说：

“你多大了？”

“三月份我就满三十六周岁了。”他说。

她打量着他。

“你都成了小老头了。”她对他说，语气里带着些许戏弄。她瞅着他额头的皱纹，又以她这么大的女孩最无情的口吻说：“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他听了感到很愉快。西埃尔瓦·玛丽亚问他为什么长一缕白发。

“是一颗痣。”他说。

“是化妆的吧。”她说。

“是天生的。”他说，“我母亲在世时也有。”

他一直望着她的眼睛，她一点也不显得疲劳。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诵道：

“啊，不幸被我遇到的温柔的宝贝。”

她不明白。

“这是我高祖母的祖父的一句诗。”他对她解释说，“他写了三首田园诗，两首挽歌，五首歌词，四十首十四行诗。多数是为一位不怎么迷人的葡萄牙女人写的。那个女人从来也不属于他，先是因为他已经结婚，后是因为她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比他死得早。”

“他也是个教士吗？”

“是士兵。”他说。

西埃尔瓦·玛丽亚的心里一阵激动，因为她想重新听一遍那句诗。他又诵了一遍。这一次，他用清晰而激动的声调吟诵了很

久，一直吟诵到那位在年富力强之时在战争中被石击死的钟情而勇武的先生堂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四十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一首。

吟诵结束后，卡耶塔诺拿起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手，放在他的心上。她感觉到了他胸中的暴风雨般的巨响。

“我的心情总是这样。”他说。

不等让她感到恐惧，他就把妨碍他过正常生活的心事吐了出来。他坦白地告诉她，他时时刻刻都在思念她，吃的喝的东西都有她的味道，生活中每时每刻、四面八方都有她，只有上帝才有权力、有力量像她这样，他心中最大的快乐是和她一起死去。他不看她，继续对她谈着，像吟诵诗时那么流利，那么热情，直到他以为西埃尔瓦·玛丽亚已经入睡。但是她并没有睡，用她那双惊恐不安的小鹿般的眼睛注视着他。她几乎胆怯地问：

“那现在呢？”

“现在不了。”他说，“说出来我就满足了。”

他讲不下去了，默默地哭着把他的手臂放在她的头下，给她当枕头枕着。她蜷缩在他身边。他们就这样躺着，不睡觉也不讲话，直到鸡叫。他必须赶快动身，及时回去做五点钟的弥撒。临行前，西埃尔瓦·玛丽亚把珍贵的奥杜亚项链送给他：十八英寸长的珍珠母与珊瑚串珠。

恐惧已被心中的焦虑取代。卡耶塔诺·德劳拉不能平静，做事心不在焉，坐立不安，直到幸福的时刻到来，溜出医院去看西埃尔瓦·玛丽亚。他气喘吁吁地到达她的房间，衣服被永恒的雨水湿透了。她怀着那么焦急的心等待着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使她振作了起来。整个晚上是她采取主动，朗诵起听了多遍而记住的诗句。“当我停下来观察我的状态，看到你吸引我来的足迹。”

她朗诵道。她淘气地问：

“下一句是什么？”

“我将死去，因为我已愚蠢地把自己交给能够葬送我和杀死我的人。”他说。

她带着同样的感情重复了一遍。他们就这样继续朗诵着，直到把书朗诵完：跳过一些诗句，适当地打乱和改动十四行诗，像主人一样随意支配和玩味诗句。终于疲劳地睡着了。早晨五点钟女看守随着雄鸡的欢唱声来送早饭，他们俩恐惧地醒来。简直被吓死了。女看守把早饭放在桌上，提着灯照例查看一番走了，没看见躺在床上的卡耶塔诺。

“卢西菲尔① 真是狡猾。”他松了一口气，开玩笑说，“把我也变成了无形的了。”

西埃尔瓦·玛丽亚不得不变得更机警一点，免得那一天女看守再闯进房里来。欢闹了一整天后，到了深夜，双双觉得彼此早就相爱了。卡耶塔诺半真半假地大胆去解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紧身背心的带子。她用双手护着胸部，眼睛里闪着怒火，脸孔唰地一下红了。卡耶塔诺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她那双像火炭一般灼烧的手，把那双手从她的胸前拉开。她竭力反抗，他对她施加了一股虽然柔软但是坚决的力量。

“跟着我说，”他说，“我终于落入你的手中。”

她听从了。“所以，我知道我必死。”他接着说，同时用冰凉的手指解着她的背心。她几乎不出声地重复着，吓得发抖：“为了只在我身上证实，一把剑对一个顺从的人是多么短。”于是，他第一次吻了她的嘴。西埃尔瓦·玛丽亚的肉体在呻吟中颤抖着，

①卢西菲尔，即《圣经》中的魔王、撒旦。

她发出一阵轻微的气息，老老实实听凭命运支配。他用手指肚轻轻地抚摩她的肌肤，几乎碰不着她，第一次在女人肉体上体验到那种奇妙的感觉。一个内心的声音使他看到，当她怀着自由的爱的全部力量住在奴隶们的茅屋里时，他却为拉丁文和希腊文而失眠，为信仰而陶醉，生活在纯洁的孤独中，距离魔鬼是多么遥远。他任凭她带着走，在黑暗中探路，但是到最后一刻他后悔了，跌入了道德沦丧的深渊。他闭着眼仰面躺着。西埃尔瓦·玛丽亚被他那种死一般的沉默和平静的样子吓坏了，用一个手指碰了碰他。

“你怎么了？”她问他。

“现在别打扰我，”他低声说，“我在祈祷。”

在后来的几天里，他们在一起时只有短暂的平静时刻。不厌其烦地谈论爱情的痛苦，尽情地接吻，泪流满面地朗诵恋人们的诗歌、低声地唱歌，在欲望的泥泞中翻滚直到精疲力尽：虽然疲惫不堪，但是纯洁无瑕。因为他下定决心坚持对上帝许下的誓愿，直到接受圣体。她也跟他一样。

在激情奔放的间歇里，他们互相立着海誓山盟。他对她说，他可以为她做任何事情。她则像孩子一样无情地要求他为她吃一只蟑螂。不等她伸手阻拦，他已把蟑螂捉住，活活地吃下去。在另外几次昏头昏脑的挑战中，他问她是否敢为他把长辫子剪掉，她说当然敢，但她或开玩笑或认真地提醒他说，如果这么做，他就必须跟她结婚，以便履行许诺的条件。他带来一把切菜的尖刀，对她说：“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她转过身去，让她从根儿上把辫子剪下，并催他说：“大胆剪吧。”他却不敢了。几天后她问他，是否肯像小鹿一样让她砍头。他坚决地说，可以。她拿起刀子，准备试一试。他却吓一身冷汗，躲开了。“你不能，”他

说，“你不能试。”她笑得要死，问他为什么。他对她说了心里话：

“因为你确实敢这么做。”

在两个人热恋的平静日子里，他们也开始享受令人厌倦的普通爱情。她把房间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好让他像回家的丈夫那样感到舒适自然。卡耶塔诺教她读书、写字，对她进行关于诗歌和崇拜圣灵的启蒙教育，等待着获释和结婚的幸福日子到来。

在四月二十七日大清早，当西埃尔瓦·玛丽亚等卡耶塔诺走后开始入睡时，几个人突然闯进来，要带她去接受驱邪仪式。这是对一个判处死罪的人施行的礼仪。把她拖到饮水槽，用水桶给她冲洗，把项链给她扯下来，给她穿上异教徒的又肥又大的长衫。一个管理花园的修女用一把剪枝用的大剪子喀嚓几下齐后颈把她的长发剪下来，扔进了院子里燃起的大火里。管理发的修女接着把她的头发剪得只剩下半英寸长，就像修女们的头巾下留的短发一样。她一边剪一边把头发扔进火堆。西埃尔瓦·玛丽亚看到了金黄色的火苗，听见了处女的“木柴”的劈啪声，闻到了烧焦了牛角一般刺鼻的气味，她那铁石般的面孔上的肌肉却一丝不动。最后，给她穿上一件精神病人穿的拘束衣，头上给她蒙了一块送葬的黑布，两个奴隶用担架把她抬到了礼拜堂。

主教已经召集过由有名的受俸教士组成的教士会，教士们挑选了四个同事参加西埃尔瓦·玛丽亚的仪式。在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上，主教克制着身体上的痛苦。他决定，仪式不像过去举行纪念活动那样在大教堂举行，而在圣克拉拉修道院的礼拜堂举行，他亲自主持驱邪仪式。

以女院长为首的修女们从早祷前就站在唱经处了。她们为黎明的肃穆气氛所感染，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了赞美诗。随后，教

士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三个教团的首脑和宗教裁判所的达官贵人走进来。除了这些人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非宗教界的官员了。

主教最后一个到来：他穿着出席盛大仪式的礼服，由四个奴隶用担架抬着，脸上带着一副无可宽慰的痛苦表情。他坐在主祭坛前高大的大理石灵台旁一把便于他活动身子的转椅上。六点整，两个奴隶用担架把穿着拘束衣、头上仍然蒙着深紫色布的西埃尔瓦·玛丽亚抬进来。

唱弥撒时，厅堂里闷热得难以忍受。低沉的管风琴声在镶板式天花板下回荡，几乎让人听不见躲在唱经处格子后看不见的修女们那枯燥的声音。抬西埃尔瓦·玛丽亚的两个奴隶光着膀子守在她身旁。弥撒结束后，她被脱去了衣服，像个死去的公主一样被放在大理石灵台上。主教的奴隶把坐着转椅的主人抬到她旁边。让他们单独呆在主祭坛前的一块宽敞的地方。

接着是一种无形的紧张和绝对寂静的气氛，仿佛是某种美妙的奇迹发生的前奏。一名侍僧递给主教一只圣水掸洒器。他像抓住一只打仗的大木锤似的抓住圣水掸洒器，把身体倾向西埃尔瓦·玛丽亚，念念有词地在她身上洒圣水。他突然大喊起咒语来，震得礼拜堂的地板直颤。

“不管你在哪里，”他吼道，“按照耶稣、上帝和一切有形和无形、一切存在、曾经存在和将要存在的东西的主宰的命令，快离开这个通过洗礼获得拯救的肉体，回到黑暗中去吧。”

西埃尔瓦·玛丽亚恐惧得失去了理智，也大叫起来。主教提高了嗓门，让她安静，但是她叫得更凶了。主教深深地喘了气，再次张开嘴想继续喊咒语，但是他的气息窒息在胸腔里，释放不出来。他突然摔倒，趴在地上，像鱼一样频频地喘气。仪式

在一片惊叫声中告终。

那天夜里，卡耶塔诺遇见西埃尔瓦·玛丽亚穿着拘束衣，身上烧得直哆嗦。更加使他感到气愤的是被剃成光头的凌辱。“上帝啊！”他一面为她解着皮绳，一面怀着无声的怒火低声说，“你怎么能容忍这种罪行哪！”手脚一被放开，西埃尔瓦·玛丽亚便一下子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一边哭泣一边无言地彼此拥抱着。他让她痛痛快快地大哭。然后他托起她的脸孔对她说：“不要哭了。”他又想起了加尔西拉索的诗句：

“我为你哭得眼泪都流干了。”

西埃尔瓦·玛丽亚把礼拜堂里遭受的可怕经历对他讲了一遍。她对他讲述了唱经时的那种打仗似的隆隆声，主教那种迷惑人的叫喊声，他呼出的那股灼人的气息和他那双由于激动而显得不安的美丽的绿眼睛。

“他简直像魔鬼。’她说。

卡耶塔诺竭力让她平静。对她肯定说，主教虽然有巨人般的肥大身躯，有暴风雨般的声音，有军人的工作方式，但是仍然是个善良而博学的人。所以，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会有任何危险。

“我只想死。’她说。

“你感到愤怒和沮丧。由于不能帮助你，我的心情也是这样。但是在复活的那一天，上帝一定会酬谢我们的。”

她的项链被扯掉了，他把西埃尔瓦·玛丽亚送给他的奥杜亚项链摘下来，给她戴上。二人躺在床上，紧紧地挨在一起，分担着对方的怨恨。而这时，世界的灯火已经熄灭，只有白蚁还在镶板式天花板上忙忙碌碌。她的热度退了。卡耶塔诺在黑暗中讲话。

“《启示录》里预告，有一天将永远不会天亮。”他说：“但愿就是今天。”

卡耶塔诺走后，西埃尔瓦·玛丽亚大约睡了一个小时。这时一个新的声音把她惊醒。一位年迈的神甫在女院长的陪同下出现在她面前。此人身材高大，皮肤由于硝石的沾染而呈棕褐色，头上长着耸立的头发，眉毛像丛生的杂草，双手像野人的，一双眼睛诚实可信。不等西埃尔瓦·玛丽亚完全醒来，神甫就用约鲁瓦语对她说：

“我把你的项链带来了。”

就像修道院的女财产管理人按照她的要求把项链还给她那样，神甫把项链从口袋里掏出来。在把项链挂在西埃尔瓦·玛丽亚脖子上时，他用非洲语言数着，同时讲着它们的含义：红的和白的表示昌戈魔鬼的爱情和血，红的和黑的表示埃莱瓜魔鬼的生命和死亡，七颗水晶念珠和浅蓝色表示耶马亚魔鬼。他口齿灵巧，从约鲁瓦语到刚果语，从刚果语到曼丁加语，她聪明而流利地跟着他讲。如果说最后讲到西班牙语，仅仅是为了尊重女院长，她不相信西埃尔瓦·玛丽亚会那么温和。

他是托马斯·德·阿奎那·德·纳瓦雷斯神甫，前塞维利亚宗教裁判所检察官和奴隶居住区的教区神甫，被主教挑选来负责驱邪工作，因为主教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这个残暴的家伙的历史是无庸置疑的。他曾把十一个异教徒、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活活烧死，但是他的信誉主要是建立在无数个被他从安达卢西亚最狡猾的魔鬼那里夺回来的灵魂之上。他举止文雅，趣味高贵，讲话带着加那利群岛人的柔和语调。他在本地出生，父亲是国王的检查官，母亲是父亲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奴。他的家族四代白人血统一经证明是纯净的，他便在地方上的神学院攻读了新入教者的课

业。他的优良成绩使他在塞维利亚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那里生活和讲道，一直到他满五十岁。回到故乡后，他要求到最贫苦的教区工作，他酷爱宗教和非洲语言，其生活像奴隶中的另一种奴隶。他的良好修养似乎最适合同西埃尔瓦·玛丽亚沟通，更有把握对付她的魔鬼。

西埃尔瓦·玛丽亚立刻觉得他是拯救人的大天使。她没有看错。他当着她的面否定了言行录上的理由，向女院长说明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向她指出，美洲的魔鬼就是欧洲的那些魔鬼，只是它们的名称和行为不同罢了。他对她解释了用来识别魔鬼缠身的惯常用的办法，让她明白魔鬼使用它们来让人相信相反的事情是轻而易举的。和西埃尔瓦·玛丽亚告别时，他在她的脸蛋儿上亲热地捏了一把。

“放心地睡吧，”他对她说，“多么坏的敌人我都见过。”

女院长显得挺高兴，请他喝修女们做的有名的香气扑鼻的巧克力饮料，吃花生小饼干和留给受器重的人吃的美味甜食。在私人餐厅进餐时，他把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告诉了她。女院长对他的安排感到很满意。

“那个不幸的女孩情况是好是坏，我一点不感兴趣，”她说，“我只求上帝尽快地让她离开修道院。”

神甫向她保证说，他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几天内解决此事，但愿几个小时就能解决。两个人在探访室愉快地告别时，他们俩谁也没想到从此后他们再也不会见面。

果然如此。阿基诺神甫——他的教民这样称呼他——一直走到他的教堂，因为很久以来他很少祈祷，他每天都忍受着思乡的痛苦，只能在上帝面前求得安慰。他在门廊里逗留了一会儿，等待着日落，然后穿过码头的泥泞地区，卖各种东西的小贩的叫卖

声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买了一些最便宜的甜食和穷人才买的彩票，固执地幻想能够中奖，好修复他那破败的教堂。他在那里耽搁了半个钟头，和黑人主妇们交谈。她们像不朽的偶像一样生在那儿，面前铺在地上的黄麻席上摆着各种不值钱的手工艺品。大约五点钟，他过了赫塞马尼吊桥。就在吊桥前，人们刚刚把一只邪恶的肥狗尸体吊在那里，为的是让行人知道，它是患狂犬病死的。空中飘着五月初开放的玫瑰花的香味，天空是世界上最晴朗的。

临近海滨沼泽地的奴隶居住区贫困得直发抖。在房顶上铺着棕榈叶的粘土茅屋里，奴隶们和兀鹰、猪住在一起，孩子们喝街上的泥水。但是，那个地区有着最鲜亮的色彩和最响亮的声音，是最快乐的居民区；到了傍晚，人们把椅子拿到当街乘凉，更加充满生气。教区神甫把甜食分给沼泽地区的孩子们，留下三块自己晚上吃。

教堂是一座用泥巴苇子垒墙、苦棕榈叶铺顶的茅屋，屋脊上竖着一个木十字架。屋里有用坚硬的大木板做的长靠背椅，只有一座供着一尊神像的祭坛，一个木讲道台，教区神甫星期天用非洲的语言布道。神甫的住房是教堂从主祭坛后部延伸而成的。教区神甫以极差的条件住在那里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单薄的床和一把粗糙椅子。住所深处有一个多石头的小院子和一个结满一串串干枯的葡萄的葡萄架，还有一道把院子同沼泽地隔开的带刺的围墙。喝的水只有院子一个角落的灰泥雨水池。

一位年迈的教堂司事和一个十四岁的无父母的小女孩—— 两个皈依天主教的曼丁加人，是教堂和神甫家里的助手，但是念珠祈祷式结束后，就不需要他们做什么了。在关门前，教区神甫吃了剩下的那三块甜食，喝了一杯水。然后照例用他那句西班牙语

和坐在街上的邻居们告别：

“美好而神圣的夜晚,上帝保佑大家。”

早晨四点钟，住在离教堂一个街区远的教堂司事敲响了召唤全天唯一的一次弥撒的第一遍钟声。五点前，他看到神甫迟迟不到，便到他的房间去找他。神甫不在房里，在院子里也没有找到他。接着又到附近的地方去找，因为他有时很早就去邻近的院子里找人交谈。但没有找到。于是他通知前来听弥撒的少数教民，弥撒取消了，因为没有找到教区神甫。八点钟，太阳已经灼人，当佣人的小女孩去雨水池打水，发现阿基诺神甫穿着睡觉也不脱的袜子仰面漂在水里。他那副样子十分悲惨和令人痛心，他的死是一个永远查不清的奥秘。女院长声称这是魔鬼仇视她的修道院的铁证。

这个不幸消息没有及时传到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间，她还在怀着天真的幻想等待着阿基诺神甫。她无法向卡耶塔诺解释他是谁，但是她告诉他说，她对神甫把项链还给他和保证拯救她而表示的谢意。他俩一直感到，只要彼此相爱，他们就能成为幸福的人。西埃尔瓦·玛丽亚正是在阿奎那神甫的开导下醒悟到，自由只能靠他们自己。一个清晨，久久地亲吻了几个小时后，她恳求卡耶塔诺不要走。他认为这太轻率，便又吻了她一下要走。她跳下床，伸开双臂站在门口。

“你不能走，你走，我也走。”

有一次她对卡耶塔诺说过，她很愿意跟他一起逃到圣巴西利奥·德·帕伦克去。那是一个逃跑的奴隶聚居的村庄，离这儿十二

里①，他们肯定会把她当女王接待的。卡耶塔诺认为这是个美妙的主意，但是他不愿意把她同逃走联在一起。他更相信合法的方式，相信只要不容置疑地证明她未被魔鬼缠身，侯爵就能重新得到他的女儿；相信能得到他的主教的宽恕和允许，去加入一个世俗的团体，在那里，教士或修女的婚礼司空见惯，谁也不感到大惊小怪。所以，当西埃尔瓦·玛丽亚把他置于留下来还是带她一起走的十字路口时，卡耶塔诺便想再一次劝她不要那么想。她勾住他的脖子，大叫大喊地威胁他。天开始亮了。卡耶塔诺心里发慌，猛地把她推开，逃走了。这时响起了早祷的钟声。

西埃尔瓦·玛丽亚的反应十分凶狠。稍有不满，她就抓女看守的脸，把自己反闩在房间里，威吓说，如果不让她走，她就放火烧房子，把自己烧成灰。女看守脸上流了血，恼羞成怒，发疯地冲她喊道：

“有胆量，你就烧吧，贝尔塞布② 般的畜生！”

西埃尔瓦·玛丽亚二话没说，端过那盏圣灯把床垫子点着了。马丁娜赶来，用她那种温和的方式避免了一场悲剧。不管怎样，女看守在那天的报告中还是要求把小女孩换到牢房楼内一个防护得更牢固的房间去。

西埃尔瓦·玛丽亚的焦急心情催迫着卡耶塔诺，使他也焦急万分，非要立刻找到一个不同于逃走的办法不可。他两次想见到侯爵，两次都被大猎犬拒之门外。他看见大猎犬都被放出了笼子，在主人不在的家中，它们成了主人。事实上，侯爵已不再住在那里。无穷的恐惧已把他打垮，他曾打算躲到杜尔塞·奥利维

① 里，西班牙里程单位，合5572.7米。

② 贝尔塞布，《圣经》上的魔鬼，罪恶的灵魂的首领。

娅那里去，但是她也把他拒之门外。自打他陷入孤独后，他曾千方百计叫她来，他得到的只是在小纸鸟上写的嘲弄的回信。但是，既未叫她，也未收到通知，她却突然来了。她打扫和修理了由于不用而无法用的厨房，锅里的食物在旺盛的炉火上哗哗翻滚。她穿着带棉布荷叶边的假日礼服，用时髦的首饰和香脂化妆得光彩照人。她身上唯一显得疯疯癫癫的地方是那顶飘动着用破布做的鱼和鸟的宽沿帽。

“你来这儿，我非常感谢。”侯爵对她说，“我太孤单了。”最后叹了口气说：

“我失去了西埃尔瓦。”

“都怪你。”她毫不在乎地说，“你变着法儿地把她赶走。”

晚饭是照本地人的方法炒的辣子肉丁，三块肉和大菜园里最精美的蔬菜。杜尔塞·奥利维娅以家庭主妇的态度侍奉他，她那身衣服也很相称。那几条凶猛的猎狗喘着气跟着她，在她的腿间钻来钻去，她像新娘一样悄声细语地哄着它们。她面对侯爵坐在桌边，就像他们年轻的时候那样相对而坐，不惧怕爱情。二人默默地吃着，谁也不看谁，脸上淌着汗，像老夫妻那样毫无兴致地喝着汤。吃完第一盘菜后，杜尔塞·奥利维娅喘了口气，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我们本来应该这样生活。”她说。

侯爵受到她的爽快的言语的感染。他看到她又胖又老，嘴里缺了两颗牙，眼睛也枯萎无神了。倘若他有勇气反对他父亲的话，他们也许能够像现在这样。

“你理智正常的时候认为该这样。”他对她说。

“我的理智一直是正常的。”她说，“是你从来也不把我看作正常人。”

“那时在许多都很年轻、漂亮的女人中，我只是觉得你与众不同，要判断哪个最好，是困难的。”他说。

“我为你选择了自己。”她说，“你却不。你总是像现在这样：一个老实懦弱的人。”

“你在我自己的家里骂我。”他说。

争吵迫在眉睫，杜尔塞·奥利维娅来劲儿了。“这个家是你的也是我的。”她说，“小女孩也是我的，虽说是一只母狗生的她。”不等对方反驳，她又说：

“最不幸的是你把她交给了坏人。”

“交给了上帝。”他说。

杜尔塞·奥利维娅愤怒地叫道：

“你把她交给了主教的儿子，他把她当成了娼妓，把她的肚子弄大了。”

“胡说八道会遭恶报！”侯爵愤怒地吼道。

“莎贡塔加油加醋,可没说谎。”杜尔塞·奥利维娅说，“你休想羞辱我，等你死的时候就只有我给你脸上搽粉了。”

他们的争吵总是这样结束。他们的眼泪像滴下的菜汤一样落在盘子里。几条狗已经睡着了，但是激烈的争吵把它们惊醒，它们警惕地抬起头，喉咙里哼了一阵。侯爵感到透不过气来。

“你看，”他激愤地说，“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

她没吃完饭就站起来，收拾餐具，撤桌子，气鼓鼓地洗盘子刷锅，一边洗一边往洗碗池里摔。他让她在一边哭，直到他把打碎的餐具像冰雹一样倒进垃圾箱为止。她没有告别就走了。侯爵始终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杜尔塞·奥利维娅是何时变成另一个人的。没有改变的只是，她仍然是夜间出没于侯爵家的一个幽灵。

关于卡耶塔诺·德劳拉是主教的儿子的流言取代了从萨拉曼

卡起就说他们是同性恋情夫的由来已久的蜚语。经过莎贡塔证实和歪曲的杜尔塞·奥利维娅的说法，确实是说，西埃尔瓦·玛丽亚被绑架进了修道院，为的是满足卡耶塔诺·德劳拉的残暴的欲望，说她怀过一个双头胎儿。莎贡塔说，他们的纵情狂乐传染给了修道院的所有修女。

侯爵再也振作不起来。他在记忆的沼泽里挖掘，寻找抗拒恐惧的庇护所，只找到对贝尔纳达的回忆。对她的回忆，由于他的孤独处境而格外令其注目。他想用她那些最可恨的事情、她常放的大臭屁、她那种粗暴的回答方式和她那公鸡的屁股来打消对她的回忆。但是他越是想贬低她，回忆就越是美化她。他思念得心力交瘁，便向马哈特斯压榨场给她写信试探。自她走后他就猜想她住在那里。她确实住在那里。他写信申述理由，希望她忘记怨恨回家来，这样双双至少死有人伴了。由于收不到回信，他便去找她。

他必须沿着记忆的支流而上。曾经是总督领地最好的牧场如今已无影无踪。道路被淹没在杂草丛中，已难以分辨。榨糖作坊只剩下一堆瓦砾，机器被铁锈腐蚀坏了，最后两头牛的骨架仍然套在压榨机的连杆上。加拉巴木阴影里的如泣如诉的泉水是唯一算是生命的东西。在看见坐落在某蔗园里干枯的荆棘丛中的贝尔纳达的房子前，侯爵就闻到了她的香皂的香味，这香味早已变成了她本身的气味。这时他感到他是多么急切地想见到她。此刻她正坐在檐廊下的栏杆旁一把摇椅上，嚼着可可豆，眼睛凝视着地平线。她穿一条玫瑰色的棉布裙，刚刚在如泣如诉的泉水里洗过澡，头发还未干。

侯爵在登上门廊前的三级台阶前问候她说：“下午好。”贝尔纳达回答了他的问候，但是没有看他，好像只有问候声而没有人

似的。侯爵登上台阶，站在栏杆旁从草木丛上面环视整个地平线。他的视线所及，只有荒芜的山丘和泉水边的加拉巴木。“人都干什么去了？”他问。贝尔纳达像她父亲那样回答，还是没看他“都走了。”她说，“方圆一百里没有一个活物。”

他进屋去找凳子。房子已破败不堪，地板的砖缝里冒出来一些开着小紫花的小树棵；餐室里的古桌边仍然放着被白蚁啃食的椅子；钟表的表针天晓得停在了哪个时刻；一切都笼罩在飘着无形的、呼吸时可以感觉到的尘埃的空气中。侯爵搬来一把椅子，坐在贝尔纳达旁边，用很低的声音对她说：

“我是来找你的。”

贝尔纳达不动声色，但是几乎察觉不到地点了点头。他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她：冷冷清清的家，拿着磨快的刀子躲在灌木丛后的奴隶，没有尽头的黑夜。

“那不是人过的生活。”他说。

“从来也不是。”她说。

“也许会改变。”他说。

“你要是知道我有多恨你，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她说。

“我也一直相信我憎恨你。”他说，“现在我的心情是，我说不准是不是还恨你。”

贝尔纳达于是对他敞开了肺腑，让他看到了明亮的天光。她告诉他，她父亲如何以送大西洋鲱和泡菜作为借口派她去，他们如何以看手相的老把戏欺骗她，他们如何商量好让她在他装糊涂时强奸他，他们如何策划冷酷而准确的诡计生了西埃尔瓦·玛丽亚，以便一生缠住他。他唯一应该感谢她的地方是，她没有勇气去干她和父亲商定的最后一件事：在汤里哗哗地倒片酊，免得再忍受他。

“是我自己把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她说，“不过，我不后悔。此外，硬要我爱那个不幸的体弱多病的小女孩，或者爱你——我的不幸的根源，这种希望是过分的。”

尽管如此，她堕落的最后一个台阶是失去了胡达斯·伊斯卡里奥特。她到其他人那里去找他，便陷入了和奴隶们的没有节制的通奸。在第一次冒这种险之前，这是她最恶心的事情。她成群结队地挑选了许多奴隶，让他们在香蕉园地界上排成长队，直到发酵的蜂蜜和巧克力糖块毁了她的魅力，把她变得浮肿、难看，她的精神是经不住那么多男人折磨的。于是她开始付他们钱。最初按照英俊程度和阳物大小付钱给最年轻的；最后把纯金币付给能够和她干的人。很晚她才发现，他们大批地逃往圣巴西利奥·德·帕伦克，为的是摆脱那个永不满足的饿女人。

“当时我知道，我敢用砍刀把他们砍死。”她说，眼里一点泪水也没有。“不但敢杀他们，也敢杀死你和女儿、我父亲的赌场抽头人和所有玷污我的生命的人。但是，我已不是能够杀死任何人的英雄好汉了。”

他们望着崎岖的地带，陷入了沉默。地平线上传来一群远方的牲口的奔跑声，一个无法抚慰的女人的声音按照牲口的名字一个个地呼唤它们，直到夜幕降临。侯爵叹了口气：

“看来，我没有必要感谢你了。”

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椅子送回原来的地方，顺着原路走了。他没有道别也没有拿照亮用的灯具。

那一天，马丁娜·拉博德做了刺绣活儿。她用了一个上午才完成了一件拖下来的刺绣。她在西埃尔瓦·玛丽亚的房间里吃了午饭，然后回她的房间睡午觉。下午，剩下最后的几针时，她怀

着少见的痛苦心情对她说话。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个牢狱，或者如果我先离开这儿，请你永远记住我。”她对她说，“这一定是我唯一的光荣。”

西埃尔瓦·玛丽亚直到第二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早晨，女看守把她叫醒，因为马丁娜不在她的房里。人们找遍了整个修道院，连她的踪迹也没有。关于她的消息就只有西埃尔瓦·玛丽亚在枕头底下找到的一张用她的花体字写的纸条。写的是：我每天祈祷三次，祝愿你们无比幸福。

当女院长和副院长、军队的可敬的长官和一个背着火枪的巡逻队走进来时，她仍然处在对意外的事件茫然不知的状态中。女院长狂怒地伸出一只手推了她一把，对她叫道：

“你是她的同伙,必须受处罚。”

西埃尔瓦·玛丽亚坚决地抬起手一挥，让女院长停在了原地。

“我看见他们走了。”她说。

女院长大吃一惊。

“不是她一个人？”

“一共六个。”西埃尔瓦·玛丽亚说。

发生这样的事似乎不可能；更不可能的是他们是从露台上逃走的，逃走的唯一路线是加固的院子。“他们有蝙蝠的翅膀。”西埃尔瓦·玛丽亚像飞一样挥动着手臂说。“他们在露台上展开翅膀，带着她飞啊飞啊，飞远了，一直飞到大海的另一边。”巡逻队队长恐惧地划了个十字，跪下了。

“圣洁的马利亚啊！”他说。

“你的受孕清白无辜没有原罪。”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如此人不知鬼不觉的越狱包括最小的细节都是由马丁娜在发现卡耶塔诺在修道院过夜后极为秘密地安排的。考虑不周的，

者说她没有注意的是，应该把下水道的小门从里头关好，免得引起什么怀疑。越狱调查人员发现水道的门开着，仔细一查，发现了真相，立刻从两端把下水道堵死了。西埃尔瓦·玛丽亚被强行搬到活埋楼的一间加锁的牢房里。那天夜里，在明亮的月光下，为了打通下水道入口，卡耶塔诺把拳头都砸烂了。

在一股疯狂的力量驱使下，他飞也似的跑去找侯爵。他顾不得敲门，把门一推便进了侯爵的冷冷清清的家。里头的光线和外头的一样，因为石灰墙仿佛被月光穿透了。到处干干净净，家具井然有序，花坛里种着花儿，无人管理的家里一切都无可挑剔。门的吱嘎声惊动了大猎犬。但是杜尔塞·奥利维娅严厉地命令它们别叫。卡耶塔诺看见她在院子里的绿色阴影里，穿着侯爵夫人的肥大的长衫，头发上插着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鲜艳的山茶花，全身鳞光闪烁，非常美丽。他用食指和大拇指搭了个十字举起来。

“以上帝的名义，请问你是谁？”他说。

“一个鬼魂。”她说，“那你呢？”

“我是卡耶塔诺·德劳拉。”他说，“我来这儿想跪着恳求侯爵听我说几句话。”

杜尔塞·奥利维娅的眼里闪着怒火。

“侯爵先生没有必要听一个无赖说任何话。”她说。

“你是谁竟敢用这种口气讲话？”

“我是这个家的女王。”她说。

“看在上帝面上，”卡耶塔诺说，“请去通报侯爵，我要跟他谈他女儿的事。”接着把手放在胸前，又直截了当地说：

“我非常爱她。”

“你再说一句话，我就把大狼狗放出来。”杜尔塞·奥利维娅气愤地说。随后又指着门口：

“快滚！”

她的命令非常可怕，吓得卡耶塔诺一边紧紧地盯着她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大门外。

星期二，阿夫雷农西奥走进他的诊所时，看见卡耶塔诺·德劳拉由于彻夜不眠而憔悴不堪的样子。从受惩罚的真实原因到牢房里度过的相爱之夜，卡耶塔诺对他讲述了一切。阿夫雷农西奥听了不胜困惑。

“你干的任何事情我都想象到了，可万万想不到你会做出如此疯癫透顶的事来。”

卡耶塔诺却吃惊地问他：

“你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从没有，我的孩子。”阿夫雷农西奥说，“男女间的事是一种才能，我没有。”

阿夫雷农西奥想劝导他，就对他说，爱情是一种对抗天性的感情，它注定使两个陌生的人陷入一种小气的和有损于健康的依赖关系，时间越短，情绪就越激动。但是卡耶塔诺听不进去。他着魔的是尽可能远地逃离基督教世界的压迫。

“只有侯爵能够借助法律帮助我们。”他说，“我想跪在他面前祈求他，但是我没有在他家找到他。”

“你永远也找不到他。“阿夫雷农西奥说，“听到的说法是，你想强奸他的女儿。现在我认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他不无道理。”他望着他的眼睛说：

“你不怕受惩罚吗？”

“我想，我正在受处罚。不过，不是受圣灵的惩罚。”卡耶塔诺说，毫不惊慌。“我一向认为，和信仰相比，他更重视爱情。”

阿夫雷农西奥掩饰不住对这个刚刚摆脱了理性束缚的人的钦

佩心情。但是他没有对他做虚假的许诺。更何况有宗教裁判所居间调停。

“你们信仰的是一种死神教，这种宗教可以为你们增添面对死亡的勇气和运气。”他对他说，“我却不然：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活着。”

卡耶塔诺向修道院跑去。大白天他从修道院后门走进去，大摇大摆地穿过花园，确信凭着祈祷的力量不会被发现。他爬上二层楼，穿过一条顶子很低的、连接修道院两部分的孤寂的走廊，来到了囚禁女人的寂静而古怪的世界。但是他不知道，他从西埃尔瓦·玛丽亚新换的房间门口走过时她还在为他哭泣。他快走到监狱楼时，背后有人大喊一声，拦住了他：

“站住！”

他转过身去，看见一个蒙着面纱的修女和一个对他高高举着的耶稣受难像。他向前走了一步，但是修女用耶稣像挡住了他。

“回去！”她冲他吼道。

背后又传来一个声音：“回去！”然后又传来第三个、第四个声音：“回去！”他原地转了几圈，发现被一群蒙着脸的幽灵似的修女围在中间，她们举着十字架冲他大喊大叫：

“回去，撒旦！”

卡耶塔诺已经精疲力竭。他被送交宗教裁判所，在广场的审判大会上被判徒刑。审判员们认为他是异端，这在公众中造成混乱，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论。由于一次特赦，他改在“上帝之爱”医院里服刑：当护士。他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和病人住在一起，和他们一块在地上吃饭、睡觉，在病人的木盆里洗脸，虽然用的是脏水，但是没有染上他说过准备染上的麻疯病。

西埃尔瓦·玛丽亚徒劳地等待着他。三天后，在一次反抗怒

火的爆发中绝食，这使她的中邪的征兆加强了。卡耶塔诺的下场、阿奎那神甫的莫名其妙的死亡和公众对一桩不受他的智慧和权力支配的不幸事件的强烈反响弄得惶惶不安的主教，不顾其健康状况和年纪，以难以想象的精力重新承担起了驱邪的责任。已被剃光了头发、穿上约束衣的西埃尔瓦·玛丽亚，这一次像撒旦一样气势汹汹地面对他，时而用语言对他讲话，时而用极讨厌的鸟儿的鸣叫声对他说话。第二天他听到一种发怒的牲畜发出的巨大的吼叫声。大地震颤起来。让人不能不认为西埃尔瓦·玛丽亚受着地狱的一切魔鬼的指使。回到房间后，她被迫接受了圣水灌肠的治疗。这是清除她的肠胃中可能存留的魔鬼的法国办法。

对她进行的这种迫害又继续了三天。尽管一个星期没吃东西，西埃尔瓦·玛丽亚仍然能够抽出一条腿，冲着主教的小肚子踹了一脚，把他打倒在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她之所以能够挣脱掉绳索，是因为她的身体枯瘦如柴，皮绳儿已经捆不牢她了。公众对此事不满，要求停止驱邪，教士会也这样认为。但是主教却表示反对。

西埃尔瓦·玛丽亚始终不明白，卡耶塔诺·德劳拉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不提着装满从市场买来的精美食品回来和她共度永不厌足的夜晚。五月二十九日，她再也没有气力做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她又梦见雪原上的那扇窗户，但卡耶塔诺·德劳拉不在那里，也永远不会再去那里了。她的腿上放着一串金黄色的葡萄，葡萄随吃随长。但是这一次她不是一颗一颗地吃，而是两颗两颗地吃，为了超过葡萄串的生长速度吃到最后一颗，她几乎来不及喘气。女看守进来为她做第六次驱邪的准备，却发现她已为爱情死去，眼睛闪着光亮，皮肤像刚生下来一样。头发根儿像气泡一样在光秃的脑壳上突突地冒，眼看着往上长。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朱景冬译



一

上校打开咖啡筒盖儿，发现里面果然只有一小勺了。他从火上取下铝锅，把里面的水倒掉一半在地上，然后用刀子在咖啡筒里刮了刮，把咖啡末儿刮干净，连铁锈一起倒进锅里，方才罢手。

上校坐在陶制的火炉旁，摆出一副自信而纯朴的期待神情，等候着咖啡烧开；这时他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肠道里正滋生出毒蘑和野百合。时值十月天气，这样的早晨实难预卜，即使像他这样一个经历过无论多少晨光的人，也是如此。五十六年来——从最后一次内战结束算起——上校除去等待而无所作为。十月的到来只是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

他妻子见他端着咖啡走进卧室，便撩起蚊帐。这一夜她喘得特别厉害，现正昏昏欲睡。不过，她还是坐起来，接过了咖啡。

“你呢？”她问。

“我喝过了。”上校哄她说，“筒儿里还有一大勺呢。”

这工夫，钟声响了。上校已经把出殡的事忘在脑后。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把吊床的一端摘下，随即卷起来，挂到门后的另一端去。他妻子想起了死者。

“他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她说，“恰好在咱们的儿子出生后一个月，是四月七日。”

在困难的呼吸间歇里，她继续啜饮着咖啡。这个女人的体形

几乎只由两排软肋和一条僵硬的弓形脊柱组成。由于呼吸道紊乱，她常常只好自问自答。直到喝完咖啡，她还在想着死者。

“十月里下葬一定很可怕。”她说。她的男人并没有理睬她的话。他打开窗子。十月的天气早已光临他家的庭院。望着眼前骤然变得碧绿的草木和泥土里的蚯蚓开掘的小巧迷宫，上校又一次感到这个倒霉的月份对肠胃的影响。

“我觉得身上的骨头有一股子寒气。”他说。

“那是冬天冻的。”女人回答说，“自打下雨以来我就嘱咐你，一定要穿着长袜睡觉。”

“一个星期来,我一直穿着长袜睡的。”

雨下得小了，可是没停。上校真想裹着毛毯重新躺到吊床上去。但是固执的钟声使他想起了葬礼。“这是十月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接着向房间中央走去。这时他才记起拴在床腿上的公鸡。那是一只斗鸡。

上校把杯子送回厨房，把客厅里那只装在一个雕花木匣里的挂钟上了发条。客厅跟卧室不同：对一个哮喘病患者的呼吸来说，卧室过分狭窄了，客厅却很宽敞。这里有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桌上摆着一个石膏小猫，周围摆着四把结实的摇椅。钟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有一个蒙薄纱的女子坐在一条装满玫瑰花的船上，一群崇拜者围在她身边。

他上完发条的时候是七点二十分。他把公鸡抱进厨房，拴在一条炉腿上，然后把筒里的水换掉，又在旁边撒了一把玉米。一群孩子从篱笆的窟窿里钻进来，坐在公鸡的周围，默默地注视着它。

“别再瞧它了。”上校说，“瞅的时间太长,公鸡就疲塌了。”

孩子们一动不动。其中一个孩子掏出口琴吹起一支流行的曲

子。“今天你别吹，”上校对他说，“镇上有人死了。”那孩子把口琴放回长裤兜里。上校回房去穿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

由于妻子患哮喘，他那件白衣服还没有熨。上校只好决定穿那件黑色的旧呢子上衣了。这件上衣，自他结婚后只在特殊场合才穿。他费了很大劲儿才在箱底里找到。衣服包在报纸里，里面放了防蛀的樟脑球。这时他妻子躺在床上，仍在想着死者。

“这会儿他一定见到阿古斯丁了。”她说，“但愿他别把阿古斯丁死后我们的处境告诉他。”

“这个时刻他们可能在争论公鸡的好坏呢。”上校说。

上校在箱子里找到一柄很大的老式雨伞。这伞是他妻子在一次为上校的政党筹措资金的政治性抽彩活动中赢得的。就在那个夜晚，他们观看了一次在露天举行的、下雨也没有中断的表演。上校、他妻子和他儿子阿古斯丁——当时只有八岁——坐在这把雨伞下，一直看到表演结束。如今阿古斯丁已经升天，光亮的绸缎伞面也被蛀坏了。

“你瞧瞧我们这把雨伞，已经成了马戏团里小丑用的东西了。”上校常爱说这句老话。他撑开雨伞，一圈儿怪里怪气的金属伞骨儿出现在头上。“现在它只能用来数天上的星星了。”

他微微一笑。但是他妻子对那把雨伞却不屑一顾。“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她喃喃地说，“我们自己也在活活地烂掉。”说完便合上眼，更加聚精会神地思念那个死者去了。

上校用手摸着刮完的脸——因为好久以来他就没有镜子了——便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裤子像长内裤似的紧裹在腿上，裤管下端用活结扎在踝骨处，腰部则用两根同样呢料的带子穿过两个扣眼系在腰上。他不使用皮带。旧纸板颜色的衬衫，硬得像纸板，颈部扣着一只铜纽扣。这只纽扣同时用来支撑假领。但是假

领已经断裂，所以上校没系领带。

他的每个举动，都好似一桩重大事件。他双手的骨骼被一层紧绷绷的亮皮肤所包裹，上面长着一些与颈部相同的微红色的斑块。在套上漆黑的短统靴之前，他刮了刮嵌进靴缝里的泥土。这时他妻子看见他穿戴得就像他们结婚的那天一样，方才发现她男人已经老得多么厉害。

“你像对待一件什么大事儿似的。”他妻子说。

“这次葬礼就是一件大事嘛。”上校说，“他是我们这儿多年来头一个寿终正寝的人。”

九点后雨住了。上校正想出门，他妻子扯住了他的衣袖。

“梳梳头再走。”她说。

上校用一把角质梳子梳着头，想把铁青色的硬头发梳拢服贴，但是无济于事。

“我准像个鹦鹉。”他说。

妻子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不，上校不像鹦鹉。他是个干瘦的人，全身的骨骼十分结实，仿佛是用螺栓和螺母连结在一起的。但是，从他眼神里的那股活力来看，他不像是用福尔马林溶液保存过的。

“这样就好了。”她赞许地说。她男人就要离开房间时，她又添了一句：

“问问医生，咱们家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他们住在镇子头上一座棕榈叶屋顶、石灰墙皮已经剥落的房子里。天气依然是潮湿的，但是不下雨了。上校沿着一条房舍密集的陋巷向镇子的广场走去。走到中心街口，他不禁大吃一惊。在他的视线所及的地方，镇子到处装饰着花朵，身穿黑衣服的妇女们正坐在门前等待着葬礼。

到了广场后，天上又飘起细雨来。弹子房老板从房门口看见了上校，便张开双臂喊道：

“上校，等一等，我给你一把雨伞。”

上校并不回头，只是答道：

“谢谢，我这样走很好。”

送葬的队伍还没有出发。男人们—— 身穿白衣、颈系黑领带—— 撑着雨伞，站在门口交谈。有个人看见上校在广场上跳越着水洼儿往前走。

“老伙计，到这儿来避雨！”那人喊道。

他在伞下让出一块地方。

“谢谢，伙计。”上校说。

但是他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径直走进死者的家里，向死者的母亲表示慰问。他的头一个感觉是闻到了各种各样鲜花的气味。然后才觉得闷热。上校试图在起居室的拥挤的人群中间打开一条路，但是有人把手搭在他背上，推着他在神色惶惑的人群中向房间深处走去，直走到死者的鼻孔—— 又深又大—— 所在的地方。

死者的母亲站在那儿，正用一把棕榈扇子赶着棺木上的苍蝇。一些穿黑衣服的女人带着观望小河流水般的表情凝视着尸体。突然，房间的深处响起一个声音。上校把一位妇女推到一边，走到了死者的母亲的身旁，他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一面用力咬紧牙关。

“向您表示深切慰问。”他说。

她没有回头，只是张开嘴巴，发出一声尖叫。上校吓了一跳。他觉得自己被从一声惊叫中爆发出来的怪物推向尸体。他想找个扶手的地方，但是没有摸着墙壁。代替墙壁的是些人体。有人在他的耳边用十分柔和的声音慢慢地说：“当心，上校。”他一

扭头，看到了死者。但是他没有认出来，因为尸体又僵硬又结实，身上裹着白布，手中握着短号，表情好像跟他一样惊惶不安。当他不顾人们的嘈杂声抬起头来喘口气的时候，看见盖着的棺木沿着一条摆着花朵的坡路向门口滚去。花儿飞到墙上撞得粉碎。他出了一声冷汗，骨节疼痛。片刻后，他发现自己站在路上，因为细小的雨点在敲打着他的眼皮。有人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

“走快点，干亲家，我一直在等你。”

说话的是他的亡儿的教父、唯一躲开政治迫害仍然住在镇上、他的党的领导人，名叫堂萨瓦斯。“谢谢，干亲家。”上校说罢，默默地在雨伞下往前走。这时，乐队奏起了哀乐。上校听出乐队里缺少一支铜号，这时他才第一次确信死者真的死去了。

“可怜的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堂萨瓦斯喉咙沙哑。他用左手举着雨伞，伞把几乎举到了齐头的高度，因为他的个子比上校矮。送葬的队伍离开广场以后，男人们开始交谈起来。堂萨瓦斯于是将他悲戚的面孔转向上校说：

“干亲家，那只公鸡怎么样了？”

“公鸡在家里养着。”上校回答。

这当儿传来一个人高声说话的声音。

“你们把死人送到哪儿去呀？”

上校抬起头来，看见镇长站在警察局阳台上，脸上带着沉思的神情。他穿着内裤和内衣，腮帮子鼓鼓的，没有刮脸。乐队的哀乐中断了。过了一会儿，上校听出来是安赫尔神父在同镇长高声交谈。透过雨水落在伞面上发出的噼啪声，他猜测出他们谈话的内容。

“ 怎么回事 ?”堂萨瓦斯问。

“ 没什么。 ” 上校回答，“ 送葬的队伍不能从警察局门前通过。”

“ 我忘记了， ” 堂萨瓦斯叫道，“ 我老是忘记我们是处在戒严时期。”

“ 可这并不是什么叛乱呀。 ” 上校说，“ 是个可怜的乐师死了。”

送葬的队伍改变了方向。在贫民区里，妇女们默默地咬着手指，望着送葬的队伍走过。但是后来她们拥向街心，发出一阵赞扬、感谢和告别的喊声，好像她们相信死者在棺木里听得见她们的声音。到了墓地后，上校觉得心里很难受，堂萨瓦斯把他推往墙边，好给抬死者的人们让路的时候，他微笑着望望上校，但是遇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

“ 你怎么啦,干亲家 ?”他问。

上校叹了口气。

“ 是十月的天气闹的,干亲家。”

他们顺着原来那条街往回走。雨已经停了。蔚蓝色的天空显得很高远。“ 雨不会再下了。 ” 上校想。他觉得好一些了，但是仍然思绪沉沉。堂萨瓦斯打断他说：

“ 干亲家,你去请医生看看吧。”

“ 我不是病了， ” 上校说，“ 是因为一到十月份我就觉得肚子里好像有动物在折腾似的。 ”

“ 噢。 ” 堂萨瓦斯应道。走到他家门口，他们就分手了。那是一幢二层的新楼房，窗口安着铁栏。上校向自己家走去，因为要脱掉礼服而感到惆怅。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家门，到街角的商店买了一筒咖啡和半磅喂公鸡的玉米。

二

星期四，上校仍然起来照看公鸡，尽管这天他更想躺在吊床上。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一周来，他的五脏六腑简直要破裂了。好几夜他不能入睡，忍受着患哮喘病的妻子的肺脏发出的呼吸声。但是在这个十月里，总算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安排了一个放晴的时间。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成衣店的裁缝伙计（以前他也干过）和斗鸡场上的狂热观众——趁着这个机会来检查公鸡了。它完全符合规定。

当家里只剩下他和妻子的时候，上校回到了房里。他妻子已经察觉到外面的动静。

“他们说什么？”她问。

“他们的热情很高。”上校回答，“都在攒钱为公鸡做赌注。”

“这只公鸡这么难看，我不知道他们能有什么盼头。”女人问，“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缺点：跟腿比起来，它的头太小了。”

“他们说这是镇上最好的一只。”上校回答说，“能值五十比索。”

他确信，这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保留公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只公鸡是他儿子的遗物。他儿子为了散发秘密传单，九个月以前在斗鸡场上被打死了。“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幻想。”女人说。“玉米吃光了的时候，就是拿自己的心肝我们也得喂它。”上校一面在衣柜里寻找斜纹布长裤，一面不停地思索着。

“没有几个月了。”他说，“据可靠的消息说，一月份将有斗鸡活动。然后我们可以用更好的价钱卖掉它。”

裤子还没有熨。女人把裤子铺在炉台上，用两个在炭火上烧

热的铁熨斗熨了熨。

“急着出门去干什么？”她问。

“到邮局去。”

“我忘记今天是星期五了。”她回房间的时候说。上校穿好了衣服，但是没穿长裤。他妻子看了看他的鞋子。

“这双鞋穿不得了。”她说，“还是穿那双黑皮鞋吧。”

上校心里闷闷不乐。

“好像是一双被人抛弃的鞋。”他抗议说，“我每次穿上它，就觉得像是从收容所逃出来的。”

“我们是被我们的儿子抛弃的人。”女人说。

这一次她又把他说服了。在船只鸣笛之前，上校向港口走去。他穿着黑皮鞋、不系皮带的白裤子和没有假领、颈部扣着铜纽扣的衬衣，从叙利亚人莫伊塞斯的商店门前观望着船只的活动。旅客们用不变的姿势坐了八个小时之后，疲惫不堪地走下船来。还是往常那样的旅客：流动商贩和上星期出门旅行照例归来的村镇居民。

最后一只是邮船。上校忧虑不安地望着它停泊在岸边。他发现邮袋放在船顶上，船顶固定在蒸汽管上，上面盖着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他的感觉变得敏锐了，公鸡使他的欲望变得强烈了。自打邮局管理员登上邮船，解下邮袋，背到肩上的那一刻儿起，上校就盯着他。

上校沿着跟码头平行的街道尾随着他。这条街是一座展览着五颜六色的商品的店铺的迷宫。每次这样做的时候上校总怀着一种迥然不同的、好似恐惧一般的急迫感。医生正在邮局的办公室里等待报纸。

“我妻子要我问问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这是一位留着满头漆黑的鬈发的年轻医生。他那一口牙齿整齐得出奇，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对患哮喘病的上校妻子的健康很关心，上校详细讲述了病人的情况，同时继续留心着向分拣信箱里分放信件的管理员的动作。管理员那种懒洋洋的工作态度，上校感到很气愤。

医生收到了信件和一捆报纸。他把科技宣传简报放在一边。然后马马虎虎地看了个人的信。与此同时，管理员分发了在场的收信人的信件。上校望着标着字母、属于他的那个信箱。一封带蓝边儿的航空信使他的神经变得更紧张了。

医生撕下报纸的封条，看了报纸上的大标题，上校——他一直盯着他的信箱—— 则等待着管理员停在那信箱前。但是他没有在那里停。医生中断了看报，望了望上校，然后望了望坐在电报机前的管理员，最后又望了望上校。

“ 咱们走吧。”他说。

管理员没有抬头。

“ 没有上校的东西。”他说。

上校觉得羞愧。

“ 我没有盼望什么。 ” 他违心地说。他完全像孩子似的回头看了看医生：“ 没有人给我写信。”

他们默默地回去了。医生回想着他的报纸，上校以惯常的步行姿势走着，那副样子好像一个人回头去找丢在路上的一枚硬币。这是一个十分明亮的下午。广场上的扁桃树掉落着最后一批枯叶。他们走到诊疗所门口时，夜色开始降临了。

“ 有什么消息 ?”上校问。

医生递给他几张报纸。

“ 不知道。 ” 他说，“ 经过新闻检查以后要想读到点什么，那

是很困难的。”

上校看了看醒目的大标题。其中有国际消息，上端用四行字登了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通讯。第一版几乎全被一家葬礼的请帖占据了。

“没有大选的希望。”上校说。

“你别天真了，上校。”医生说，“我们早已不是盼望摩西①降临的时代了。”

上校想把报纸还给他，但是医生没有接受。

“带回家去吧。”医生说，“您晚上看，明天再还我。”

七点过一点儿，钟楼上响起了评论电影的钟声。安赫尔神父根据他每月从邮局收到的电影分类单，用这种办法传播对电影的道德方面的评价。上校的妻子数了十二下钟声。

“对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坏片子。”她说，“大约一年来，对所有的人来说，上演的全是些坏影片。”

她把蚊帐落下来，喃喃地说：“世界堕落了。”但是上校没有做任何评论。在睡觉之前，他把公鸡拴在了床腿上。然后关好房门，用杀虫剂熏了熏卧室。最后把灯放在地上，挂上吊床，躺下看报。

他按照版面的顺序看报，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在内。十一点响起了熄灯号。半小时后，上校看完了报。院子里一片漆黑，他打开房门，在蚊子的叮咬下对着叉形支柱做了小解。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妻子醒了。

“没有关于老兵的消息吗？”她问。

①摩西，《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首领。据宗教传说，他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星。

“没有。”上校说。上吊床之前，他熄了灯。“最初起码还登一登新近得到退职金者的名单。可是差不多五年以来，什么也不登了。”

半夜过后下起雨来。上校倒是睡着了，但是由于肚子疼，一会儿又醒了。他发觉屋里有个地方在滴水。他把一条毯子裹在身上，连头也包住了，试图摸黑儿找到滴水的地方。一阵冷汗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来。他发烧了。他觉得好像漂浮在白明胶池塘的中心旋涡里。有人在说话，上校在他的革命者的行军床上回答着。

“你在跟谁说话？”女人问。

“跟伪装成老虎出现在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驻营地的英国人说话。”上校回答。他在吊床上翻转着身子，烧得浑身滚烫。“他是马尔巴勒公爵。”

早晨醒来他感到疲劳不堪。召唤第二次弥撒的钟声响的时候，他从吊床上跳下来，回到了由于公鸡的鸣声而变得吵闹不安的现实中来。他的头仍然像在旋涡里那样转动着。他觉得恶心，便出门到庭院里，穿过冬天的细微的声响和阴凉的气息向厕所走去。锌皮做顶的小木厕内，由于茅坑的阿摩尼亚气味，空气变得稀薄了。上校揭开茅坑盖的时候，一群三角形的苍蝇从坑里飞出来。

这是一场虚惊。当他蹲在粗糙的木板台儿上的时候，心里产生了一种沮丧的不快感觉。急迫的冲动被肠道的隐疼所取代。“没有疑问，”他嘟哝着说，“逢到十月我就犯这种病。”他带着自信的和老老实实等待的神态蹲在那里，直到他肚里的“蘑菇”安静下来为止。然后便回房去照看公鸡。

“夜里你烧得老说胡话。”女人说。

她开始收拾房间。患了一个星期的重病，她恢复了。上校仔

细回忆了一番。

“那不是发烧，”他撒谎说，“是又一次梦见了蜘蛛网。”

跟往常一样，转危为安后她感到很高兴。一个星期中间，家里乱得不成样子。除了钟表和宁芙画[1]外，每件东西都改变了位置。她的身子骨儿是那么纤细而柔软，当她穿着灯芯绒拖鞋和裹得紧紧的黑衣服行走的时候，仿佛具有穿过墙壁的能力。但是在十二点以前，她已经恢复了她的素质和体重。在床上时，她是个空闲的人。现在，她活动在羊齿植物和海棠花盆中间，使房间里充满生气。“倘若阿古斯丁还活着，我就会放声歌唱。”她说，一面搅着饭锅。饭锅里，热带土地能够出产的、被切成碎块的食物在滚沸。

“你要是很想唱，就唱吧。”上校说，“这对身心是有益的。”

吃过午饭，医生来了。他推开街门叫喊的时候，上校和他妻子正在厨房里喝咖啡：

“病人都死了吗？”

上校站起来迎接他。

“是的，医生。”一面说一面向客厅走去，“我经常说，你的表走的速度像兀鹰。”

女人回房间去做体检的准备工作。医生同上校呆在客厅里。虽然天气热，他那干干净净的亚麻布上衣仍然散发出一股凉气。当女人通知说她已经准备好时，医生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三页纸交给了上校。然后走进房间说：“这是昨天的报上没有报道的。”

上校猜到了。这是一份关于最近国内发生的事件的总结，是用印秘密传单的油印机印的。这份材料透露了国内的武装力量抵

①宁芙，希腊神话中的山林水泽女神。

抗的情况。他觉得心情非常沮丧。十年的地下情报工作没有向人们提供一个月比一个月更让人吃惊的消息。医生回到客厅的时候，上校看完了材料。

“这位病人比我还棒。”医生说，“我要是患这样的哮喘病，我将准备活上一百岁。”

上校忧伤地望了望他。他想把信封还给他，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医生拒绝了。

“把它散发出去吧。”他低声说。

上校把信封装进裤兜里。他妻子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我的命数就在这几天了，我要拉着你进地狱，医生。”医生呲了呲牙，不出声地笑了笑，露出了一排整洁的白牙，然后把一把椅子拉到小桌边，从小手提箱里取出几个贴着免费标志的小瓶。上校的妻子赶忙向厨房走去。

“等一等，我去给你热咖啡。”

“不，谢谢。”医生说。他在一张处方上开了药，“我决不给你提供毒害我的机会。”

她在厨房里笑了。医生开完药后，高声念了一遍药方，因为他相信，谁也认不清他的字体。上校竭力想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妻子从厨房里回来后，发现他脸上显露着前一天夜里所受的折磨的痕迹。

“今天早起他发烧了，”她指着她的男人说，“他差不多说了两个钟头关于内战的胡话。”

上校吃了一惊。

“我不是发烧。”他固执地说，已经恢复了常态。“再说，”他说，“到我觉得不行的那一天，不会麻烦任何人照管，我自己会躺在垃圾箱里的。”

他回房间去找报纸。

“ 谢谢你的关照。’医生说。

上校和医生一块向广场走去。空气十分干燥。马路上的沥青热得都化了。医生告辞的时候，上校咬着牙低声问他说：

“ 我们欠你多少 ,医生 ?”

“ 现在什么也别管。 ” 医生说，同时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等你斗鸡得胜的时候我再跟你算总帐。 ”

上校到成衣店去给阿古斯丁的同志们送秘密信件。自从他的同党们被杀害或被逐出城镇后，这是他唯一的藏身所。从那时起他也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除了每个星期五等待信件外，没有别的事情做。

下午的热空气振作了他妻子的精神。她坐在廊檐下几盆海棠中间，背后靠着一个无用的衣柜再一次创造着她凭空缝制出新衣服的永恒奇迹。她用袖子的布做领子，用背部的布做袖头，还用不同颜色的布头做补丁。

一只蝉在庭院里叫起来。太阳开始烤人了。但是她没有注意阳光从海棠上缓缓消失。直到傍晚上校回来的时候她才抬起头。这时她用双手掐着脖颈，揉了揉关节，说：“ 我的脑袋僵得像块木头。”

“ 你的脑袋总是这样。 ” 上校说，但是随后发现他妻子浑身披着五颜六色的零星布块。“ 你像一只啄木鸟。 ”

“ 你要是穿上它，也会像半个啄木鸟。 ” 她说。接着展开一件用三种颜色的布做成的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口的颜色一样。“ 参加狂欢节的时候，你只要脱掉外套就行了。 ”

六点的钟声打断了她的话。“ 天使向玛丽亚报喜了。 ” 她高声地祈祷说，然后拿着衣服向卧室走去。上校跟放学后来看公鸡的

孩子们谈了一会儿，忽然想到第二天的玉米还没有买，就进卧室去向他妻子要钱。

“我想，可能只有五十个生太伏了。”她说。

她把钱存放在床席底下，包在头巾的一角里。这些钱是阿古斯丁用缝纫机挣来的。九个月来，这笔钱一个生太伏一个生太伏地花费着，用来买了他们自己的食品和公鸡的饲料。现在只剩下两枚二十生太伏的硬币和一枚十生太伏的硬币了。

“你去买一磅玉米。”女人说，“用找回的钱买明天的咖啡和四盎司干酪。”

“再买一头金象挂在门上。”上校接着她说，“光玉米就得花四十二生太伏。”

两人考虑了一会儿。“公鸡是一只动物，所以不用为它着急。”女人首先开口说。但是她男人的表情逼迫她认真考虑。上校坐在床上，双臂支在膝头上，把手里的硬币弄得哗哗作响。“不是因为我。”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取决于我，今天晚上我就把公鸡烧个半熟。五十比索的东西吃下去一定很难消化的。”他打住话头，把脖子上的一只蚊子捉住捏烂。然后用目光跟随着他妻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我关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在积攒钱。”

这时，他妻子思忖起来。她拿着灭蚊器原地转了一圈。上校从她的姿态上发现了某种不现实的东西，好像她在召集家里的精灵，为它们诊断。最后，她把灭蚊器放在摆着石印版画的祭台上，用她那糖浆色的眼睛盯着上校的糖浆色的眼睛。

“买玉米吧。”她说，“上帝一定知道，为了生活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

三

“这是面包生面包的奇迹。”在后来的一星期里，每当夫妇俩坐到餐桌边，上校就重复这句话。由于她那修理、织补和缝纫的惊人本领，她似乎发现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维持家庭生计的秘诀。十月延长了无雨期，潮湿被闷热所取代。铜色的阳光使她焕发了精神。她花了三个下午的时间勤奋地进行了梳洗。“现在开始做弥撒了。”在他妻子用一把稀疏的头梳梳理着长长的头发的那个下午，上校这样说。第二天下午，他妻子坐在庭院里，怀里铺着一块白布单，用一把细密的梳子刮着患病期间滋生出来的虱子。最后用熏衣草水洗了头，等头发晾干，把长发绕了两圈盘在脑后，插上了一把装饰梳。上校等待着，夜里他躺在吊床上不能入睡，为了公鸡的命运久久地感到不安。不过，星期三他们称了它的体重，情况很正常。

就在这天下午，当阿古斯丁的同伴们离开他家高兴地盘算着公鸡的胜利的时候，上校的心情也很快活。他妻子为他理了发。“你使我年轻了二十岁。”他说，一面用双手摸着脑袋。妻子觉得丈夫说的话不错。

“我身体好的时候，能够使一个人死而复生。”她说。

但是她的信心只保持了短短的几个钟头。家里没有什么可卖了，只剩下一只钟表和一幅画。星期四晚上，在没有办法可想的情况下，她吐露了自己的忧虑。

“不要担心。”上校安慰她说，“明天信就会来的。”

第二天，他在医生的诊疗所门前等待邮船到来。

“飞机是一种奇妙的玩意儿。”上校说，眼睛盯着邮袋，“据

说一夜就能到达欧洲。”

“是这样。”医生说，用一本画报扇着风。上校发现管理员在一群人中间，那群人正等待船只停稳，好跳上船去。管理员抢先跳上船，从船长手里接过一个封闭的信袋。然后爬到船仓顶上。邮袋拴在两个汽油桶中间。

“不过还是有它的危险。”上校说，管理员从他的目光下消失了，但是他又看见他出现在清凉饮料小车的彩色瓶子中间，“人类没有白进步。”

“目前,它比一条船安全。”医生说，“在两万英尺高的空中，它可以在暴风雨上头飞行。”

“两万英尺？”上校重复道，感到不解。他缺乏数字概念。

医生挺感兴趣。他用双手把画报向两边拉着，直到它一动不动。

“飞机飞行的时候，是十分稳当的。”他说。

但是上校一直在盯着管理员，看见他左手拿着杯子喝了一瓶带玫瑰色泡沫的清凉饮料，右手抓着背上的邮袋。

“此外，海上还有停泊的船只同夜间飞行的飞机保持经常的联系。”医生继续说着，“有了这些谨慎的措施，它就会比船更安全。”

上校看了看他。

“当然啰，”他说，“准像地毯一样安全。”

管理员径直向他们走来。上校在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驱使下向后退了退，试图看清楚信封上的名字。管理员打开邮袋，把一卷报纸交给医生。然后撕掉私人信件的封条，核对了邮件的准确性，念起了收信人的名字。医生展开了报纸。

“还是苏伊士运河问题。”他说，看着醒目的标题，“西方失

利了。”

上校没有看标题。他用力克制着他的肚子。“自从开始新闻检查以来，报纸就只谈论欧洲的问题。”他说，“最好是让欧洲人到这儿来，我们到欧洲去。这样的话，全世界就可以知道各自的国家发生的事情了。”

“对欧洲人来说，南美洲是个手拿吉他和手枪、不肯让人摆布的人。”医生说，同时冲着报纸笑着，“他们对问题不理解。”

管理员把信件交给他，把其余的信件装进邮袋，重新把袋口扎上。医生准备读两封个人的信。但是在撕开信封之前，他看了看上校。然后又看了看管理员。

“没有上校的信吗？”

上校感到慌乱。管理员把邮袋背起来，走下码头，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没有人给上校写信。”

和他的习惯相反，他没有直接回家去。他在成衣店里喝了咖啡，阿古斯丁的同伴们浏览着报纸。他觉得心灰意懒。他宁肯在那里呆到下星期五，也不愿当天晚上两手空空地回到他妻子的面前去。但是当成衣店关门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妻子在等他。

“没有信吗？”他妻子问。

“没有。”上校回答。

下星期五他又去了码头。跟以往的星期五一样，没有收到盼望的信就回了家。

“我们已经尽了等待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妻子对他说，“十五年来为了等一封信，需要有你那种老牛般的耐心。”上校上吊床看起报来。

“必须按次序排号。”上校说“我们的号码是1823。”

“自从我们排号以来，这个号码在抽彩牌上出现过两次。”他妻子回答。

跟往常一样，上校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包括广告。不过，这一次他精神不集中。他一面看报一面想着他的退职金。十九年前，国会颁布法令的时候，他打了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官司。后来又用了六年多的时间才被登上花名册。那是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宵禁号响过后，他看完了报。准备熄灯的时候，他发觉他妻子醒着。

“那份剪报还有吗？”

他妻子想了想。

“是的。一定和别的纸头搁在一起。”

她钻出蚊帐，从柜子里取出一只木匣，里面有一叠按着日期排列的、用一根松紧带捆着的信件。找到一张愿意为军人退职金积极进行斡旋的律师代办处的广告。

“我一直提出你应该换个律师，在花光存款以前，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成事。”女人把剪报递给她男人说，“如果像印第安人那样让人家把钱存在钱柜里，我们是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的。”

上校看了看这张两年前的剪报。然后把它装进挂在门后的衬衫的口袋里。

“糟糕的是，换律师需要花钱。”

“不用花钱，”他妻子果断地说，“写信告诉他们，退职金下来后从里头扣就是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于是，星期六下午上校就去拜见他的律师。他碰见律师懒洋洋地躺在一张吊床上。这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上颚只剩下两颗

犬齿。他把双脚伸进木底拖鞋，打开了办公室的窗子。窗前摆着一架落满灰尘的钢琴，上面的圆筒里装着一卷卷的纸，那是用胶水贴在旧帐本上的“官方日报”的剪报和一本政府金融简报的剪辑。钢琴没有键盘，权当写字台用。律师坐在一把弹簧椅上。上校在说明来访的意图之前，流露了他的焦急心情。

“我必须提醒你，事情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律师在上校说话的时候打断他说。他热得透不过气来，把椅子的弹簧使劲儿往后压了压，用一块做广告的纸板扇起来。

“我的代理人经常写信对我说，不应该绝望。”

“十五年来，情况总是这样。”上校回答，“这简直像那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番经办诉讼业务的困难。对他那已过壮年的屁股来说，椅子显得太窄小了。“十五年以前比较好办。”他说，“那时有由两党组成的城市退伍军人协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热乎乎的空气，说了句格言，好像刚刚想出来似的：

“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做不到了。”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孤单，“我的同事们都在等信的期间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律颁布得太晚了。”他说，“你二十岁就当了上校，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你这样的运气。再说，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款项，所以政府不得不修改预算。”

总是这一套。上校每次听到这些话，就暗暗感到恼火。“这不是乞求施舍。”他说，“不是恳求别人帮忙。为拯救共和国，我们流了血。”律师摊了摊双臂。

“不错，上校。”他说，“人们一旦忘恩负义那是没有顾忌

的。”

这类的话，上校也不陌生。内兰迪亚条约签定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听到了，当时政府保证给二百名革命军官旅途补助金和赔偿损失。一营大部分由学校逃出来的青年组成的革命军在内兰迪亚的高大木棉树下扎营之后，等了三个月之久。后来他们自己想办法回了家，在家里继续等待。差不多过了六十年之后，上校还在等待。

回想起往事，上校不禁激动起来，神情显得格外严肃。他把右手按在大腿骨——用纤细的神经连接起来的纯洁的骨头——上，自言自语道：

“好吧，我决定另想办法。”

律师惶惑不解。

“你的意思是？”

“换个律师。”

一只母鸡后面跟着好几只小黄鸡走进办公室。律师站起来赶它们出去。“照你说的办吧，上校。”他说，一面赶着鸡，“就照你说的办吧。我要是能创造奇迹，也不会住在这个鸡窝里了。”他在门口挡上了一道木栅栏，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工作了一辈子。”上校说，“我的住宅也抵押出去了。对律师们来说，退休的规定等于拿一辈子年金。”

“我可不是这样。”律师争辩说，“最后一分钱我都花在办理诉讼事务上了。”

上校想到自己这么不公平，觉得很难为情。

“这正是我想说的。”他纠正说，用衬衣和袖子擦擦前额。“这么热的天，脑袋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在办公室里四处寻找着文件。阳光在向用

粗糙的木板建造的宽绰的房间中央移动。徒劳地到处搜寻了一番后，律师爬在地上，不住地喘气，在钢琴底下拣起一卷纸。

“找到了。”

他把一张公文纸交给上校。“我得给我的助手们写信，让他们把抄件注销。”他决断地说。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装进了衬衫的衣袋。

“你自己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回答，“这二十年是难忘的。”他等着律师继续寻找。但是律师没有再去寻找，却走到吊床边去擦汗，站在那里透过反射的光线望着上校。

“我也需要文件。”上校说。

“什么文件？”

“证明文件。”

律师摊开双臂。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上校。”

上校感到吃惊。作为马孔多地区的革命军的司库，他曾经用一头骡子驮着两箱内战所需的资金进行了六天艰苦的旅行。在条约签定前半小时，他牵着快要饿死的骡子到达了内兰迪亚驻地。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大西洋海岸革命军的军需官——把收据展开，把两箱资金登入了收入帐簿里。

“那是一些价值连城的文件。”上校说，“有一张收据是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

“我同意你的话。”律师说，“不过那些文件在千百个办公室里经过了千百人的手，天晓得最后落到军需部的哪个处里了。”

“这种性质的文件，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也不会马虎的。”上校说。

“但是近十五年来工作人员更换了许多次。”律师明确地说，“你想想看，总统更替了七届，每位总统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每位部长也至少把他的职员换过上百次。”

“可是谁也不会把文件带到自己家里去。”上校说，“每个新上任的官员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看到这些文件。”

律师有些恼火了。

“再说，那些文件要是现在从部里取出来，恐怕得重新来一次公文旅行。”

“没关系。”上校说。

“那可就得等上百八十年啦。”

“没关系。盼头越大，希望越小。”

四

上校把一叠信笺，一支蘸水钢笔，一瓶墨水和一张吸墨纸拿到客厅的小桌上，让房门敞着，有什么事好问他妻子。他妻子在念玫瑰经。

“今天几号？”

“十月二十七号。”

他用端端正正的姿势写起来：把执笔的手放在吸墨纸上，脊背挺得笔直，为的是便于呼吸，就像学校老师教的那样。坐在关闭的客厅里使他热得难受，一滴汗水落在信纸上。上校用吸墨纸把它吸干。然后他试图把写坏的字涂掉，但是留下了一块墨迹。他没有灰心。他写了一句口号，在页边上注道：“获得的权利”，随后写了整个段落。

“我什么时候被登上花名册的？”

他妻子一面回想一面继续祈祷着。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过了一会儿下起雨来。上校用又大又潦草的字写满了一张纸，字体有点孩子气，就像他在马诺雷公共学校里学的那样。然后又写了半页，署了名。

他把信读给他妻子听。他妻子点头同意了他的每一句话。读完后，上校把信装进信封封好，熄了灯。

“你可以请人替你用打字机打一下。”

“不，”上校回答，“为了请人帮忙，我已经感到厌倦了。”

有半个钟头的工夫，他听见雨水在敲打着屋顶上的棕榈叶。整个村镇被淹没在倾盆大雨之中。熄灯号响过后，房内某个地方的漏洞开始滴水了。

“这件事很久以前就应该做。”他妻子说，“直接交涉总是最妥当的。”

“什么时候做也不算太晚。”上校说，一面听着滴水声，“但愿房屋抵押期满时一切都能解决。”

“还得两年。”女人说。

上校点上灯去寻找客厅里漏雨的地方。他把喂鸡的小筒儿放在漏雨的地方，在身后水滴落入空铁筒儿的叮咚声中返回了卧室。

“可能他们出于赚钱的目的会在一月以前解决。”上校说，他说服着自己，“到那时，阿古斯丁的祭期就满了，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了。”

他妻子低声地笑了笑。“我甚至连那些可笑的角色都不记得了。”她说。上校想透过蚊帐看到她。

“你最后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一九三一年。”她说，“演的是《死者的意志》。”

“动拳头了吗？”

“从来不知道。当幽灵企图抢夺姑娘的项链时，下起了大雨。”

淅淅沥沥的雨声伴着他们睡下了。上校觉得肚子里隐隐作疼。但是他没有惊慌。他勉勉强强熬过了一个新的十月。他裹在一条毯子里，有一阵子听见了他妻子的困难的呼吸声。他妻子——仿佛在遥远的地方——正游荡在另一种梦境里。这时，他说了句什么话，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他妻子醒了。

“你在跟谁讲话？”

“不跟谁。”上校说，“我在想，在马孔多会议上，我们劝说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能投降的时候，我们是有道理的。那是失掉天下的原因。”

雨，下了整整一星期。十一月二日——和上校的愿望相反——他妻子到阿古斯丁的坟上去献花。从墓地回来后又犯了病。这是一个难熬的星期，比十月里的四个星期还难熬。那四个星期，上校曾相信是熬不过的。医生来家里看了病人，离开房间的时候大声说：“我要是得了这样的哮喘病，我要准备活到为全镇的人送葬。”但是，他单独跟上校谈了话，规定了专门的护理制度。

上校也犯了一次病。他在厕所里挣扎了很久：一阵阵冒冷汗，他觉得他的肠胃在腐烂，好像要一块块掉出来了。“这是冬天。”他重复说着，没有绝望，“下过雨后，一切就会不同了。”他相信这是真的，相信信件到来的时候他是活着的。

这一次，轮到他来为家庭的开支补缺了。他不得不多次咬着

牙到附近的商店去借钱。“到下星期就好了。”他说，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点钱，自打星期五我就应该拿到了。”他妻子从疾病中复活过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模样后不禁吃了一惊。

“你瘦得像皮包骨了。”她说。

“我在小心保养，准备把自己卖了。”上校说，“一家单簧管工厂已经向我提出订购了。”

但是实际上，他仅仅由于怀着收到信的希望才勉强支撑着自己。

由于熬夜，他已经筋疲力尽，骨肉疼痛不堪，不能够同时照顾自己的生活和那只公鸡了。到了十一月的后半月，那只公鸡两天没有喂玉米，他相信它一定会死的。这时，他想起了七月间他挂在炉灶上的一束扁豆。他剥去豆荚，把一筒儿干豆拿给公鸡吃。

“你过来一下。”他妻子说。

“等一会儿。”上校回答，一面观察着鸡的反应，“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

他看到他妻子想在床上坐起来。病恹恹的身体发出一股草药的气味。她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地吐着音，估计着发音的准确性：

“你马上把这鸡处理了吧。”

这个时刻他早就预料到了。自打他儿子被打死、他决定保留公鸡的那个下午起，他就等待着这个时刻。他用来考虑的时间是充分的。

“已经没有必要了。”他说，“三个月后将有斗鸡活动，到时候我们可以卖个好价钱。”

“不是为了钱。”他妻子说，“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们，

叫他们把公鸡带走，他们愿意拿它怎样就怎样。”

“是为了阿古斯丁。”上校说，这条理由他预先想好了，“你想想他跑来报告我们斗鸡获胜的高兴样子吧。”

他妻子果真想念起她的儿子来。

“那些可恶的公鸡送了他的命。”她叫道，“一月三日他要是留在家里，就不会碰到那个倒霉的时刻了。”她用肮脏的食指指着门口，大声说：

“我觉得好像亲眼看见他腋下夹着公鸡出了门。我提醒他，不要到斗鸡场上去寻找倒霉的时刻。他不满地对我说：‘住口吧，今天下午我们要去赢大钱呐！’”

她孱弱无力地倒下了。上校轻轻地把她移向枕头。他的眼睛碰到了他女人那同他的眼睛一模一样的眼睛。“你尽可能不要动。”他说，他感觉到了他自己的肺里发出的咝咝声。他妻子陷入了暂时的昏迷状态。她闭上了眼睛。当她重新睁开的时候。她的呼吸似乎平静些了。

“是为了我们眼下的日子。”她说，“把我们嘴里的面包夺去喂一只公鸡是一种罪过。”

上校用床单为她擦了擦前额。

“三个月内谁也不会饿死的。”

“那么我们吃什么呢？”他妻子问。

“不知道。”上校说，“不过，要是我们会饿死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

公鸡守着那只空空的小筒儿活得很好。它看到上校走来，像人似的发出一种单调的咕咕声，把头往后仰着。上校像对待伙伴似的冲它笑了笑。

“生活是艰苦的，伙计。”

然后他上街去了，在午休的村镇里游荡，什么也不想，也根本不打算相信他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他沿着被人遗忘的街道走着，直到觉得筋疲力尽才转回家去。他妻子听见他走进来，把他唤进房里。

“什么事？”

她没有看他，回答说：

“我们可以把钟卖掉。”

上校也想到了这一点。“我相信，阿尔瓦罗会马上付你四十比索。”他妻子说，“你看到吗，他很容易就买了一台缝纫机。”

她指的是成衣店老板，阿古斯丁为他当过伙计。

“可以明天找他谈。”上校同意说。

“干吗明天找他谈，”她坚决地说，“现在你就把钟拿去，放在他的桌上，对他说，‘阿尔瓦罗，我把这只钟给你送来了，请你买下。’他立刻就会明白。”

上校觉得自己简直倒霉透了。

“这就好像驮着一块大石碑。”他反对说，“要是人家看见我抱着这么个玻璃盒子，准会用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的一支歌来取笑我的。”

但是这一次他女人又说服了他。她亲自把钟摘下来，用报纸包好，递到他的手里。“拿不到四十比索，你别回家来。”她说。上校把纸包夹在腋下向成衣店走去。他碰见阿古斯丁的同伴们坐在门口。

其中一个人让给他一个座位。上校的心里乱似麻团。“谢谢。”他说，“我顺便从这儿过。”阿尔瓦罗从成衣店里走出来。在走廊的一根架在两根叉形支柱之间的铁丝上搭了一件斜纹布衣服。这是一个体型硬实、有棱有角、眼睛发花的小伙子。他也请

他坐下来。上校觉得心里平静了。他把凳子倚到门框上，坐下等着阿尔瓦罗独自留下来，好跟他谈谈生意。突然他发现周围的面孔都沉默不语。

“我不打断你们的话。”他说。

他们说没什么。一个人把身子俯向他，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

“是阿古斯丁写的。”

上校望了望冷清清的街道。

“写的什么？”

“跟往常一样。”

他们把秘密传单交给了他。上校把它装进裤兜里。然后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轻轻地敲打着报纸包，直到发觉已经有人注意它了。他觉得一阵难堪。

“你带的什么，上校？”

上校躲避着赫尔曼的一双锐利的绿眼睛。

“没什么。”他撒谎说，“我想把钟送到德国人那里，请他给我修修。”

“别干傻事了，上校。”赫尔曼说，想把钟拿过去，“等一等，我来检查一下。”

上校拒绝了。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眼皮变成暗紫色的了。其他人仍然坚持着。

“让他检查吧，上校。他懂机器。”

“因为我不想麻烦他。”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赫尔曼争辩说，一面把钟拿了过去，“德国人要你拿十个比索你也得让他修。”

他走进成衣店，阿尔瓦罗正在用机器缝衣服。在店堂深处一

把挂着的吉他下面，有一位姑娘在钉扣子。吉他上方钉着一块牌子，上写“莫谈国事”。上校觉得身体沉重，把双脚棝在板凳的横档上。

“臭狗屎,上校。”

他吃了一惊“不要骂人嘛。”他说。

阿方索把眼镜从鼻梁上往上推了推，以便更清楚地观察上校的短统靴。

“瞧你的鞋子。”他说“你是头一次穿这种鬼鞋子吧。”

“可是说话不应该骂人。”上校说，一面把漆黑的短统靴的靴底拿给人看，“这些怪物四十岁了，第一次听见一句脏话。”

“修好了。”赫尔曼在店里嚷着，同时响起钟声。邻居家有一位妇女敲了敲隔墙，嚷道：

“把那把吉他放下，阿古斯丁死后还不满一年呢。”

爆发出一阵大笑。

“是一只钟响。”

赫尔曼抱着纸包出来了。

“没什么问题。”他说，“你要是愿意，我跟你回家去把它摆正。”

上校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该你多少？”

“不要担心，上校。”赫尔曼回答，一面走到人群里去坐在他的位子上“到一月份让公鸡替你还吧。”

上校这时碰到一个有利的时机。

“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把公鸡送给你。”他看了看周围的面孔，“把公鸡送给你们

大伙儿。”

赫尔曼惶惑地望了望他。

“我老了，干这个不合适了。”上校接着说，声调令人觉得特别严肃，“对我来说，责任太重大了。几天来，我总觉得那只鸡快要死了。”

“不要担心，上校。”阿方索说，“这是因为现在正是公鸡脱毛的时候，羽毛管温度高。”

“到下月会变好的。”赫尔曼肯定说。

“不管怎样，我不想要它了。”上校说。

赫尔曼目不转睛地逼视着他。

“你要想想事情的原委，上校。”他坚持说，“要紧的是，是你把阿古斯丁的公鸡投进斗鸡场的。”

上校想了想。“我明白。”他说，“所以我才把它养到现在。”他咬紧牙齿，觉得有力量说下去：

“糟糕的是，还差三个月呢。”

赫尔曼明白他的话。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他说。

接着提出了他的办法。其余的人表示赞成。

傍晚，上校夹着纸包走进家门的时候，他妻子大失所望。

“没卖吗？”她问。

“没有。”上校回答，“不过现在没关系了。小伙子们将负责养这只公鸡。”

五

“等一等，我给你拿把雨伞，干亲家。”

堂萨瓦斯打开办公室的一个壁橱，发现里头乱七八糟：马靴堆在一起，还有脚蹬、皮带和一铅桶马距。上方挂着五六把雨伞和一把女式阳伞。这使上校联想到一场灾祸带来的破坏。

“谢谢，干亲家。”他把臂肘靠在窗台上说，“我干脆等雨住了再走吧。”堂萨瓦斯没有关闭壁橱。他坐在写字台后电风扇吹得到的地方。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包在棉花里的皮下注射器。上校透过雨幕观望着铅灰色的扁桃树。这是一个凄凉的下午。

“从这扇窗子望去，雨是另一种样子，”他说，“就好像在另一个镇子上下雨。”

“不管从哪里看，雨还是雨。”堂萨瓦斯回答，一面把注射器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煮着，“这是个见鬼的镇子。”

上校耸了耸肩，向办公室内部走去：这是一个地上铺着绿色瓷砖的宽敞房间，家具上罩着花色鲜艳的布套。房间的深处，乱糟糟地堆放着盐包、蜜皮囊和马鞍。堂萨瓦斯用迷离恍惚的目光跟踪着他。

“我要是你,就不这么想。”上校说。

他交叉着双腿坐下来，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俯在写字台上的人。这是一个身材矮小肥胖、肌肉松软的人。眼睛里流露着蛤蟆那样的阴郁的光芒。

“你应该请医生看看，干亲家。”堂萨瓦斯说，“自打送葬那天起，你就有点悲伤。”

上校抬起头。

“我的身体非常好。’他说。

堂萨瓦斯等着注射器煮沸。“我要是能说这话就好了。”他惋惜地说，“你能吃下一只铜脚蹬，真是福气。”他望着他那毛茸茸的手背，上面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许多棕褐色的痣。他的结婚戒指

上套着一只黑宝石的指环。

“是这样。”上校同意说。

堂萨瓦斯冲着门口呼唤他女人。这道门从办公室通往住宅的其他部分。然后他开始痛苦地解释他的营养制度。他从衬衣里掏出一个小瓶，把一粒豆大的白药片放在写字台上。

“到哪儿去都得带着这种东西，真是一种痛苦。”他说，“简直像把死神装在口袋里带着。”

上校走到写字台前，打量着他放在手心里的药片，最后堂萨瓦斯请他也尝一片。

“这是为了增加咖啡的甜味。”他向他解释说，“这是甜的，不过没有糖。”

“当然。”上校说，口水里夹杂着一股苦涩涩的甜味，“这就好比听见钟声而看不见钟一样。”

他女人给他打完针后，他双手捧着脸，双臂撑在写字台上。上校不知道拿自己的身体怎么办。女人把电风扇的电源切断，把它放到包铁皮的箱子上，向壁橱走去。

“雨伞跟死神有点关系。”她说。

上校没有理会她的话。他四点钟从家里出来想去等信，但是碰上了雨，不得不躲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来。船上的汽笛响的时候，雨还没有停。

“人们都说死神是个女人。”堂萨瓦斯的女人接着说。她体态肥胖，个子比她男人还高，上唇长着一颗带毛的瘊子，说话的声调就像电风扇的嗡嗡声。“可是我不相信是个女人。”她说。她把壁橱关好，转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上校的眼睛：

“我相信死神是一头有蹄的动物。”

“这是可能的。”上校附和说，“有时，事情是很奇怪的。”

他想，现在管理员可能正披着一块不透水的油布跳上船去。自打他换了律师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他有权利盼望一封回信了。堂萨瓦斯的女人还在谈论死神，直到发现上校的凝神沉思的表情才住口。

“干亲家，”她说，“你一定有什么心事。”

上校从沉思中醒过来。

“是的，干亲家。”他骗她说，“我在想，现在已经五点了，还没有给公鸡打针。”

她觉得莫名其妙。

“给一只公鸡打针，好像它是个人。”她叫道，“这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

堂萨瓦斯不能再忍受了。他抬起了涨得发红的脸。

“你闭一会儿嘴吧。”他命令他女人说。她果然用手捂住了嘴。“你用你那一套胡说八道打扰了我干亲家半个小时了。”

“绝对没有。”上校声明说。

女人猛地关上了门。堂萨瓦斯用一条充满熏香味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校走到窗前。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一只长着黄色长腿的母鸡穿过荒凉的广场。

“人们真的也给公鸡打针吗？”

“不错。”上校说，“训练下星期开始。”

“那是一种可怕的活动。”堂萨瓦斯说，“你不适合干这类事情。”

“不错。”上校说，“可这不是掐死它的理由。”

“这是一种愚蠢的固执态度。”堂萨瓦斯一面向窗口走一面说。上校听到自己拉风箱似的喘息声。他干亲家的眼睛使他产生了恻隐之心。

“照我的劝告做吧，干亲家。”堂萨瓦斯说，“把那只公鸡卖掉，免得太晚了。”

“什么时候卖也不晚。”上校说。

“你别这么固执。”堂萨瓦斯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意。一方面可以摆脱这件使人伤脑筋的东西，另一方面可以得到九百比索。”

“九百比索！”上校叫道。

“九百比索。”

上校明白这笔钱是多少。

“你相信有人会出这么多钱买它吗？”

“不是我相信。”堂萨瓦斯说，“而是绝对有把握。”

自打上校把革命的资金交公以后，这是他头脑里想到的最可观的一笔钱。他离开堂萨瓦斯的办公室的时候，觉得肚里一阵剧烈的绞疼，但是他明白，这一次不是因为天气。到了邮电所后，他直接对管理员说：

“我在等一封紧急的信。”他说，“是航空信。”

管理员在信箱里查找着。当他查完了每个信箱后，又把信件放进了相应的信箱里，但是没说什么。他拍了拍手掌，用明白的目光看了上校一眼。

“今天肯定会来的。”上校说。

管理员耸了耸肩。

“肯定会来的只有死亡，上校。”

上校回到家后，他妻子为他端来一碗玉米粥。他默默地吃着，每吃一匙就停下来思忖一阵。他妻子坐在他对面，发现家里发生了某种变化。

“你这是怎么啦？”她问。

“我在想那个管理退职金的职员。”上校编话说，“五十年后我们就要在黄泉下安息了，而那个可怜虫，还将每个星期五难受地等待他的退职金。”

“这是个不祥的兆头。”女人说，“这就是说，你已经开始屈服了。”她继续吃着她的粥。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发觉她男人仍然在沉思。

“现在,你的任务是吃玉米粥。”

“这粥很不错。”上校说，“从哪儿弄来的玉米？”

“从公鸡那儿。”女人回答，“小伙子们给它送来那么多玉米，我们就和鸡共享了。这就是生活。”

“不错。”上校叹口气说，“生活是人类创造的最美的东西。”

他看了看拴在炉灶支柱上的公鸡。这一次他觉得它是一只完全不同的动物。他妻子也看了看公鸡。

“今天下午我不得不用棍子把孩子们赶出去。”她说，“他们带了一只老母鸡来，让她跟公鸡交配。”

“这不是第一次。”上校说，“就跟镇上的人对待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样，他们领来几个姑娘，要她们跟他交配。”

听到这个趣闻，他妻子觉得很好笑。公鸡发出一阵咕咕的叫声。声音传到走廊里，就像有人在低声交谈。“有时候我想，那只公鸡可能要说话了。”女人说。上校又望了望公鸡。

“这是一只能卖不少现钱的公鸡。”他说。他一面啜着一匙玉米粥一面盘算着，“卖的钱我们能吃三年。”

“画饼是不能充饥的。”女人说。

“不能充饥，但是管用。”上校反驳说，“这就跟我们的干亲家堂萨瓦斯的奇妙的药片一样。”

这一夜，他没有睡好，因为他竭力想把头脑里那个数目字涂

掉。第二天午餐时，他妻子盛了两碗玉米粥。她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喝了她的那碗。上校觉得受到一种悲伤情绪的感染。

“你怎么啦？”

“没什么。”女人说。

上校觉得这一次是她在说谎。他想安慰她。但是他妻子不听他的。

“没什么奇怪的。”她说，“我在想，儿子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有去上坟。”

于是，她当晚就去上坟。上校把她送到墓地，然后在扩音器的音乐吸引下到影院去了。安赫尔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监视着入口处，他要看看有谁不顾他的十二条警告敢于进去看电影。明亮的光线、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叫喊，使人全身感到不快。其中有个男孩用一支木枪对着上校。

“公鸡的情况怎么样，上校？”他用命令的口吻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公鸡在家很好。”

一块四种颜色的广告牌把电影院的正面完全占据了。上面写着：《半夜的处女》。画面上是一个穿着舞蹈服装的女人，一条腿一直裸露到大腿。上校继续在周围游荡着。直到远方传来滚滚的雷鸣和闪电。于是他返回去找他的妻子。

他妻子不在墓地，也不在家里。上校估计，熄灯号很快就要响了，但是钟表停了。他等待着，觉得暴风雨在向镇上袭来。他想再出去找，刚巧他妻子回来了。

他把公鸡抱进卧室。他妻子换了衣服，到客厅里去喝水，这时上校刚刚上完发条，正等着熄灯号响，以便对表。

“你刚才在哪儿？”上校问。

“我在那儿。”女人回答。把杯子放在土瓮上，没有抬眼看她男人，接着回卧室去了。“谁也不相信这么早会下雨。”上校没有发表什么看法。熄灯号响的时候，他把表针拨到十一点。关上玻璃表门，把椅子放回原处。他看见他妻子在念玫瑰经。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什么话？”

“你刚才在哪儿？”

“我在那儿谈话。”她说，“我这么久没出门了。”

上校挂上吊床，关好房门，用烟熏了房间。然后把灯放在地上，躺下了。

“我明白你的话。”他痛苦地说，“愈来愈恶劣的生活状况逼得一个人说假话。”

他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安赫尔神父那儿。”她说，“我去找他，想把结婚戒指当给他。”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东西做交易是犯罪。”

他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着。“两天前我想把钟卖掉。”她说，“但是没人感兴趣，因为市场上在出售一种时髦的夜光表。在黑暗中可以看清钟点。”上校意识到，四十年的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还不足以使他了解他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也有点衰老了。

“画儿，人们也不愿意要。”她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画儿。我甚至连土耳其人那里也去了。”

上校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这样一来，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感到厌倦了。”他妻子说，“男人们都不留心家里的问题。我好几次把石头放在锅里煮，我们好久就揭不开锅了，免得让邻居们知道。”

上校觉得受到了侮辱。

“这是一桩丢脸的事。”他说。

他妻子离开蚊帐，向吊床走去。“我决定结束这个家庭的装模作样和互相讨好的状态。”她说。她气得声音都有点含混不清了。“什么忍耐，尊严，我感到厌倦了。”

上校的面部肌肉一动不动。

“每次大选后对你信誓旦旦的小花鸟们，我们等了他们二十年。结果，我们仅剩下的一个儿子也被杀死了。”他妻子继续说着，“只有一个死去的儿子。”

对这类抱怨的言语，上校已经习惯了。

“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他说。

“二十年来，他们在议会里也尽了每月拿一千比索的责任。”他妻子反驳说，“就拿我们的干亲家堂萨瓦斯说吧，他本是一个脖子上绕着一条长虫到镇上来卖野药的人，如今他有了一幢两层楼的住宅，钱多得都没处放了。”

“可是他得了要命的糖尿病。”上校说。

“没有饭吃，也会要你的命的。”他妻子说，“你应该明白，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闪电打断了她的话。雷声在街上爆炸，冲进了卧室，像一阵飞砂走石，从床下滚滚而过。她向蚊帐扑去，想去找她的念珠。

上校微笑了。

“这都怪你那收不住缰的舌头。”他说，“我总是对你说，苍天是我的拥护者。”

但是实际上，他心里很痛苦。过了一会儿，他把灯熄灭，在被闪电撕裂着的黑暗中沉思起来。他想起了马孔多。十年来，上校一直盼望着内兰迪亚的诺言兑现。在闷热的午休时刻，他看见一辆布满灰尘的黄色火车来到了马孔多，车上载着热得透不过气来的男人、女人和牲畜，连车厢顶上都堆满了人。正值香蕉生长的热季。二十四小时的工夫，镇子的面貌就变了。“我得离开这儿。”上校说，“香蕉的味道会使我的肠胃变坏的。”于是，上校便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二点十八分乘坐返回的列车离开了马孔多。他用了半个世纪才意识到，自打内兰迪亚投降后，他没有得到一分钟的安宁。

他睁开了眼睛。

“那就不必再去想它了。”他说。

“什么？”

“公鸡的问题。”上校说，“明天我就以九百比索的价钱把它卖给我的干亲家堂萨瓦斯。”

六

遭阉割的牲畜的哀叫声伴随着堂萨瓦斯的叫喊声，通过窗口传进了办公室。“十分钟内他要是不来，我就走。”上校等了两个钟头后发誓说。但是他又等了二十分钟。他准备走的时候，堂萨瓦斯进了办公室，后面跟着一群雇工。他好几次从上校面前经过都没看他。直到雇工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才发现他。

“你在等我吗,干亲家？”

“是的，干亲家。”上校说，“不过，你要是太忙的话，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来。”

堂萨瓦斯在门那边，没有听见他的话。

“我马上就回来。”他说。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光闪闪的街道把办公室映照得通明。上校热得浑身酸软无力，不由得合上了眼睛。刚闭上眼就梦见了他的妻子。这时，堂萨瓦斯的女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你自管睡吧，于亲家。”她说，“我来关上百叶窗，因为这个办公室像个地狱。”

上校用一种完全没有意识的目光跟踪着她。她在关窗子的时候，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说：

“你经常做梦吗？”

“有时做。”上校回答，为自己的瞌睡感到羞愧，“我差不多总是梦见自己被粘在了蜘蛛网上。”

“我每天夜里都做恶梦。”女人说，“现在我特别想知道人们在梦中遇到的那些陌生人都是什么人。”

她打开了电风扇的开关。“上星期，有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床头。”她说，“我鼓起勇气问她是谁，她回答我说：‘我是十二年前在这个房间里死去的女人。’”

“这所房子盖了才刚刚两年。”上校说。

“是的。”女人说，“这说明死人也会搞错的。”

电风扇的嗡嗡声加重了昏暗的气氛。在困顿不堪和那个从幻梦直接变成神秘幻影的女人折磨下，上校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正想找个机会告辞，这时堂萨瓦斯和他的监工走进了办公室。

“我为你热了四次汤了。”堂萨瓦斯的女人说。

“你要是愿意，你就热它十次好了。”堂萨瓦斯说，“不过现在你不要找我的麻烦。”

他打开钱柜，拿出一叠钞票交给他的监工，同时教训了他一

番。监工拉起百叶窗来数钱。堂萨瓦斯看见上校坐在办公室深处，但是没有作任何反应。他继续跟监工交谈着。当他们两个准备重新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上校站了起来。堂萨瓦斯在开门之前站住了。

“有什么事找我吗，干亲家？”

上校发觉监工在看他。

“没什么，干亲家。”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有什么事，请马上对我说吧。”堂萨瓦斯说，“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他用一只手扶着门框等待着。上校觉得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五秒钟。他咬了咬牙。

“是为了公鸡的事情。”他喃喃地说。

这时，堂萨瓦斯终于打开了门。“公鸡的事情。”他微笑着重复道，然后把监工向走廊推去，“天塌的时候，我的干亲家可以指望那只公鸡。”然后他对上校说：

“很好，干亲家。我马上就回来。”

上校一动不动地站在办公室中央，直呆到从走廊头上传来那两个人的脚步声。然后他离开办公室，沿着处在星期日午休中的宁静镇子走着。成衣店里空无一人。医生的诊疗所关着门。没有人守着叙利亚人的商店里展出的商品。河流仿佛是一条钢板。砖头上有一个人睡在四只汽油桶上，脸上扣着一顶帽子遮着阳光。上校沿着回家的路走去，他相信他是镇上唯一的一个活物。

他妻子准备了一顿齐全的午餐，正等着他。

“我赊了账，答应明天一早付他钱。”她解释说。

进午餐的时候，上校向她讲述了最近三个小时里发生的事件。她听得很不耐烦。

“原因是你缺乏果断的性格。”然后她说，“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见我们的干亲家，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干亲家，我决定把公鸡卖给你。’你却像去向他乞求什么。”

“照你这么说，生活像吹灰那么容易了。”上校说。

他妻子的举止显得挺有精神。这天早晨她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身上的穿戴也不同平常：脚上穿着她男人的一双旧鞋，腰间围着一块油布，头上包着一块布，两只耳朵边各扎了一个结儿。“对于生意，你缺乏起码的意识。”她说，“卖东西的面孔，必须跟买东西的时候一模一样。”

上校在她身上发现了某种有趣的东西。

“你就这样穿戴着吧。”他微笑着打断了她，“这样你就跟夸克尔① 燕麦田的稻草人一般无二了。”

他妻子取下了包头的布。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他妻子说，“我马上把公鸡送到我们的干亲家那里去，你愿意赌什么我都同意：半个钟头内，我保证拿九百比索回来。”

“你的头脑让钱给冲昏了，”上校说，“竟拿卖鸡的钱打起赌来了。”

他要说服她是困难的。他妻子把星期五的苦恼置之度外，花了一个早晨的时间来盘算三年的计划。她收拾了房间，准备迎接九百比索的到来。她把所短缺的主要用品列了一份清单，没有忘记为上校买一双新鞋。她还在卧室里安排了一个摆镜子的地方。她的计划一时不能实现，使她产生了一种既羞愧又恼恨的复杂心情。

① 一种燕麦品种。

中午，她睡了一会儿，起身的时候看见上校在庭院里坐着。

“现在你在做什么？”

“在思考。”上校回答。

“这么办，问题就解决了。那笔钱，你恐怕得等五十年才能拿到。”

但是实际上，那天下午上校就已决定把公鸡卖掉。他想起了堂萨瓦斯，他可能正独自呆在办公室里，面对电风扇做每天注射的准备工作。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回答。

“把公鸡带去。”上校出门的时候他妻子叮嘱他说，“圣人的面孔出奇迹。”

上校表示反对。他妻子怀着十分焦急心情一直追他到了街道口。

“他的办公室里有军队也不要怕。”她说，“你抓住他的胳膊，他不给你九百比索你就别松手。”

“人家会以为我们在策划一次抢劫。”

他妻子没有理睬他的话。

“你要记住，你是公鸡的所有者。”她坚持说，“还要记住，你是要为他效劳的人。”

“好吧。”

堂萨瓦斯正跟医生在卧室里。“你现在就跟他谈谈吧，干亲家。”堂萨瓦斯的女人对上校说，“医生正为他做去庄园的准备，星期四他才能回来。”上校在两种相反的力量之间斗争着：虽然他已经决定卖掉公鸡，但他还是宁愿晚一个小时到达这里，不要碰见堂萨瓦斯。

“我可以等着。”他说。

但是堂萨瓦斯的女人还是坚持。把他带进了卧室，她男人正

坐在格格作响的床上，穿着内裤，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盯着医生。上校一直等到医生用病人的尿温热玻璃管，嗅了嗅水蒸汽，对堂萨瓦斯打了个可以的手势。

“ 应该用枪把他打死。’医生对上校说。

“ 有钱人得了糖尿病,是死得相当慢的。”

“ 你已经用你们可恶的胰岛素针狠狠地扎过我了。 ” 堂萨瓦斯说，接着朝自己松软无力的屁股上猛地拍了一下，“ 可是我是一颗啃不动的钉子。 ” 然后，又对上校说：

“ 请进来，干亲家。今天下午我去找你，连帽子也没有碰见。”

“ 我不用帽子,免得碰到谁都得脱帽。”

堂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一只装着血样儿的玻璃管装进外套的口袋里。然后收拾了一下小手提箱。上校想，他是要打算告辞了。

“ 我要是你，就让我的干亲家付十万比索，医生。 ” 上校说，“ 这样你就不致这么忙碌了。”

“ 这件事，我已经对他谈了，不过是让他付一百万。 ” 医生说“ 贫穷是对付糖尿病最好的办法。”

“ 谢谢你的药方。 ” 堂萨瓦斯说，他死劲把马裤往他那肥鼓鼓的肚皮上提着，“ 不过我不能接受，免得使你遭到当富翁的灾难。 ” 医生看见了反射在手提箱的镀镍锁上的他自己的牙齿。他看了看表，没有流露焦急的神情。堂萨瓦斯往脚上套皮靴的时候，不合时宜地问上校说：

“ 喂,干亲家,那只公鸡怎么样了 ?”

上校发觉，医生也在等着他回答。他咬了咬牙。

“ 没什么,干亲家。”上校喃喃地说“ 我想把它卖给你。”

“好极了，干亲家。”他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明智的办法。”

“我已经老了，不适合玩这种玩意儿了。”面对医生的不可思议的表情，上校辩解说，“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许就不同了。”

“你总是像年轻二十岁的样子。”医生回答。

上校恢复了勇气。他等着堂萨瓦斯再说点什么，但是他没有说下去，却穿上一件装着拉锁的皮外套，准备离开卧室。

“你要是愿意,我们下星期再谈,干亲家。”上校说。

“我也是这个意思。”堂萨瓦斯说，“我有一个顾客也许能出四百比索。不过我们得等到星期四。”

“多少?’医生问。

“四百比索。”

“我听说它值得还要多得多。’医生说。

“你对我讲的是九百比索。”上校说，他以医生的惶惑不解做掩护“它是全镇独一无二的公鸡。”

堂萨瓦斯回答医生说：

“要在过去，随便什么人都会出一千比索的。”他解释说，“可是现在，谁也不敢把一只好公鸡投进斗鸡场。在斗鸡场上被人用枪打死的危险是常有的。”他转向上校，带着认真的沮丧表情说：

“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干亲家。”

上校点头表示同意：

“好吧。’他说。

他跟着他们顺着走廊走去。医生应堂萨瓦斯的女人的请求留在了客厅。她向他请教一种药方，“以便治疗那种突如其来而又说不清的疾病”。上校在办公室等着他。堂萨瓦斯打开钱柜，把

所有的衣袋都装了钱，又把四张钞票递给上校。

“这是六十比索，干亲家。”他说，“等你卖掉公鸡后，咱们再结帐。”

上校陪同医生穿过码头上的市场。随着下午的凉爽天气的到来，市面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了。一条满载着甘蔗的平底驳船顺着河水划下来。上校发现医生的神态异乎寻常，令人费解。

“你怎么啦,医生？”

医生耸了耸肩。

“没什么。”他说，“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医生。”

“现在是冬天。”上校说，“我的肠胃也坏了。”

医生用一种毫无职业兴趣的目光看了看他。挨次对坐在自己商店门口的叙利亚人打着招呼。走到诊疗所门口后，上校谈了他对卖鸡一事的想法。

“我没有别的法子了。”他对他解释说，“现在那只公鸡在靠人肉养活了。”

“真正靠人肉养活的动物是堂萨瓦斯。”医生说，“我敢说，他一转手，公鸡能卖九百比索。”

“你相信吗？”

“我相信。”医生说，“这是一项就像他同市长签订的有名的爱国协定那么幸运的生意。”

上校怎么也不相信。“我干亲家签订那个协定是为了保命，”他说，“因此他才能在镇上活下来。”

“也因此他才能用一半的价钱买下被镇长赶出镇的他自己的同党的财产。”医生反驳说。他叩了叩门，因为他没有找到口袋里的钥匙。然后针对上校的怀疑态度说：

“别这么天真。”他说，“堂萨瓦斯对金钱的兴趣远远超过他

自己的生命。”

那天晚上，上校的妻子出去买东西。上校陪她走到叙利亚人的商店，一路思索着医生的话。

“你马上去找小伙子们，告诉他们公鸡已经卖了。”他妻子对他说，“不应该叫他们再存幻想。”

“我的干亲家堂萨瓦斯不到这儿来，公鸡就不能卖。”上校回答说。

他碰见阿尔瓦罗在弹子房参加轮盘赌。这个场所，星期天晚上特别闷热。加上以最大音量播放的无线电广播的颤音，温度似乎更加高了。上校津津有味地观望着五颜六色、引人注目的号码。那些号码写在长长的一条黑色油毡上，由一盏放在桌中心一只箱子上的煤油灯照着亮。阿尔瓦罗押的“二十三”老是输。上校从他的肩上注视着轮盘，他发现“十一”在九轮中有四次中彩。

“押‘十一’吧。”他在阿尔瓦罗耳边悄声说，“它中彩次数最多。”

阿尔瓦罗察看了一下油毡。下一轮他没有押。他把裤兜里的钱掏出来，钱里夹着一张纸，把纸从桌底下递给了上校。

“这是阿古斯丁的。”他说。

上校把秘密传单塞进了衣兜。阿尔瓦罗把钱狠狠地押在了“十一”上。

“开头要少押。”上校说。

“也许这是成功的决心。”阿尔瓦罗反驳说。旁边的一群赌徒把赌注从别的号码上撤下来，纷纷押在“十一”上，这时巨大的彩轮已经开始旋转了。上校紧张得透不过气，他第一次体会到赌博的着迷、惊恐和痛苦的心情。

中彩的号码是“五”。

“对不起。”上校惭愧地说，怀着不可克制的内疚心情盯着刮走阿尔瓦罗的钱的木耙儿，“都怪我多嘴。”

阿尔瓦罗笑了笑，没有看他。

“没关系，上校。再到情场上去碰碰运气吧。”

突然，曼博舞的小号声中断了。赌徒们举着双手散开了。上校听见背后响起一阵步枪上膛时发出的单调、清晰和冷酷的哗啦声。他明白，他口袋里装着秘密传单，已经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警察的包围圈。他没有举手，把身子转了过去。这时他平生第一次从近处看到了向他儿子开枪的人。那个人就在他面前，用步枪口对着他的腹部。他个子矮小，像印第安人，皮肤焦黑，身上发出一股孩子的臭味。上校咬着牙，用手指尖轻轻地把枪管拨开。

“劳驾。”他说。

他面前闪烁着几只蝙蝠般的小圆眼睛。有一瞬间，他觉得他被这几只眼睛吞噬了，嚼碎了，消化了，随即被排出了体外。

“过去吧，上校。”

七

不用开窗子他就知道外面是十二月天气。这是他在厨房里为公鸡的早食剁水果的时候通过自己的骨头感觉出来的。然后他打开了门，院子里的景象证实了他的预感。这是一座美妙的庭院，有草有树，茅厕的小木屋微微地离开地平面，浮动在熹微的晨光中。

他妻子在床上一直呆到九点钟。当她出现在厨房里的时候，上校已经收拾好房间，在跟围着公鸡的孩子们交谈。她必须绕个

弯儿才能到炉灶前。

“你们躲开点。”她喊道，同时闷闷不乐地看了公鸡一眼，“我不知道你几时能离开这只不祥的鸟。”

上校通过公鸡看出了他妻子的情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值得他大动肝火。他已经做好了训练的准备。鸡脖子和鸡大腿的毛已经脱光，呈现暗紫色，鸡冠裂成了几瓣，公鸡的形象显得惨淡，神态孤独可怜。

“你快到窗口来，忘掉那只公鸡吧。”孩子们散去的时候，上校说，“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拍个照该多好。”

他妻子来到了窗前，但是脸上毫无激动的表情。

“我很喜欢种玫瑰花。”她回到炉灶那里去的时候说。上校把镜子挂在叉形支柱上刮脸。

“你要是喜欢种玫瑰花，只管种好了。”他说。

他想使他的动作同镜中的动作协调一致。

“会给猪吃掉的。”她说。

“那样更好。”上校说，“靠玫瑰养肥的猪一定非常好。”

他在镜子里寻找他妻子，发现她的表情依然如故。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面孔仿佛是用炉灶的材料塑造的。上校不由得用眼睛注视着她，继续用手摸索着刮脸，就像许多年来他所做的那样。他妻子思索着，久久地沉默不语。

“因为我不愿意种。”她说。

“好吧。”上校说，“不愿意种，你就不种。”

他的感觉很好。十二月简直使他的五脏六腑枯萎了。这天早晨他打算穿新鞋的时候，觉得很恼火。试穿了好几次后，他明白，怎么试也是白费劲儿，于是他又穿上了他的黑皮靴。他妻子注意到他在换鞋。

“新鞋你要是不穿，永远也不会柔软贴脚的。”她说。

“这是瘫子穿的鞋。”上校不满地说，“鞋，应该穿一个月再卖。”

他兴致勃勃地上街去了，因为他预感到这天下午可能来信。由于还不到船只抵达的时间，他便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去等他。但是别人告诉他说，邮船星期一才能到达。但是他并不感到失望，虽然他没料到这个意外的变化。“船早晚会来的。”他自言自语地说，随后便在一个由一片崭新的光辉造成的奇迹般的时刻向码头走去。

“整年都该是十二月份。”他坐在叙利亚人莫伊塞斯的商店里说，“一个人总觉得自己仿佛是玻璃做的。”

叙利亚人莫伊塞斯要用他那几乎忘却的阿拉伯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是要费点儿劲的。他是一位快活的东方人，甚至连头都裹在一块光滑而笔挺的毛皮里。他像掉到河里似的慌乱不安，好像他真的是从水里救出来的。

“从前是这样的。”他说，“如果现在还是那样，我就会有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八百七十五岁。”上校说，一面用目光追随着管理员。这时他才发现了马戏团。他认出了邮船顶上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中间打着补钉的篷布。有一会儿，他丢开了管理员，把目光转向另一些船只，想在一堆堆箱子中间找到猛兽。但是他没有找到。

“那是个马戏团。”他说，“是十年来到这儿来的第一个。”

叙利亚人莫伊塞斯证实了这个消息。他用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混合语言跟他女人说着话，他女人从店堂的后房里回答着他。他自言自语地做了一番评论，然后把他的担心告诉了上校。

“把猫藏起来吧，上校。孩子们会把他偷去卖给马戏团的。”

上校决定跟踪管理员。

“ 不是一家动物马戏团。’他说。

“ 不管什么马戏团，’叙利亚人反驳说；‘ 为了不把骨头摔断，走绳索的演员是要吃猫的。 ”

上校穿过码头市场跟踪着管理员，一直跟到广场。在那里，斗鸡场上的混乱的喧闹声使他吃了一惊。路上有一个人把他的公鸡的什么情况告诉了他。这时他记起来，今天是预定进行训练的日子。

他匆匆走过邮电所门前，不一会儿就出现在斗鸡场的骚动气氛中。他看见他的公鸡呆在场地中心，孤单单的，无力自卫，鸡爪上裹着布，两腿直哆嗦，显然有几分恐惧。对手是一只忧伤的灰公鸡。

上校一点儿也不激动。两只公鸡接连进行着单调枯燥的对攻。在狂呼乱叫的人群中央，两只鸡用羽毛、腿爪和脖颈一次次地冲撞着。灰公鸡碰着围栏板折回来，原地转了一圈，重新发动进攻。上校的公鸡没有主动进攻。它击退着灰鸡的每次攻击，自己恰好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现在它的腿不哆嗦了。

赫尔曼跳过围栏，用双手抱起上校的公鸡，举着给看台上的观众看。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上校发现，观众的热烈喝彩和斗鸡的紧张场面之间是那么不相称。他觉得这是一出小喜剧，公鸡也—— 自觉自愿地 ——为它的演出尽了力。

上校在一种包含着几分轻蔑的好奇心驱使下扫了一眼周围的观众。一群人兴高采列地从看台上拥向斗鸡场地。上校看到了一张张热烈、焦急和极其激动的面孔上流露出的惶惑不解的表情。这是一批新观众。全是镇上的新观众。他脑海中被忘却的一个瞬间复活了。于是他越过围栏，从场地上拥挤的人群中挤开一条

路，走到赫尔曼的平静的眼睛前。两人不眨眼儿地对望了望。

“下午好,上校。”

上校把公鸡从他手里拿过去。“下午好。”他喃喃地说。他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公鸡的心脏的温热而深沉的跳动使他发抖了。他觉得，他手里从没有过一件如此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你没有在家。”赫尔曼慌乱不安地说。

又一阵喝彩声打断了他。上校感到恐惧，被掌声和叫喊声弄得心神不定，谁也不看就又挤入人群，把鸡挟在腋下冲到街上去了。

全镇的人——在底层的——都走出来看他走过，后面跟着一群学校的孩子。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爬到一张桌上，脖颈上缠着一条蛇，在广场的一个角上私自卖药。为数众多的一群人从码头上回来，停在那里听他叫卖。但是当上校带着公鸡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便转向了他。他觉得回家的路从没有这么长。

他不感到后悔。很久以来镇子就处在一种昏睡的状态中，被十年的动乱破坏了。这天下午——又一个没有信的星期五——大家已经醒来了。上校想起了另一个时代。他看见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和儿子打着雨伞观看一次斗鸡的场面，尽管不住地下雨，比赛照样进行。他还记起了他的党的领导人：他们仔仔细细地梳洗过，在他家的院子里随着音乐的节拍扇着扇子。他肠胃里的痛苦的鼓声几乎又响起来了。

他穿过与河流平行的街道，在那里碰到了先前竞选时的星期天的喧嚣的人群。他们在观看马戏团卸车。一个女人从一家店铺里喊了一句什么与公鸡有关的话。上校神情沉思地一直走到家，但是零乱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响，仿佛斗鸡场上的欢呼声的回音

在追逐着他。

在家门口，他冲孩子们叫起来。

“都回家去！”他说，“谁要是进来，我就用皮带把他打出去。”

他插上门闩，径直向厨房走去。他妻子困难地喘着气从卧室里走出来。

“他们硬把公鸡拿走了。”她大声说，“我对他们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许他们把公鸡拿走。”上校把公鸡拴在炉灶的架腿上，一面听着他妻子的狂怒的声音一面换了小筒里的水。

“他们说，要踩着我们的尸体把公鸡带走。”她说，“他们还说，公鸡不是我们的，是全镇的。”

直到侍候完了公鸡，上校才站到他妻子的忧伤的面孔前。他毫不惊奇地发现，那张面孔既不使他感到痛苦，也不使他觉得同情。

“他们做得对。”他心平气和地说。然后摸了摸衣兜，用一种深不可测的温柔口吻补了一句：

“公鸡不用卖了。”

他妻子跟着他进了卧室。她觉得他心肠非常好，但是叫人摸不透，好像看见他在银幕上活动似的。上校从衣柜里取出一叠钞票，和衣兜里的钱放在一起，点了总数，放进了衣柜。

“这儿有二十九比索，准备还给我们的干亲家堂萨瓦斯。”他说，“其余的欠款，等退职金下来再还他。”

“要是下不来呢？”他妻子问。

“会来的。”

“可是，倘若下不来呢？”

“下不来就不还他。”

他在床底下找出了他的新鞋，又回柜子去找纸盒子。他用一块破布擦了擦鞋底，把鞋放进纸盒里，就像星期日晚上他妻子带来的时候那样。他妻子没有动弹。

“把鞋退掉吧。”上校说，“还欠我们的干亲家十三比索。”

“他们不会退的。”她说。

“他们应该退。”上校反驳说，“我只穿过两次。”

“土耳其人不理解这种事情。”

“他们应该理解。”

“要是不理解呢？”

“不理解就不理解。”

没有吃晚饭他们就躺下睡了。上校等着他妻子念完她的玫瑰经，好把灯熄掉。但是他睡不着，听见了平价电影的钟声，几乎紧跟着——三个钟头以后——响起了宵禁灯号。他妻子的困难的呼吸，由于黎明的冰冷空气变得更痛苦了。当她用平静的、安宁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上校的眼睛还睁着。

“你醒了。”

“是的。”

“你要认真考虑一下。”他妻子说，“明天跟我们的干亲家堂萨瓦斯谈谈。”

“他星期一才能回家。”

“那就更好了。”他妻子说，“这样，你可以有三天的时间进行考虑。”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上校说。

十月的富有粘性的空气已经被一种温和的新鲜空气所取代。上校又在鹭鸶的时间表上认出了十月。两点的钟声响的时候，他还没有入睡。但是他知道他妻子也醒着。他想在吊床上换一下姿

势。

“你失眠了。”他妻子说。

“是的。”

她想了一会儿。

“我们没有条件指望那个。”她说，“你想想看，四百比索一共是多大一笔钱。”

“过不了多久退职金就会下来的。”上校说。

“十五年来你总是这么说。”

“所以说，”上校说，“它不会拖很久了嘛。”

他妻子沉默了。但是她重新说话的时候，上校觉得时间没有流逝。

“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那笔钱永远也不会来的。”她说。

“会来的。”

“要是不来呢？”

上校没有找到话回答。听见第一声鸡叫的时候，他猛然惊醒，但是他随即又陷入了深沉、安定、毫无烦恼的梦境。等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他妻子还在睡。上校比往常晚两个小时有条不紊地做完了他早晨的活计，然后等着他妻子起来吃早饭。

他妻子神秘莫测地起了身。彼此问了早安，坐下来默默地吃早饭。上校喝了一杯黑咖啡，吃了一片干酪和一块甜面包。在成衣店度过了整个上午。一点回到家，碰见他妻子在海棠花间补衣服。

“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上校说。

“没有午饭。”他妻子说。

上校耸了耸肩。他设法把庭院围墙的缺口堵上，免得孩子们

钻进来到厨房里去。回到廊道里来的时候，饭菜已经摆好。

吃中饭的过程中，上校明白他妻子在竭力克制着眼泪。他相信这一点，不禁感到惊异。他了解妻子的性格，她一向是刚强的，经受过四十年的痛苦折磨显得更加刚强了。她儿子的死亡没有使她流一滴眼泪。

他用责备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她咬了咬嘴唇，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继续吃饭。

“你是一个粗鲁的人。”她说。

上校没有言语。

“你是个古怪、固执、粗鲁的人。”他妻子重复说。她把餐具横在菜盘上，但是马上又迷信地纠正了摆放的位置。“我吃了一辈子泥土，现在却落得还不如一只公鸡重要。”

“不是一回事。”上校说。

“是一回事。”他妻子反驳说，“你应该明白，我快死了，我的情况已经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挣扎了。”

直到吃完午饭，上校都没有说话。

“要是医生对我担保卖掉公鸡可以消除你的哮喘病的话，我立刻就把它卖掉。不然的话，我就不卖。”

这天下午，他带着公鸡到斗鸡场去了。回来后发现他妻子的病情加重了。她在廊道里来回踱着步，头发披散在背上，手臂向两边张开，不顾肺脏的呶哨声拚命喘着气。她在廊道里一直呆到傍晚。然后，她没有对她男人说话就躺下了。

她低声地念诵着祷词，直到宵禁号响过一会儿以后。这时上校准备熄灯。但是她不同意。

“我不愿意在黑暗中死去。”她说。

上校把灯放在地上，顿时觉得疲惫不堪。他希望忘掉一切，

一下子睡上四十四天，到一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在斗鸡场上醒来，恰好在放出公鸡的时刻。但是他知道，他受着他妻子的监视的威胁。

“还是过去那样的历史。”过了片刻她开口说，“我们在挨饿，为的是让别人有饭吃。四十年来，历史一直是这样。”

上校保持着沉默，直到他妻子中断话头问他是不是醒着。他回答说是的。他妻子又用一种平滑、流畅、毫不容情的声调接下去说：

“全镇的人都用公鸡赢得了钱，我们却例外。只有我们连做赌的一分钱也没有。”

“公鸡的主人有权得到百分之二十。”

“人家叫你为竞选卖命的时候，你也有权得到一个职位。”他妻子反驳说，“你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内战之后，也有权享受退职金。可现在全镇人的生活都有保障，你却孤孤单单，忍受着致命的饥饿。”

“我不孤单。”

他想做什么解释，但是他困得支持不住了。他妻子还在不住地低声说着，直到发觉他男人睡觉了。于是她钻出蚊帐，在黑暗的客厅里踱步，嘴里仍然在说着什么。天亮的时候，上校呼唤她。

她出现在门口，像个幽灵，被地上的奄奄一息的灯光照射着。在进蚊帐之前，她把灯熄了。但是她仍然没有住口。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上校打断她说。

“唯一的办法是把鸡卖掉。”他妻子说。

“也可以卖钟。”

“没人买它。”

“明天我设法让阿尔瓦罗付我四十比索。”

“他不会给你的。”

“那么,就把画儿卖掉。”

他妻子重新说话的时候，又一次钻出了蚊帐。上校感觉到了她那充满草药味的气息。

“人家不会买的。’她说。

“明天再说吧。”上校温和地说，声音一丝未变，“现在你该睡了。如果明天什么也卖不掉，再想别的办法。”

他想让眼睛睁着，但是倦意压倒了他，使他坠入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深渊。在这样的深渊里，他妻子的话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但是过了片刻，他觉得有人在摇动他的肩膀。

“回答我的话。”

上校不知道是睡梦前还是睡梦后听到这句话的。天渐渐亮了，窗子的轮廓出现在星期日的绿色晨曦里。他想，他身上发烧了。他的眼睛仿佛在燃烧，他不得不使出巨大的力气使头脑清醒。

“如果什么也卖不掉，那怎么办呢？”他妻子重复道。

“那就等到一月二十日再说。”上校说，已经完全清醒，“百分之二十将在那天下午付给。”

“公鸡赢了才行。”他妻子说，“可是，万一输了呢。你没有想到公鸡是可能输的。”

“这是一只不会输的公鸡。”

“但是,你假设它输的话。”

“这样考虑问题的时候还不到，还差四十五天呢。”上校说。

他妻子绝望了。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吃什么呢？”她问。她揪住上校的法兰

绒上衣领，使劲儿摇着他。

“告诉我，我们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他生命的七十五个年头，一分钟一分钟地度过的七十五年，才达到了这个时刻。他觉得自己是纯洁的，直爽的，不可征服的，于是他回答：

“吃屎。”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李德明　蒋宗曹译
尹承东校

一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濛濛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二十七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星期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星期，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圆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出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六点零五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他像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二月

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濛濛细雨，正像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样，穿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星期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三五七型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削断。在打鹌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七点七七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三百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瞄准器的二二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像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好奇而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搂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像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舍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

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打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林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做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

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磨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他是我的心头肉。”

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度过了二十一周岁。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

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星期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是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自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的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止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看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星期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像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唯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八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膳，几只狗喘着气围

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像每个星期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一杯搀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头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卧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林，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在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温顺的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命令道。“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在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了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给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村人从梦中唤醒。

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住房。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次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空建了一个木制阳台，三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

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口。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向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但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像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并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过去，她终于承认，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五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也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像

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传来阵阵欢快的汽笛声。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 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打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村里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 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 此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灭。在扁桃树的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像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

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像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的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像是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星期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了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分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

弟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他们简直是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广场。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像一条龙似的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画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像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一点没有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那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像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林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

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了婚礼，和我一起呆到将近四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还有四头小牛犊，这四头牛犊被新郎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二百零五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两千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

“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元。

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要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作木薯饼，圣地亚哥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

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时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像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十一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唐·拉萨罗·萨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也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有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像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三点起就酝酿着的悲

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座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食品。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就变得和他的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在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星期日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名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

“撤掉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对妈妈说了。“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

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吊唁仪式时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睡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要杀死他儿子，可唯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理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

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

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不齿于人类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拥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

“您不必麻烦了，路易沙·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

二

那个休掉妻子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八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趣。他大约有三十岁光景，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的身材像斗牛士那样细瘦，长着一双金色眼睛，皮肤被硝石长年烘烤而变成古铜色。他身穿一件短大衣和一条非常瘦窄的裤子，都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像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八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讲，“这个奇怪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人们都说他很迷人，但是我却看不出。”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在举行婚礼前不久，有人实在憋不住，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所以走村串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可能是真情，不过，随便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姿态，与其说是想说明点什么，还不如说是想掩盖点什么。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工程

师，说是在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还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星期天，做过弥撒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像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巴亚多·圣·罗曼不仅什么都能干，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十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星期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写过两次信，但对巴亚多·圣·罗曼却只字未提，即使在巴亚多打算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等她认识了巴亚多的时候已来不及修改十月信中的说法了，她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我觉得他像个魔鬼，"她对我说，"你亲自对我说过，这类事不要写在信里。"

我认识巴亚多·圣·罗曼比母亲要晚一些，是在我回家来度圣诞节假的时候认识的，我并不觉得他像人们说的那样奇怪。我认

为他确实有魅力，但远不似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说得那么理想。看上去他很顽皮，过分的诙谐掩饰不住他内心的不安，可我却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些。但我更认为他是个忧郁的人。那时他已经和安赫拉·维卡略正式订婚。

关于他们是怎样相识的，一直没有人说得清楚。据巴亚多·圣·罗曼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九月末的一天，巴亚多正在摇椅上睡午觉，这时安赫拉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走过广场。巴亚多·圣·罗曼当时半醒着，看到了这两个身穿重孝的女人。在下午两点的沉寂中，那儿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活人。巴亚多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告诉他，那是同她走在一起的女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略。巴亚多一直目送她们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的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的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等我醒来时，"他嘱咐说，"请提醒我，我要跟她结婚。"

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在巴亚多·圣·罗曼向她求爱之前，公寓老板娘就对她讲了这段插曲。"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但另有四个人却不相信是真的。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所有人都说安赫拉·维卡略和巴亚多·圣·罗曼是在十月国庆期间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次见面的。安赫拉·维卡略在晚会上担当唱彩票的差事。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后，直奔全身重孝、神情凄楚的安赫拉照管的柜台，并且问她那镶有珍珠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这乐器无疑是集市上最诱人的东西。姑娘回答他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为了摸彩。

"那更好，"他说。"这就更好办了，而且会很便宜地弄到手。"

安赫拉·维卡略向我坦白说，巴亚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由于爱，而是别的原因。“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傲慢。”她在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时，这样对我说，“此外，我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她在焦急等待的众人面前唱出了手摇唱机的彩票，结果真的是巴亚多·圣·罗曼中彩，这使她更加反感了。真是难以设想，仅仅是为了打动她的心，他买下了全部的彩票。

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回家时，发现手摇唱机已经用彩纸包着，并且系了一根丝带，放在她家里。“我怎么也想不出他是怎样知道我的生日的。”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让父母相信，她绝没有给巴亚多·圣·罗曼提供任何理由让他送来这件礼品，更没有同他做过什么招摇过市的事情。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彼得罗和巴布洛，把手摇唱机拿到饭店准备还给它的主人，他们办事情是那样迅速，结果谁也没能得知手摇唱机的风波。这家人唯一没考虑到的是巴亚多·圣·罗曼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对孪生兄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重新露面，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手里不但拿着手摇唱机，而且还把巴亚多·圣·罗曼带到家中继续寻欢作乐。

安赫拉·维卡略家境清苦，她是这家人家的小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略是个穷金银匠，为了维护店子的声誉，他是那样精心制作金银首饰，最后双目失明了。她的母亲普里西玛·德尔·卡门，婚前一直做小学教员。她那温顺而略显忧伤的面容，把她的严厉性格掩饰得一丝不露。“她像个修女。”梅尔塞德斯回忆说。她以如此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服侍丈夫和养育子女，以至于使人常常忘记她还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结婚。除了一对孪生兄弟之外，中间还有个女儿，是害疟疾死的，已经过去两

年，亲人们在家中仍然为她穿着简孝，上街时则是一身重孝。妈妈教育两兄弟长大后要像个男子汉，教育女儿们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钩花边、洗熨衣服、做绢花和什锦甜食，还会撰写信函。当时的姑娘们对悼念死人的礼仪已漠不关心，可这家的四个姑娘却不同，她们熟悉昔日的知识，知道如何守护病人，安慰临终的人和为死者穿寿衣。我母亲唯一看不惯她们的是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她们说，“不要在夜晚梳头，这会倒霉的。”除此之外，她觉得没有比她们更有教养的女孩子了。“真是些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随便哪个男人找她们做妻子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任劳任怨。”不过，同两个大女儿结婚的人，却难以打破她们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在跟男人打交道时，随时提防他们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略在四姐妹中长得最俊俏，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生下来时，脐带是绕在脖子上的。但她总是神态恍惚，精神萎靡，这预示着她前程未卜。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期时都看到她，她在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迷茫，下午她坐在那儿制作绢花，和邻居的女人们一起唱姑娘们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圣地亚哥·纳赛尔对我说：“你的这个傻表妹瘦极啦。”在她为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在街上同她不期而遇，第一次看到她穿得非常漂亮，还烫了发，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发显得萎靡不振，没有生气了。因此，当获悉巴亚多·圣·罗曼打算和她结婚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外乡人是在开玩笑。

可是安赫拉·维卡略全家不仅对他的求亲信以为真，而且兴高采烈。只有普拉·维卡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坚持要巴亚多·

圣·罗曼出据他的身份证明。直到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对于他的历史，人们最多只了解那天下午他穿着艺术家的衣服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只字不谈，甚至他是否是个疯疯癫癫的怪物也不知道。据说，他曾指挥军队夷平过一些村镇，在卡萨雷纳河一带播下一片恐怖；还传说他是卡晏的逃犯；有人甚至看到他在巴西的佩南布科州想用两只驯服的狗熊发财；也有人说他在宾托斯运河打捞出一条装满金子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多·圣·罗曼为了使这种种揣测不攻自破，把全家人带来了。

他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调皮的妹妹。他们是乘坐一辆福特牌T型汽车来的，上边有正式的牌照，那嘶哑的喇叭声在上午十一点钟惊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他母亲阿尔贝达·希蒙特斯是个又高又大的库拉索岛黑白混血女人，她讲的西班牙语掺杂着不少那个岛的方言，她年青的时候曾被宣布为安的列斯群岛两百个美女中的第一号大美人。他的两姐妹正值青春年华，犹如两匹永不安静的小母马。但是，家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并且由于在图库林卡大难中解救了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成了保守党政府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当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我母亲是唯一没有去向他致意问候的人。“我觉得他们结婚很好，”她对我说，“但是结婚是一回事，而解救一个向赫里内尔多·马尔盖斯打暗枪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因为这个名人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他身穿金黄色的麻布衣衫，脚蹬交叉系着带子的科尔多瓦靴子，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并用一条银链系在坎肩的扣眼上。他的翻领上戴着“勇士奖章”，手持一把手杖，把柄上雕刻着国徽图案。他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由于我们这

里道路不佳，他身上盖满了一层灼热的尘土。当大家看到巴亚多·圣·罗曼也同车而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他随便要同哪个姑娘结婚都能如愿以偿。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魅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他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们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

“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

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维卡略却不同一般，由于巴亚多一再催促，他们只恋爱了四个月时间，之所以没有再短，是因为普拉·维卡略坚持一定要等待过了家里的丧期。不过，由于巴亚多·圣·罗曼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时间还是绰绰有余。“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幢房子。”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答他说，镇里最漂亮的房子是鳏夫希乌斯的别墅。”要是我，也会这样回答的。那幢别墅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微风习习，凉爽宜人；站在屋顶平台上，只见那广阔无垠的沼泽地上，盖满一层深紫色的银莲花，宛如极乐世界；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勒比海水平线和载着卡塔赫纳游客的远洋巨轮。巴亚多·圣·罗曼当天晚上便去社会俱乐部，并且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坐下来，玩了一局骨牌。

“老光棍，”巴亚多·圣·罗曼对希乌斯说，“我想买下您的房子。”

“房子不卖。”希乌斯说。

“我把房子连同里边的东西一起买下。”

鳏夫希乌斯按照古老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对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花费了一生的心血置办的，对他来说，那仍然是她的组成部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玩骨牌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我肯定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卖掉一所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的房子。”巴亚多·圣·罗曼也理解他的心情。

“这样好了。”他说，“您只把空房子卖给我吧。”

但是，直到那局骨牌玩完，老鳏夫还没有松口。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多·圣·罗曼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又回到了骨牌桌旁。

“老光棍，”他又重新谈起这件事，“您的房子值多少钱？”

“没有价。”

“随便开个价吧！”

“很遗憾，巴亚多。”老鳏夫说，“你们年青人不懂得老人的心事。”

巴亚多·圣·罗曼丝毫没有思索老人的话。

“就算五千比索吧。”他说。

“您倒真痛快，”老鳏夫庄严而警惕地回答道，“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给您一万比索，”巴亚多·圣·罗曼对他说，“就这样说定了，马上付款。”

鳏夫看了看巴亚多·圣·罗曼，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他是由于极度气恼而哭了，”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他除了当

医生外，还是个文学家。“你想想，这么一笔巨款，伸手可及，然而由于精神脆弱却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说不出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接受。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下忙，’巴亚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会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个月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多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唯一祈求于上帝的是给我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地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唯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目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是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

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唯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以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作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一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二十四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

中兴致勃勃地拉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人们坐在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唯一料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安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娘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人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了桔花，这件事

后来被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唯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的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十四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都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撒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朦胧的气氛中，新娘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

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九千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决不能在别人面前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

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四十五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在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在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被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事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姐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像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条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

像货郎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疮木手杖—— 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的—— 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六点钟，正式仪式结束，贵宾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启航后，自动钢琴奏出的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了狂舞的人群。最后他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五个小时之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

女儿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十一时。大概十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人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的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像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着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

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做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大好人。”

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孪生兄弟接近三点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

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像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来，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他是谁。”

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像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她说。

三

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一定会说他们是为维护荣誉而杀人。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伯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精疲力尽，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尚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但是，我们是无罪的。”

“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这是一件荣誉的事。”

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理好。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儿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像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赛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呆到两点钟。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溜达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说。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那是唯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

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事前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用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十英寸，宽二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二十二个人声称维卡略兄弟俩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唯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三点二十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星期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他们一般都是在星期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我想他们是喝醉了。”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星期一。

“谁不知道是星期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只是来磨磨刀。”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像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鐾了几下，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

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被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条牛的奶，那就更不敢下手了。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屠夫说。“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波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牴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六点开始又变成了酒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

为止。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三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四点十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就是弄一船石油来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像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是关着的。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过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

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抹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她对他们是那样地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他们还像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

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别是杀像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

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对警察可能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四点差几分钟起床的。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利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像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主教该怎么想呀？”

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新港”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五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找到了维卡略兄弟。“我

看到他们时，以为他们只是说大话吓唬人。”上校按照他个人的逻辑推理对我说，“因为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烂醉如泥。”他几乎连问都没有问他们要干什么，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叫他们回去睡觉。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就像在惊恐不安的妻子面前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上校对两兄弟说，“如果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呀！”

维卡略兄弟俩离开了牛奶店。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镇长轻率地处理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失望，因为她觉得镇长应该把孪生兄弟关起来，直到把事情搞清楚。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把屠刀拿给她看了看，就算了却了此事。

“他们已经没东西杀人了。”上校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而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凭着她的直觉看出了这个问题。她敢肯定，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可是拉萨罗·阿蓬特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上校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醒圣地亚哥·纳赛尔。好，新年好。”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大概会永远记着拉萨罗·阿蓬特那副使她有点讨嫌的矮胖的样子，可是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幸运儿留在记忆里，尽管他由于偷偷搞那种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而有点神魂颠倒。他那个星期一的举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办事轻率。事实是，直到在码头上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他才记起了他，那时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十分得意。

维卡略兄弟俩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十二三个去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以前早已把事情传得家喻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入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四点，她看见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十二英寸长，三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像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作的案，两把刀都很粗笨，并且用过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六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象，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维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十一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见

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像往外尿玻璃渣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

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狂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天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开，当他们从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星期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

“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过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见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你们可要好好当心。”她对他们说。

因此，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觉得孪生兄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给他们上了一瓶烈性白酒，企图最后打掉他们杀人的念头。“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孤单！”彼得罗·维卡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和换上新刀片的刮胡刀，可是他却用剔肉刀刮了胡子。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那是男人的一种野性。“他像电影里的暴徒。”她对我说。后来彼得罗·维卡略亲口告诉我说，这事是真的，他是在军营里学会用剃头刀刮脸的，这种习惯一直没能改变。可他的哥哥则谦恭地借了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刮胡刀刮了脸。最后，他们俩默默地、慢吞吞地将那瓶酒喝完，睡眼惺松地看着对面那幢房子的紧闭着的窗户。此时，有些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并不需要的牛奶，询问一些店里没有的食品，实际上是想看看维卡略兄弟是否真的在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要把他杀死。

维卡略兄弟大概一直没有看见那扇窗户透出灯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四点二十分回家的，但是他不必开灯就可以到卧室

去，因为楼梯的灯是彻夜不熄的。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了。当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上楼叫他去迎接主教时，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的。我们一起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一直呆到三点过后，那时她亲自打发走乐师们，将庭院里舞场的灯全部熄灭，让她的卖笑的女人们单独回房间休息。这些舞女已经劳累了三天三夜，开始是偷偷地招待那些上宾，其后是公开地来到我们跟前，同我们这些比贵宾低一等的人调情。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这个女人，我们应该说，只要和她睡上一次觉死了也甘心，我从未见过那样标致、那样温存的女人；她是最会向男人献殷勤的，但是，她也是个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所谓"这里"就是指她办的一所公开的妓院，有几间供租用的房子。还有一个供跳舞用的大庭院，那儿悬吊着从帕拉玛里波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形如大圆瓜的灯笼。是她毁掉了我们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学的多得多，而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比一张空床更可悲的地方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第一次见到她就神魂颠倒了。我提醒他："秃鹰抓苍鹭，不知是祸福。"可是他没有听进我的话，他被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迷魂汤灌得晕头转向。他完全被她迷住了，在他十五岁时，她成了他寻花问柳的导师，直到易卜拉欣·纳赛尔揍了他一顿皮带，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且关进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达一年多之久，才算把他们拆散。那以后，他们依然感情很深，但那是严肃的，已经没有爱情纠葛了。她是那么尊重他，只要他在，绝不撂下他而去陪其他嫖客。在最近那次假期里，她托辞劳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把我们早早打发走，但是大门并不上栓，走廊里还留下一盏灯，为的是让我偷偷

地回去。

圣地亚哥 ·纳赛尔有一种几乎是神奇的化装本领，他最喜欢将舞女们装扮成另外的样子。他常常将一些女人的衣服抢出来给另外的女人穿上，这样每个女人都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变成了别的女人的相貌。一次，有个女人为自己被打扮得和另一个一模一样而痛哭一场。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一样。”可是那天夜里，马利亚 ·阿莱汉德里娜 ·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 ·纳赛尔最后一次高高兴兴地变他的戏法，借口说那次不愉快的回忆使她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们拉着乐队到大街上游逛演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略兄弟等着圣地亚哥 ·纳赛尔准备把他杀害时，我们正在娱乐。快四点钟时，正是圣地亚哥 ·纳赛尔出主意叫我们登上老鳏夫希乌斯住的小山为新婚夫妇演唱。

我们不仅在窗下为他们唱了小夜曲，而且在花园里燃放了焰火和鞭炮，可是我们觉得别墅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想到里面没有人，特别因为新汽车就停在门口，车篷还折叠着，为婚礼挂上的彩带和蜡制柑桔花完好地摆放着。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当时像个专业乐师似的弹奏着吉他，他为新婚夫妇即兴演奏了一首夫妻打趣的歌曲。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而是明月当空，空气清澈，山下墓地中磷火在闪动。另一边，远远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和荒凉的沼泽地，天边的加勒比海波光粼粼。圣地亚哥 ·纳赛尔指着一盏导航灯，告诉我们那是遇难者的鬼魂，因为有一艘满载塞内加尔黑奴的轮船沉没在卡塔赫纳港湾里。无法想象他心中有什么不快，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安赫拉 ·维卡略的短暂婚姻生活在两个小时之前已经结束了。巴亚多 ·圣 ·罗曼是徒步将妻子送回她父母家里的，免得汽车马达声过早地宣布

他的不幸；他又孤单一人了，在老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坐守漆黑无灯的空房。

当我们走下山时，我弟弟邀请我们到市场饭店去吃炸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边走去，路上看到旧港一带穷人下榻的小客栈开始亮起灯来，他在拐过街角之前，摆摆手向我们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他家的后门同圣地亚哥·纳赛尔告别的，他们商定过一会儿在码头会面。当狗听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家门时，像往常一样，汪汪地叫起来，但是他在暗影里摇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当他穿过厨房间卧室走去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正在炉灶上照看着咖啡壶。

“白人，”她叫住他说，“咖啡就好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稍等一会再喝，并且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给他送一件和身上穿的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躺下，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就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打发讨奶的乞丐婆送来的口信。五点半她按时叫醒了他，不过她没有打发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亲自拿着亚麻布衣服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的，因为她时刻都警惕着不让女儿落入贵人们的魔掌。

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穿过走廊——妓女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中间——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卧室。房间里没有灯光，可是我一进去马上就嗅到了女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看到了黑暗中那双失眠“母狮子”的眼睛，随后我便心荡神移地忘掉了一切，直至教堂的钟声哨哨地响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走进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买香烟。他喝得太多了，因此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一直模糊不清，可是他从没有忘记彼得罗·维卡略让他喝一杯酒，那杯酒几乎要了他的命。“纯粹是惩罚我。”他对我这样说。巴布洛·维卡略正在打盹儿，我弟弟进去把他惊醒了，他便将刀拿出来给我弟弟看。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说。

我弟弟却记不清他讲过这句话。“即使我记得他说了这句话，也不会信以为真。”他多次这样对我说。“鬼才想到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更不用说是用杀猪刀去杀人啦！”接着两兄弟问我弟弟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因为他们曾看见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呆在一起。我弟弟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和维卡略兄弟听了他的回答异常惊愕，此事在预审时两兄弟分别作了供认，并记录在案。据他们声称，我弟弟当时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死了。”随后，我弟弟为主教祝了福，身子碰到门框上，趔趔趄趄地走了出去。在广场中央，他遇到了神父阿马多尔。阿马多尔身穿法衣，正向码头走去，后面跟着个辅祭，手敲小铃铛，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做露天弥撒而准备的。一看到这些人走过去，维卡略兄弟在胸前画了十字。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讲，当神父若无其事地从她家门前走过去时，维卡略兄弟大失所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不过，许多年以后，当神父阿马多尔在卡拉弗尔神秘的疗养院隐居下来时对我透露说，实际上他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口信和别人的告急信，当时他正准备到码头去。“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的事，而是民政当局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顺路把事情告诉普

拉西达·里内罗。”不过，在穿越广场时，他已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您应该理解这一点。”他对我说。“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主教要来。”在杀人的那一瞬间，神父感到那样绝望，那样卑视自己，除了叫人敲钟报警之外，什么也没有想到。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是从厨房的门走进家去的，我妈妈怕爸爸听到我们回来的脚步声特意没有闩门。路易斯睡觉之前去上厕所，但是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当我另一个弟弟哈依梅起床去上学时，看见他脸朝下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中哼着歌。我那个修女妹妹不去迎接主教，因为头一天的醉意未消，她叫了好长时间也未把路易斯叫醒。“当我去厕所时，钟正敲五点。”她对我说。后来，当我妹妹玛戈特进去洗澡准备去码头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路易斯拖到卧室去。在睡意朦胧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拉响了头几声汽笛。后来由于彻夜唱歌跳舞，累得精疲力尽，便酣然入睡了，一直睡到我的修女妹妹一边急急忙忙穿着法衣，一边闯进卧室，发疯般地把他唤醒：

“他们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杀死了!”

四

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过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像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星期一的混乱中，阿蓬特少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做初

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了。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依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

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

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依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像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

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一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少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手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星期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作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像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唯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六十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对我说，“他最多只能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十

二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少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过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像缝大包似的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星期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像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食物：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

吃上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之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咯吱咯吱嚼个不停，嚼得半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了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的情况，脱口而出道："我好像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少校的命令修建的，少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晚上，由于乐师们之间发生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

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法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至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虽累却不能躺在床上，同样也不能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腹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少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

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初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到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带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植牛至草和茄子，他们唯一的癖好是玩纸牌。成年人还像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少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孪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在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星期二凌晨三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们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少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走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

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了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忏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可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像家里人那样在夜间被转移，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着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像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星期六的月蚀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

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

他带上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篷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侧破门而入，察看了由月蚀的余光依稀照亮的各个房间。“屋里的东西好像是搁在水底下似的。”镇长对我这样讲。巴亚多·圣·罗曼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仍然和星期二清晨普拉·维卡略看见他时那样，身着那条考究的裤子和丝绸衬衣，但没有穿鞋。地上扔满了空酒瓶，床边还有更多的没有打开的酒瓶，但是没有一点吃食。“他是严重的酒精中毒。”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对他进行了急救。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恢复过来了，一有知觉，他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人打发了出去。

“谁也别来扯淡，”他说。“就是我的亲爸爸也别来管我。”

镇长把这件事用加急电报报告了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在电报中连将军儿子说的最后那句话也一字不少地写了进去。圣·罗曼将军可能完全顺从了儿子的意志，因为他没有来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们来的，另外还来了两个成年妇人，看来是将军的姐妹。她们乘的是货轮，她们为巴亚多·圣·罗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头散发。在登岸之前，他们脱掉鞋子，在中午滚烫的土路上赤脚穿过大街，向小山走去。她们不时地揪抓头发，放声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仿佛是由于高兴而发出来的。我站在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装出那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他更

大的羞耻事。

拉萨罗·阿蓬特少校陪同她们去了山上的别墅，过了一会，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他紧急出诊时骑的骡子来了。当炎热稍退的时候，镇上的两个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将巴亚多·圣·罗曼抬下了山，他的整个身子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群哭丧妇跟在后面。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认为巴亚多·圣·罗曼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惨呀！”

由于酒精中毒，巴亚多·圣·罗曼再次昏迷过去，但是很难相信抬着的还是活人，因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亲多次把它放到吊床里，可是马上又耷拉下来，结果从悬崖边到轮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长道印迹。那是巴亚多·圣·罗曼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来。每当休假时，在狂欢的夜晚，我都和弟弟们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遗弃的房舍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那是结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和她母亲要的，不过我们根本没有重视它。里面装的看来都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用品。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略告诉了我，为了骗过她的丈夫，别人教给了她一套产婆用的法子，我这才知道了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个只过了五小时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东西。

过了些年，当我回去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最后一些材料时，连约兰达·德·希乌斯珍贵的遗物也不复存在了。尽管拉萨罗·阿蓬特少校再三叮咛要对这幢房子严加看守，可是里面的物品还是渐渐地不翼而飞，包括有六块穿衣镜的大衣橱。这衣橱由于从门口抬不进去，蒙帕斯的歌唱家们只好在房子里边组装它。老鳏夫希

乌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她的阴魂自己会来拿走的，因而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为此，拉萨罗·阿蓬特少校曾耻笑过他。可是，一天晚上少校突然想到要举行一次招魂弥撒，以澄清家具等物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据说，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亲自向他证实，确实是她通过那件人命案来索回她在幸福的生活中使用过的用品的。别墅开始损坏了。门前新婚夫妇的汽车渐渐地被糟蹋坏了，最后只剩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破烂不堪的空车皮。多年以来，对这汽车的主人的情况一直不得而知。预审档案上有他的一条供词，但是简短、一般，看来是最后一刻在别人的建议下按例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做的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年以后，他带着敌视的目光接待了我，断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有助于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说实在的，关于他，就是他的父母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多，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而看上去除了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结婚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关于安赫拉·维卡略，我却一直不断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从而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个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过一些日子，想说服最后几个她所崇拜的人入教，在那个被加勒比海水环抱的村子里，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谈。她母亲把她送到那里，目的是使她与世隔绝。“你的表妹问候你。”我的妹妹玛戈特总是这样对我说。她头几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维卡略，她说家里给安赫拉购置了一幢简陋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海风能时常迎面吹来，唯一的问题是，在夜晚海水涨潮时，厕所的粪水常常漫溢出来，黎明时海鱼在卧室里乱蹦乱跳。那期间所有看见过安赫拉的人都说她在全神贯注地、熟练地用机器绣花，在忙碌中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许久以后，确切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我想了解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带的村镇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偶然来到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边一幢房子的窗前，有个女人在用机器绣花，那时天气很热，她半穿着丧服，戴着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头发已开始花白，头的上方挂着一只鸟笼，一只加那利小鸟不住地歌唱着。看见这个女人这般模样坐在富有诗意的窗户里，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终竟是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确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像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像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像我记忆中那么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像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我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和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

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像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一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但是，在这个镇里，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十四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再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

所有其他方面的事，及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而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的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

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

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她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呜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挨打，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车花酊药布时，她仍在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想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料。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生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的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宁，她便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他从“港口”饭店

走出去，并说她当时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又写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样语气平静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的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恨。“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星期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的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

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情欲。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星期五下午都来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像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上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如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五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戒规束缚着的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

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了，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了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籽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极的人。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赶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的神气。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二十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①]两天的司令部，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了的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件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

① 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曾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过几次海盗式的远征。

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

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是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罪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

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者的惶恐不安。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玛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很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了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

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弟兄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膊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

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拉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他醉成这个样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他一得知那个传闻，就立刻跑到他的布店门口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便把事情告诉他。此人是同易卜拉欣·纳赛尔最后一批来这儿的阿拉伯人之一，直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去世一直是他的牌友，当时仍是他家的传统顾问。要找圣地亚哥·纳赛尔谈事情，谁也比不上他有威信。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传闻不可靠，那会给圣地亚哥·纳赛尔造成一场虚惊。于是他决定先向克里斯托·贝多

亚问问，他可能知道得更清楚。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过时，雅米尔·沙尤姆叫住了他。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走到广场的拐角上，克里斯托·贝多亚拍了拍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背，然后朝雅米尔,沙尤姆走去。

“星期六见。”他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答他，而是用阿拉伯语对雅米尔·沙尤姆说了一句话，雅米尔·沙尤姆笑得直不起身子，也用阿拉伯语回敬了他。“那是一种双关语，我们经常用它来取乐。”雅米尔·沙尤姆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边走边向他们打手势告别，然后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俩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一听完雅米尔·沙尤姆提供的情况，立刻跑出店子去追圣地亚哥·纳赛尔。他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拐过了广场，可是在开始散去的人群中没有找到他。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好几个人打听，他们的回答都是同样的：

“我刚刚看见他和你在一起。”

他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回到家里，但是他还是走进去问了一下，因为前门没有闩上，是虚掩着的。进去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穿过黑暗的客厅时，他尽量不弄出声响，因为还不到客人来访的时间；但是狗在院子的尽头叫了起来，并且直奔他来。他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这是他从狗的主人那里学来的，——然后走到厨房，狗一直尾随着他。在走廊里，他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拎着一桶水，拿着拖把，准备去擦客厅的地板。她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克里斯托·贝多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来。在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进厨房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刚刚把兔子肉放在炉灶上。她立刻明白了。“她的心都要跳出来啦。”他对我说。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

哥·纳赛尔是否在家，她假装天真地回答说他还没有回来睡觉。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维卡略兄弟正在找他，他们要杀死他。”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不再是天真的样子了。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的。”她说。

“他们从星期六起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正因为喝酒才不会杀人。”她反驳说。“从来没有哪一个醉汉吃自己的大便。”

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了客厅，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把客厅的窗户打开“显然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七点，金色的阳光已经从窗户中射进来。”他又问迪维娜·弗洛尔，是否敢肯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从客厅的门走进家来。这次她不像第一次那么肯定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里内罗，她回答说，她刚刚把咖啡放在她的床头柜上，但是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向如此，七点钟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安排准备午饭。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看表，是六点五十六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证实一下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没有回家。

寝室的房门反锁着，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从他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像对自己的家那样熟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家，而且同这一家人不分内外，于是他推开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门，想从那儿穿过，到隔壁的卧室去。一束阳光照着飞舞的尘埃从天窗里射进来，那个美丽的女人侧着身子睡在吊床上，一只白嫩的手掩着面颊，看上去不像原来那个人。“她像一个仙女。”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他被她的美丽吸引住了，仔细地欣赏了一刻，然后悄悄地穿过卧室，经过浴室，走进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床铺没有动过，熨好的骑马装放在

扶手椅上，衣服上有一顶骑士帽，地上摆着一双靴子，旁边是马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手表放在床头柜上，时针指着六点五十八分。“我突然想到他拿了枪又出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他发现马格南手枪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我还是决定拿着那支左轮手枪送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克里斯托·贝多亚从衬衣内侧把手枪掖在腰带上，只是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以后，他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在他关床头柜的抽屉时，普拉西达·里内罗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门口。

“我的老天！”她叫了起来，“你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克里斯托·贝多亚也吃了一惊。他看见她站在明亮的阳光下，穿着金黄色的云雀图案的晨服，头发蓬乱，令人倾倒的姿色已逝而不见。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些含糊地解释说他是来找圣地亚哥·纳赛尔的。

“他去欢迎主教了。”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主教没下船就走了。”他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说，“这狗娘养的。”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发现克里斯托·贝多亚那时神情尴尬。“但愿上帝饶恕了我，”普拉西达·里内罗对我说，“看到他那样狼狈，我忽然想到他是来偷东西的。”她问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什么事。克里斯托·贝多亚明白自己受到了怀疑，但是他没有勇气道出真情。

“您看，我一分钟的觉也没有睡。”他对她说。

克里斯托·贝多亚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总之，”他对我说，“她总是认为别人在偷她的东西。”他在广场上遇见了阿马多尔神

父，弥撒没有做成，他拿着祭衣正回教堂去。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觉得他除了能拯救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灵魂以外，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再次向码头走去，这时听到有人从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牛奶铺里叫他。彼得罗·维卡略站在铺子的门前，面色苍白，头发蓬乱，敞胸露怀，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他自己用钢锯条改制的粗笨的杀猪刀。彼得罗·维卡略装出巧遇的样子，然而那神情却显得过分骄横无礼了。虽说如此，这还称不上是在最后几分钟内唯一的和最明显的一次让别人出面阻止他去杀人。

“克里斯托!”他喊道;“你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我们在这里等着杀死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本来可以做件好事，阻止他们杀人的。“如果我会使用左轮手枪的话，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会死的。”他对我说。可是，他听说过一颗穿甲弹的破坏力非常之大，这想法把他吓住了。

“我告诉你，他可带着一支马格南手枪，子弹能打穿马达。”克里斯托·贝多亚喊道。

彼得罗·维卡略知道那不是真话。“他不穿骑马装是从来不带手枪的。”彼得罗·维卡略曾对我这么说过。但是，话虽这么说，彼得罗在决定为妹妹洗刷耻辱的时候，还是作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带着手枪的准备。

“死人是不放枪的！”彼得罗朝克里斯托喊叫着说。

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出现在门口。他像弟弟一样面无血色，仍然穿着参加婚礼时的外套，一把刀用报纸包着。“如果不是由于那件事，”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我决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随着巴布洛·维卡略走出来，并且对

克里斯托·贝多亚高喊着，叫他快一点，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是女人胆的镇子上，只有像他那样的男人才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了。从码头回来的人听到喊声都警觉起来，并且开始在广场上找好位置，准备观看那场凶杀案。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几个熟人打听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可是谁都说没有看见。在社会俱乐部门口，他碰上了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把刚才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牛奶铺门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会的。”阿蓬特上校说，“我已经吩咐他们去睡觉啦。”

“我刚刚看见他们拿着杀猪刀在那儿。”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不会的，我在吩咐他们去睡觉之前，把他们的刀没收了。”镇长说，“您可能是在那以前看到他们的。”

“我是两分钟前看见他们的，每个人拿着一把杀猪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啊，他妈的！”镇长说，“那大概是他们又拿了另外的刀回来啦。”

他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进了社会俱乐部，去订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人已经被杀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当时犯了他唯一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以为圣地亚哥·纳赛尔到后来决定先去我家吃早饭，而不是先去换衣服，于是便到我家去找他。他沿着河边急急忙忙地走着，碰到谁都问一问是否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去了，但是人人都说没看见。他仍然没有惊慌，因为去我家还有别的路。时髦女人普罗斯帕拉·阿兰戈说她父亲躺在门前的台阶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求克里斯托·贝多亚帮帮忙，因为老人接受了主教短暂的祝福也没好转。“我看见他过去了，”我妹妹玛戈特对我说，“他的脸像死人

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为了进去看看病人情况，耽搁了四分钟，他答应过一会儿回来给病人急救，他帮助普罗斯帕拉·阿兰戈把她父亲送到卧室里去又耽搁了三分钟。当他出来时，听到远处一片喊声，他以为是广场那边在放鞭炮。他想跑快一些，但是手枪在腰间没放好，跑不起来。当他拐过最后一个街角时，从背后认出了我的母亲，她几乎是拖着小儿子往前走着。

“路易莎·圣地亚加！”他喊我母亲，“您的教子在哪儿？”

我母亲稍稍回过身来，满脸泪痕。

“啊呀，我的孩子！”她答道，“听说叫人给杀啦！”

事情一点不假。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克里斯托·贝多亚最后一次看见他拐过广场之后，立即进了他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的家，因此在克里斯托·贝多亚到处去找他时，他在未婚妻家里。“我没想到他会去那儿。”他对我说，“因为那一家人中午十二点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人人都说，全家人是遵从本族的老贤者纳希尔·米盖尔的命令睡到十二点的。“所以弗洛拉·米盖尔肤色细嫩，犹如一朵玫瑰花。”梅尔塞德斯说。实际情况是，他们像很多人家一样，很晚的时候才关门，而起床却很早，是些勤于劳作的人。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弗洛拉·米盖尔的父母早已为他们订婚。圣地亚哥·纳赛尔年幼时就接受了这门亲事，并决心履行婚约，这也许是因为他和父亲一样，觉得和弗洛拉·米盖尔结合有利可图。弗洛拉·米盖尔颇有风姿，但缺乏情趣和头脑，她给所有同龄人都做过傧相，所以定下终身大事对她来说真是天意。他们一直顺利地相爱着，既不进行形式主义的互访，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已经多次推迟的婚礼最后定在圣诞节举行。

那个星期一，弗洛拉·米盖尔听到主教乘坐的轮船头几声汽笛声就醒来了，片刻之后，她就得知维卡略孪生兄弟在等着杀死

圣地亚哥·纳赛尔。她对我那个修女妹妹——在不幸的事情发生后唯一和她谈过话的人——说，记不清是谁告诉她的了。“我只知道早晨六点钟时人们都知道了那件事。”她对我妹妹说。不过，她觉得维卡略兄弟俩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她当时想到的是他们俩要强迫他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以便挽回声誉。于是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镇上许多人去等候主教时，她气得在寝室里大哭起来，同时整理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学校开始就寄给她的那一箱子信。

圣地亚哥·纳赛尔每次经过弗洛拉·米盖尔的家，不管里面有没有人，都要用钥匙刮一刮窗户上的铁纱。那个星期一，她怀里抱着那一箱子信，一直在等圣地亚哥·纳赛尔到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街上看不见她，可她在他用钥匙刮铁纱之前，就透过纱窗看见他走来了。

“进来。”她对他说。

早晨六点四十五分钟，莫说一般人，就连医生也从未进过这个家。圣地亚哥·纳赛尔刚刚在雅米尔·沙尤姆的店铺门口跟克里斯托·贝多亚分手，广场上又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进了他未婚妻的家，真是令人费解。预审法官想找到哪怕是一个看见过他的人，法官像我一样，坚持不懈地找了许久，但没能找到。在预审案卷第三百八十二页上，他又用红墨水写了一个旁注：不幸的命运使我们都变成了瞎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正门走进未婚妻家中的，毫无躲开别人的意思。弗洛拉·米盖尔气得面色铁青，身着常常在哀伤日子里穿的缀着环饰的服装，在客厅里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她把那箱信放在他手里。

“还给你。”她对他说，“但愿把你杀死！”

圣地亚哥·纳赛尔顿时一怔，箱子从他手中掉了下去，那些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信撒得满地。他想到卧室去追弗洛拉·米盖尔，但是她把门关上了，并且闩上了插销。他敲了几次门，用急切的声音叫她，那声音清晨听起来太叫人惊讶，以致全家人都惊慌地跑来。把家人和亲戚、大人和小孩都算上，共有十四五口人。最后出来的是父亲纳希尔·米盖尔，他留着火红的胡须，穿着从故乡带来的贝督因人那种带有兜帽的长衣，在家中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多，他身材魁梧，举止稳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很大的权威。

“弗洛拉，”他用他本族的语言叫道，“把门打开。”

他走进女儿的房间，而全家人则凝视着神情茫然的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跪在客厅里，拣起地上的信件放到箱子里。“他好像在做忏悔。”那家的人对我说。过了几分钟，纳希尔·米盖尔从女儿房间走出来，打了个手势，全家人便都离去了。

老人继续用阿拉伯语同圣地亚哥·纳赛尔谈话。“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对我跟他讲的事情一无所知。”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当时我偷偷地问他是否知道维卡略兄弟俩正在寻找他，要把他杀死，他面如白纸，茫然不知所措，没法相信他是伪装的。”老人对我说。他也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茫然。

“你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老人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不管怎么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躲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要么拿上我的来复枪出去。”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他像只落水鸟。”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他不得不把箱子从圣地亚哥·纳赛

尔手中拿过去，因为他连放下箱子开门都不知道了。

“那将是两个对一个。”老人对他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走了。人们像游行的日子那样来到广场。大家都看见他走出来，并且也看出了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是那样惊慌，以至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据说有人在阳台上喊了一句：“别从那儿走，阿拉伯人，从旧港那边走。”圣地亚哥·纳赛尔看了看是谁在喊。雅米尔·沙尤姆呼喊着叫他到他店里躲一躲，并且进店去找他的猎枪，但是他不记得枪弹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他喊，圣地亚哥·纳赛尔转过来又转过去，无所适从，他被那么多同时传来的喊声弄得晕头转向了。很明显，他是想从厨房门进家的，但是，可能突然想起了前边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转身向那儿走去。

“他来啦。”彼得罗·维卡略说。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布洛·维卡略脱下上衣放在凳子上，拿出一把弯形杀猪刀。他们在离开店铺前，不约而同地画了十字。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抓住彼得罗·维卡略的衬衣，高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喊着，叫他赶快跑开，说他们要杀他。她的喊声是那样的急促，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喊声。“起初他吃了一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喊他，也不知道喊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当他看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时候，也看见了彼得罗·维卡略，后者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一下子推倒在地，然后赶上了他的哥哥。这时，圣地亚哥·纳赛尔离家不到五十米远，他拔腿向大门跑去。

五分钟以前，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在厨房里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普拉西达·里内罗。普拉西达·里内罗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样子。她问维克托丽娅·库斯曼

是否把事情透露给了她儿子一点，她有意说了谎，回答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她还一无所知。迪维娜·弗洛尔继续在客厅里擦着地板，同时她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临广场的门进了家，上了小楼梯回卧室去。“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他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什么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像是一束玫瑰花。”这样，当普拉西达·里内罗问迪维娜·弗洛尔时，迪维娜·弗洛尔还要她不必担心呢。

“一分钟以前他上楼回房间里去了。”她对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普拉西达·里内罗当时看见地上有封信，但是没有想到去拾起来。只是后来在那场悲剧的混乱中有人把那封信拿给她看时，她才知道了上边写的是什么。她通过家门看见维卡略兄弟俩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向她家跑来。从她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他们，但是看不到从另一个方向朝大门跑来的儿子。“我以为他们想闯进来，把我儿子杀死在屋里。”她对我说。于是向大门跑去，一下子将门关上了。她正在拴门闩时，听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喊声，听到用拳头拼命的敲门声，可是她以为儿子是在楼上，从他卧室的阳台上责骂维卡略兄弟俩呢。她赶紧上楼去帮儿子的忙。

圣地亚哥·纳赛尔只消几秒钟就可以跑进家门了，但这时门却关上了。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用拳头敲了几次大门，随后便马上转过身去赤手空拳对付他的两个敌人了。“当我面对面地看他时，我胆怯了，'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有平时两倍高大。'圣地亚哥·纳赛尔举起手挡住彼得罗·维卡略砍来的第一刀，那是用尖刀从右侧砍过来的。

“狗娘养的！'他喊道。

尖刀扎穿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右手，接着又从右肋深深地扎了进去。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惨叫声。

“啊哟,我的妈呀!”

彼得罗·维卡略使出屠夫的野劲将刀拔出来，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又捅了第二刀。“奇怪的是，刀拔出来时滴血不沾，”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供认说，“我至少给了他三刀，而一滴血也没有流。”挨了第三刀以后，圣地亚哥·纳赛尔双臂抱着肚子弯下了腰。他像牛犊一样哀叫了一声，企图转身背对他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弯刀站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左边，当即在他的背上砍了唯一的一刀，一股鲜血迸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那血同他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受了三处致命伤以后，再次转身面对他们。他背靠在他家的大门上，毫不抵抗，仿佛只是想帮助他们各处都砍几刀，最后把自己杀死。“他没有再呼喊，”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说，“相反，我看到他像是在笑。”这时维卡略兄弟对着房门继续你一刀我一刀地、毫不费力地砍了起来，他们顾不上害怕，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使他们完全沉浸在欢愉之中。看到他们这样行凶，全镇的人吓得喊声不绝，可是他们却听不见。“我觉得仿佛在骑着骏马飞奔一样。”巴布洛·维卡略供认说。但是，兄弟俩猛然面对现实醒悟过来，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还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永远不会倒下。“他妈的,表哥,”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你不知道杀一个大活人可真是不容易呀！”彼得罗。维卡略想最后结果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生命，便找他的心窝下手，但是他几乎到腋下去找了，因为猪的心脏是在那个地方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倒下，因为正是那两兄弟的刀不断砍来将他支撑在门上。巴布洛·维卡略绝望了，他拼命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肚子

上横砍了一刀，肠子顿时全部涌了出来。彼得罗·维卡略也想这么干，但是由于害怕手腕不听使唤，一下子砍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赛尔倚在门上继续站了一会儿，直到在阳光下看见自己洁净发绿的肠子时，才跪倒下去。

普拉西达·里内罗在各个卧室呼喊着找圣地亚哥·纳赛尔之后，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另外的喊叫声，那不是他儿子的声音，那时她把头探出那扇朝向广场的窗子，看见维卡略兄弟向教堂跑去。雅米尔·沙尤姆手里拿着打老虎的猎枪紧紧地追赶着他们，另一些赤手空拳的阿拉伯人也在追赶。普拉西达·里内罗以为危险过去了。后来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发现圣地亚哥·纳赛尔朝着大门趴在门前的土地上，想从自己的血泊中直起身子。他斜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托着挂在外面的肠子，悠悠忽忽地迈起了步子。

为了绕房子转一圈后从厨房门走进家里，他走了一百多米。那时他还相当清醒，不从街上走——那样走要远些——而是从邻近的房子穿过去。庞乔·拉纳欧、他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在距他家门口只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了喊声，”庞乔·拉纳欧的妻子对我说，“但是我们还以为是欢迎主教呢。”他们正要开始吃早饭的时候，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满身鲜血、用手捧着一串肠子走进来。庞乔·拉纳欧告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股刺鼻的粪便味。”但是，大女儿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却说，圣地亚哥·纳赛尔仍然像往常那样潇洒地走着，那张撒拉逊人的脸，配上被弄乱了的鬈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英俊。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过饭桌时，对他们笑了笑，随后穿过卧室从屋子的后门走出去。“我们都吓瘫了。”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对我说。我姑母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她家的院子里

刮鱼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旧港的阶梯上下来，迈着坚定的步子朝他家的方向走去。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向他喊道;“你怎么啦!”

圣地亚哥·纳赛尔认出了她。

“他们把我杀了,维内弗里达。”他说。

他在最后一道阶梯上绊倒了，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到用手掸掉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我姑母维内弗里达对我说。后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那扇打六点钟起就开着的后门进了家，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